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行理事长	林宏修	黄 涛	徐启源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高 翔	
理 事	鲍 闽	陈伙金	林 山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汪征鲁	赵麟斌	陈伙金
	鲍 闽	林 山	陈章汉
	黄文山		

《闽都文化》总第 66 期 2020 年第 1 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 版 单 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鲍 闽
执 行 主 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编 务 主 任	王 坚
编 务	单 南 何财铭
装 帧 设 计	乔 麦
封 面 摄 影	游早明
地 址	福州乌山八十一阶 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 子 邮 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闽 都 文 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 志 刊 号	CN-35 (Q) 第 0093 号
印 刷 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 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请在投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P4



城市声音变奏曲

P16



过岭烟霞开画卷

P39

那一片宫古蓝



世味流年

4 林文钦

城市声音变奏曲

聚焦世遗

8 张建光

Hello, 武夷山

——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的
艰难历程

八闽文脉

16 黄河清

过岭烟霞开画卷

海峡流觞

20 段 玲

半世离殇塑乡愁

双塔视野

27 璎 珞

谢杰和册封舟

33 明月雪

琉球册封使齐鲲

39 柏 荣

那一片宫古蓝

闽都记忆

42 许 超

南台往事

在线读城

48 文 净

四角亭，勾动老街往事

Contents

P70



温润不觉韶光换
——罗源非遗角梳今昔

P85



联话扈屿

P90

诗人笔下的于山



岁月写真

- | | | |
|----|-----|--------|
| 54 | 林丽钦 | 寻忆南华剧场 |
| 57 | 王春燕 | 时光里 |

闽都风物

- | | | |
|----|-----|--------------------------|
| 64 | 江宝章 | 掌上乾坤，钹底风云
——福州评话和评话先生 |
| 66 | 徐鹤苹 | 一片饶钹话古今 |
| 70 | 林梦阑 | 温润不觉韶光换
——罗源非遗角梳今昔 |
| 75 | 田荔琴 | 振臂有声香店拳 |

轶事考辨

- | | | |
|----|-----|---------|
| 78 | 黄文山 | 尤树的传奇 |
| 81 | 张德团 | “舢”字的由来 |
| 85 | 林 山 | 联话扈屿 |

福地山水

- | | | |
|----|-----|---------|
| 90 | 危砖黄 | 诗人笔下的于山 |
|----|-----|---------|

- | | | |
|----|-----|---------|
| 封面 | 游早明 | 湿地公园 |
| 封二 | 谢从荣 | 不变青苍冠四时 |
| 封三 | 叶兴松 | 陆庄桥 |
| 封底 | 陈仁海 | 世博和鼎 |

城市声音变奏曲

林文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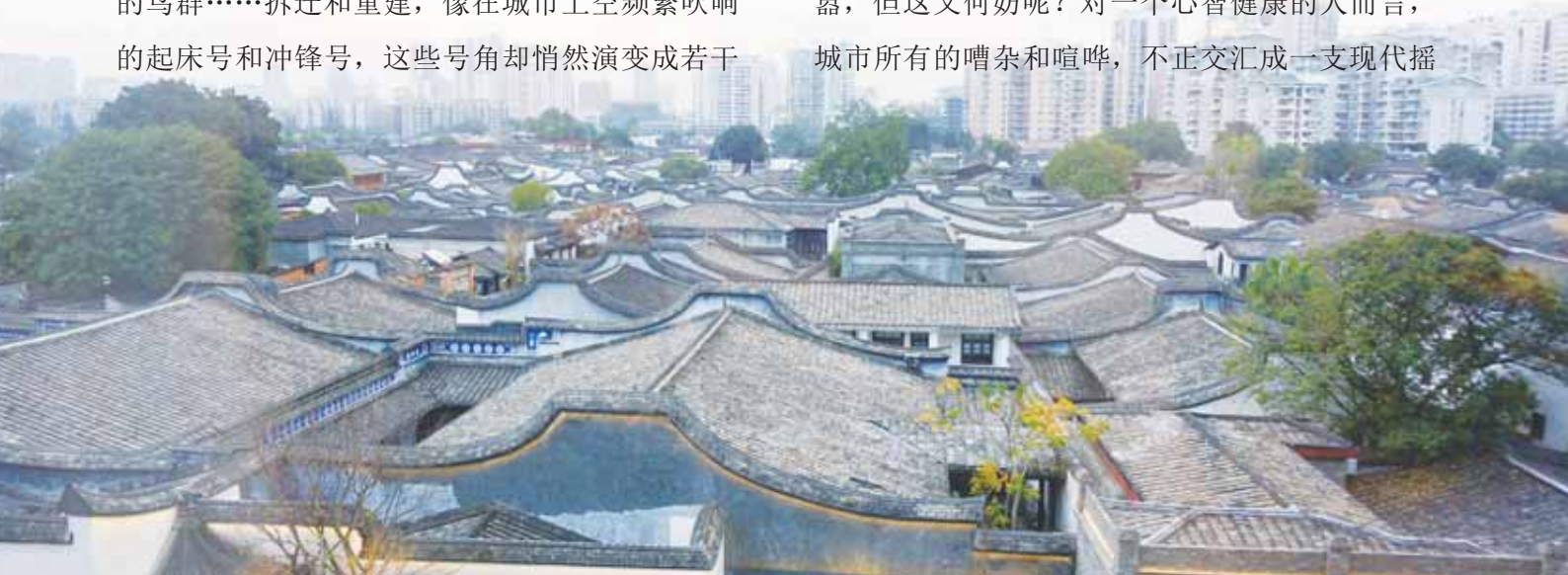
带着一颗安静的心，体验着城市的声音变幻，别有一番韵味。

每一个经典的城市，都应有合乎时代的声音表达，就像那些在历史中风化的城市记忆。只要那些老福州人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时的生活环境，便会油然感慨改革开放 40 年的变迁。

在与榕城的来往间，我的耳朵见证了城乡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凡演绎。大小建筑工地，轰轰烈烈的挖掘机和脚手架，指挥台上鸣响的开工哨子，太阳在头顶上威严地移动，天空中寂静飞过的鸟群……拆迁和重建，像在城市上空频繁吹响的起床号和冲锋号，这些号角却悄然演变成若干

新的楼群、马路等、公共设施。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建设也由单一的号角演变成宏大的交响乐。

日复一日地，耳朵里的榕城在周而复始地奏鸣，车轮声、机械的轰鸣、流行音乐以及各种人声组成的时代乐章，这种繁杂的声音里别有一种铿锵力度，像火车向前奔跑的音律，很能激发想象。我有时想，时代前进之时，不仅会留下万象更新的物证，也留下声音的多彩，这种声音伴着光彩、热度、力度，在生活的海洋里全方位绽放。有时我心想，尽管我们无法抗拒城市的喧嚣，但这又何妨呢？对一个心智健康的人而言，城市所有的嘈杂和喧哗，不正交汇成一支现代摇



滚乐吗？

一个人独处时，我不由得打量起福州——这一古老而时尚的榕城，细细聆听它发出的声音，竟然发现其中蕴藏的独特韵味。那些既消失又保存下来的声音，如闽剧、民歌小调、贩夫走卒的吆喝声，将随着生活方式的剧烈变迁，渐渐成为老一代人的回忆。

“磨菜刀”“补雨伞”“箍桶哟”……这些城乡接合部最熟悉的吆喝声，响彻街头巷尾，带着最本土、最亲切的记忆，曾散发着过往岁月的芬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传统的叫卖声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有坏手机、坏笔记本修吗”“有坏冰箱、坏空调修吗”，同时伴着“收购旧电脑、旧手机、旧热水器哟……”。21世纪的经济浪潮风起云涌，城市的小街上又飘荡起一种新的吆喝：“收购旧桌椅、老家具、红木家具……”最有趣的是，吆喝声中夹杂着南腔北调，抑扬顿挫，各具特色。这声音听起来简直就是精彩的小品或相声，是一种原汁原味的艺术享受。

福州在蜕变过程中逐渐成长，我也学会了倾听：跟着多元化的城市声音，我们可以去探寻它

的成长脉象。在复式调的音频里，隐藏着城市的长和城市的深，以及与这个城市一起成长的文化。

夏日的某个清晨，我悠闲地步入海润滨江社区，感觉到这里悄然更换了音色。晨风中，社区广场飘来舞蹈旋律，退休大妈们在动感激情的《好日子》中翩翩起舞。富有音乐细胞的姑娘们拉响了手中的手风琴，优雅的琴声轻轻掠过清澈的闽江水面。晨光抚摩着城市，树上鸟的早鸣，卖早点的叫唤，又像是城市交响曲中突然插入的轻快小调，让我精神一缓，心情随之放松。当日午后，我聆听了社区诗歌朗诵会，开场的一首《面朝闽江，春暖花开》就让人心旷神怡。现代城市让不同音色的声音组合在一起，让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交融，这种声音是那么遥远而凝重，灵动而亲切。

作为榕城的客居者，我的耳朵是有福的。当城市公共文化体系日趋完善。我的听觉中，不再是多年前单调的地方戏和影视配音。当我充分打开耳朵，敞开心灵，所听到的不仅是天籁音乐声、朗朗诵读声和铿锵讲演声，更是城市文化拔节成长的音符。

城市在扩展，建筑在拔高，这是发展年代



必然发生的景象。福州火车站、宝龙广场、台江旅游码头等公共场所，它们发出的声音极具磁性，元洪购物城的敲敲打打声、永辉超市传来的电锯“吱吱”声、五一路的车来车往声、东街口商业街扩音器的叫卖声……每一种声音，都增加了城市音响的分贝。这些纷繁的景象，透露着城市的休闲

品质。在福州，这座被誉为“常回来看看”的和谐之城，四处流淌着如同葫芦丝一般丝滑悠扬的声音。当你走过一个个茶吧、休闲厅、路边摊，观察着每一个榕城人匆忙又祥和的表情，这些表情都是一个个音符，共同汇成这座城市的淡雅之音。这种声音的节奏缓慢，乍听起来，有着下午茶的慵懒，仔细回味，却发现在这慵懒之中，有着难得的安宁与恬淡，透出奇妙的城市灵气，让人不由得迷上这种声音，并情愿停下脚步，沉浸于此。

福州，福州。我默念着这因改革开放而崛起的南国都市，不由得想起她带给我的几分感动。

一次是2016年初秋。在市体育场，我在现场观赏大型助学公益文艺义演演出后的烟火表演。烟火打到高空中的隆隆响声，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那一刻，我像没见过世面的小孩一样



福州宝龙城市广场

惊奇地睁大眼睛，看到只有梦中才能出现的幻象。那样光亮，如此绚烂，好像整个银河系的星星都倾泻于此。来自各地的人群纵情欢呼，足以把一个人的情绪从头到脚都升华成欢快。原来，欢快是不问来源的，更是不分地域、不分种族的，汹涌成了一个喜悦的汪洋。

再有一次，我在福州大戏院看演出。我踏着厚实的红地毯，靠在宽大的座椅中，屏幕上正放映着“新榕城，新生活”的宣传片。画面聚焦着各个民族的脸孔，汇集成依山傍海的欢乐。这些鲜明的文化要素，分布在老街新城、院校民居，在新兴的创业园区，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相互融合、撞击、渗透、交汇，不断排列组合成一批又一批新的带有海西文化的元素。它们在福州这块得天独厚的土壤生根、开花、结果。

福州，她是一座让人感动的新兴之城，因为



福州东二环泰禾广场

她凝结了太多的故事。

我坐着车子在市区观光，一个个养眼的情境在视线中掠过：闽江公园、五四北CBD、升龙环球中心、船政文博馆、海峡奥体中心……车水马龙的街区，一幢幢刚刚崛起的高楼大厦；白昼的生机盎然，黑夜的五彩斑斓；麦德龙超市、越洋图书城、泰禾广场、社区书报亭、巨型广告牌……有一种一直埋藏在心底怯于开口的热爱与幸福油然而生！

古意而新潮的福州，日新月异的发展汇成一首大型交响乐，传唱一曲更新更美更动人的“新福州颂歌”。

混合多种色彩的声音，记录了榕城成长的历程，也融入了市民多元的文化情怀。前不久，我听在市交通电台供职的朋友许君说，他将在城市

大街小巷录入的数十小时的声音重新剪辑编排再放出，在耳机里再现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榕城。通过声音的再现，那些被掩盖在“众声喧哗”里的城市细节，以及隐藏在声音背后的城市表情和情绪别有一番滋味。

我的记忆中始终保留着一个画面，那是初冬的金牛山公园下了一场小雨。寂静午后，能听见雨滴打在树叶上的“滴答”声。在这之前，我似乎从没体会到“万籁俱寂”这一境界，就是到了北郊的森林公园里游玩，大家也是成群结队，到处充斥着人的声音。有时想想，真的一点声音也没有，我会有些惊恐！待重新回到了市区的喧嚣里，方能暗松一口气。看来，滚滚声浪才是滚滚红尘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汇集成这座城市迅猛发展的变奏曲。

Hello, 武夷山

——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的艰难历程

张建光

1999年12月1日当地时间10时，摩洛哥西部古城马拉喀什市国际会议厅。此刻，全世界热爱文明、保护文明的人们都把目光聚集在这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全委会正在举行，表决审议申报国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议程马上开始。会场内21个主席团成员正襟危坐，列席的数十个申报国代表焦躁不安，他们身后千里万里以外的各国申报地的人们更是翘首盼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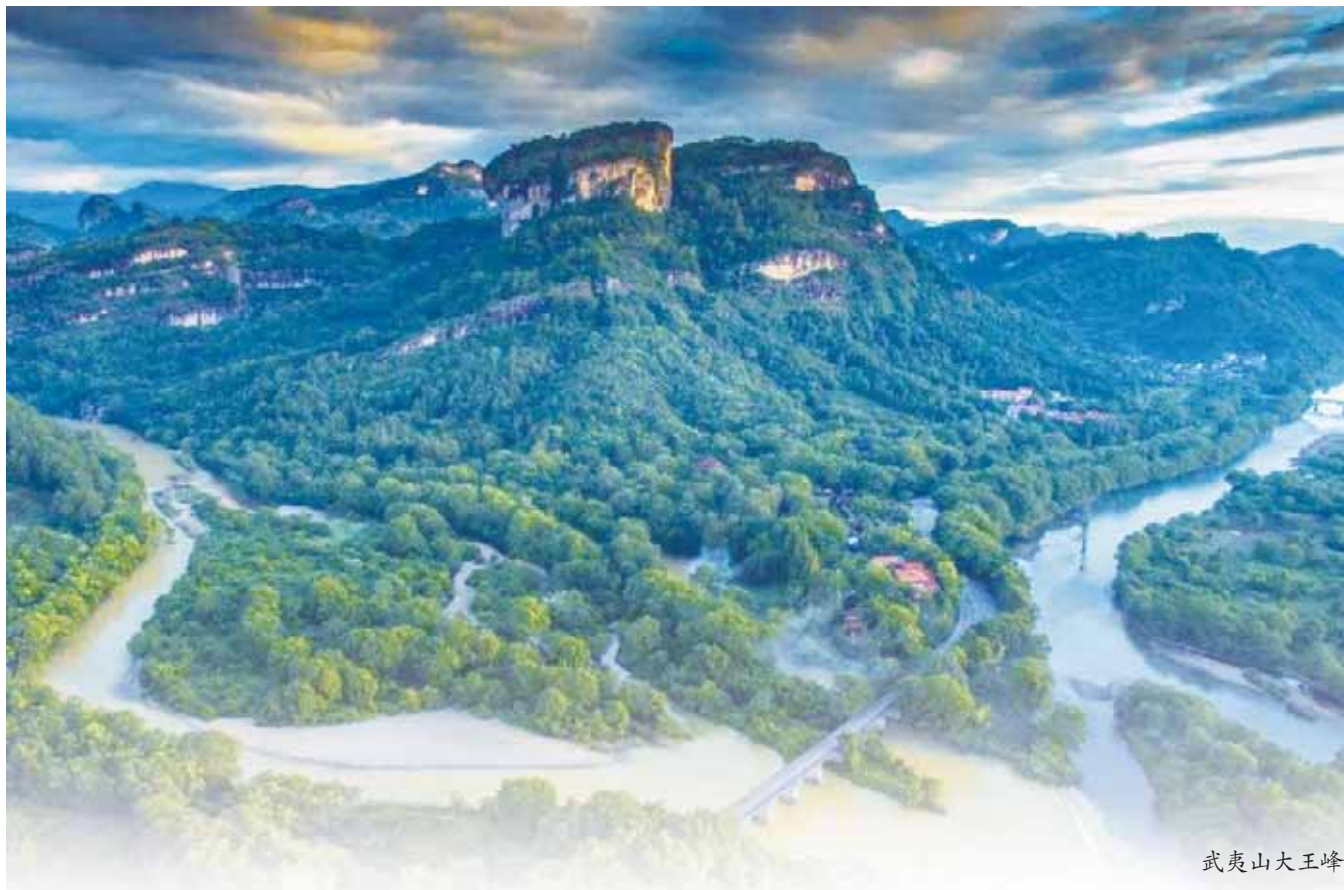
“如果不成功，其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武夷山指挥部一班人可以跳大王峰了。”

1998年6月的一天，一份由国家建设部、文化部、教育部和外交部联合署名的文件送到了国务院总理们的案头。从6月17日至6月20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钱其琛、温家宝很快做出圈阅，最后朱镕基总理圈阅同意并加盖公章。至此，中国政府郑重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书面表示，推荐武夷山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两套厚厚的中英文申报文本随之送达联合国。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遗产地可以得到资金技术上的支持，提高国际知名度，受到国际社会的保护，即使在战争期间，也不会成为军事进攻的目标。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地数量当时在全世界排名第4位，这与古老文明的国度是不相称的。世界遗产在福建省是个空白，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对福建省、对闽北有着重要意义。

这是21世纪内赋予武夷山的最难得、最重要的一次机遇。“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市委、市政府全面分析了形势，看到申报所面临的巨大困难：时间紧——从向联合国递交文本到实地验收仅8个月；面积大——申报总面积为999.75平方公里，是中国申报的遗产地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协调难——申报区域中省管的单位有数十个，还有4个区、4个乡镇（场）、10多个村；资金缺——需投入的资金在亿元以上，申报伊始，仅有省政府承诺支持的650万元。“万一不成



武夷山大王峰

功，其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正如市政府主要领导在省长办公会上所言，“如果不成功，我们武夷山指挥部一班人可以跳大王峰了。”为此全市紧急动员起来，成立了申报“世遗”工作委员会，抽调精兵强将组建指挥部，五套班子成员几乎全部投入申报工作中。一时间，“世遗”成了全市压倒一切的重点工作。在全市申报世界遗产的誓师大会上，市委、市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提出了“举全市之力，不惜一切代价，克服重重困难，背水一战，确保申报世界遗产成功”的决心。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大战就在这略有几分悲壮的气氛中拉开了攻坚帷幕。

“必须用科学的、美学的语言，同时符合国际惯例的思维形式来表述武夷山自然与文化遗产的价值。”

世界遗产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人类罕见且目前无法替代的财产，其价值具有真实性和唯一性，即必须具有“突出的、普遍的价值”，是人类公认的最优秀的物质遗存。武夷山的景观人文哪些最能展示世界遗产性的价值呢？

“碧水丹山，珍木灵草”；典型的丹霞地貌；“鸟类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世界”“动植

物的天然避难所”“研究两栖、爬行动物的钥匙”；4000 多年的独特人文景观；儒释道同山，天与人合一……林林总总，满目璀璨，武夷山拥有丰富多彩的自然资源和博大精深的文化遗存。但是怎样把这些自然和文化资源价值集中表现出来，让遗产委员会组织机构和专家们理解、动心？对于文明的成果鉴赏虽然全人类是相通的，有其客观的一致标准，但是中西文化的价值观念、方法习惯的差异，无疑给外国专家的评估、考察设置了阻碍，带来不确定性。

工作委员会通过省里向国家请求专家援助。很快植物学家林源祥教授、地质学家宋林河教授、美学专家唐学山教授和建设部本身就是专家的曹南燕处长、左小平副处长、赵健溶处长、呼忠平司长来了；全国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教授，文物专家黄景略，中科院考古专家杨虎，国家文物局郭旃处长，中国教科文组织马燕生处长，遇小萍，省文化厅文物处处长郑国珍也来了。他们不止一次莅临武夷山，反复深入申报区域，调集多方资料多次论证，上下各方达成共识，突出以下方面作为申报的主体。

一、武夷山是代表生物演化过程以及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突出例证。武夷山保存了世界同纬度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发育有明显的植被垂直带谱。

二、武夷山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

地区，是尚存的珍稀、濒危物种栖息地。武夷山拥有丰富的植物种质资源，列入《中国植物红皮书》的珍稀濒危物种有 28 种，蕨类资源更具特色，以武夷作为种名的就达 6 种之多，古树名木以古、大、珍、多见长；武夷山是珍稀、特有野生动物的基因库，崇安髭蟾、崇安地蜥、崇安斜鳞蛇、挂墩鸦雀更是武夷山独有。武夷山还是世界著名的模式标本产地。

三、武夷山具有独特、稀有、绝妙的自然景观，属罕见的自然美地带，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代表。这可以从九曲溪中部生态保护区略见一斑。

四、武夷山的“古闽族”“闽越族”文化遗存是业已消失的古代文明的历史见证。

五、武夷山是朱子理学的摇篮，是世界研究朱子理学乃至东方文化的基地。

专家们认为，以上五条，分别符合世界遗产委员会标准中自然遗产第二、三、四条标准和文化遗产第三、五条标准。至此，武夷山的独特面目勾勒清晰，申报世遗的主体内容明确集中，所有的整治、迎检便围绕这一主体而展开。

“如果从加强保护和管理角度看，能够对景区进行大规模整治，即使申报失败，也是成功。”

世界遗产的评估考察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资源本身的价值；二是保护和管理水平。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世界遗产项目协调员亨利·克利

尔博士和罗马文物修复研究中心协调员尤嘎·昭克赖特来到申报区内，见到电杆、电线、居民点时，对陪同人员说：“如果明年到武夷山考察评估还看到这些，一定是照片一拍便掉头就走，什么都不要看了。”

“举全市之力，作世纪一搏”。按专家的要求不折不扣地进行整治！综合整治的重点难点是搬迁和安置，这直接关系到单位和群众眼前的利益。指挥部反复研究，制定优惠政策，仔细推敲安置方案，确定由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负责，同时从全市抽调数十名善做群众工作的科局领导，深入家家户户，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另一方面，层层召开会议，使武夷山上下形成了“舍小家为大家”“我为‘世遗’做贡献”的浓厚氛围。

省长办公会议确定，申报区域内景区、自然保护区和汉城遗址，按各自行政体制、财政体制为主进行投入，区域内的电力线网、通信线网、广播线网落地铺设由各主管部门负责。为了申报世界遗产共同利益，条块之间配合默契，不分彼此，都把申遗作为自己的事来抓。文化厅负责古汉城整治，自然保护区由林业厅负责，电话线网整治得到省邮电局大力支持。各区各部门之间就出现了比学赶

帮竞赛热潮。

拆迁的同时，大举施工建设：15公里长的高星环景公路全线铺开；九曲溪、云窝、天游峰等6个景点大力维修；停车场、防火、水质、大气监测点、旅游公厕、垃圾处理设施、医疗救护站、服务网点等50项基础设施重新兴建。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作为汉城遗址整治的重点项目，是中国目前唯一的仿汉博物馆建筑。这座建筑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的展馆，从基建到布馆用了不到4个月时间。省领导看了这外观雄浑、馆藏丰富的博物馆后连声称赞这是整治建设中的“奇迹”，了不起的“武夷速度”。建设中还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绿化，所有被拆除的公、民建筑空地和黄土露天的区域全部植树栽竹，种草覆盖，一时武夷草贵。短短几个月时间，申报区域内绿化面积达到30.75万平方米，其中景区绿化22万平方米，这是景区过去20年绿化的总和。武夷山素以奇秀



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

而闻名，今日武夷山，更可以说是秀甲天下了。

资金是环境整治中最大制约因素，指挥部千方百计筹集资金，要求各工作组善做“无米之炊”。省里、南平市对此也给予很大的支持，半年多时间，农行发放整治专项款达 6000 多万元，加上原来景区贷款 2000 多万元，共计 8000 多万元。强大的金融后盾，确保了整治建设的顺利进行。

整治建设不仅针对硬环境，还大力完善软件。工作小组完成了文物普查、船棺遗址分布调查及古汉城遗址、武夷精舍、双仁书院遗址及遇林亭窑址的文物保护管理的整改，收集了 150 份

国家、省、地（市）出台的涉及申报区域内保护管理的法律法规，借调复制了上百件文物，收集、添置上千册书籍，完成了九曲溪、古树名木、文化遗址、绿化、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旅游发展等 10 多个专项规划或计划的编制及汇报纲要、解说词、各类图表等大量的中英文材料。

“武夷山是中国人民永续利用自然资源的永久象征。”

1999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2 日，世界自然保



武夷山九曲溪

护联盟专家莱斯利·莫洛伊先生将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武夷山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进行实地考察。这次考察结果同上年亨利·克利尔与尤嘎·昭克赖特先生的考察，对武夷山能否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从1993年准备申报起，历经6年多的努力，成功失败在此一举。

为了给莫洛伊博士一个清晰的总体印象，指挥部和专家们决定举行汇报会，采用讲台、幻灯、图表相结合。这种中西合璧的汇报会，由于文稿准备精心，时间控制恰到好处，英语翻译杨建华发挥出色，收到了极好的效果。莫洛伊博士听完汇报后，激动地走到麦克风前说：“这是我所参加过的包括东南亚、日本、南太平洋群岛等地区申报遗产汇报会中最优秀的一次。就此，我感谢当地政府为此所做出的努力。”

筹备联合国专家检查验收的过程是十分精心的，从路线、陪同、讲解、翻译、资料、接待、宣传、联络、内外环境等方面作了周密部署。诸多环节中，指挥部首先抓住了线路安排。选择一条科学的考察线路，既充分展示武夷山的遗产精华，又能体现管理上的高水平，同时还要与天气气候和考察者心理相吻合，这是评估考察关键所在。

考察从武夷山西部黄岗山开始，在距离山顶数公里处徒步下山，主要展示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直观感受明显的植被垂直带谱，先高山草甸、温性针叶林带、针叶阔叶过渡林带和常绿阔

叶林带，再通过遗留动物痕迹和自然博物馆了解动物资源。武夷山的生物资源相当丰富，不仅有罕见的紫荆、铁杉群落和稀有的银杏等植物资源，从考察线路遗留的动物痕迹来看，动物资源也很丰富，其中不乏珍稀物种。但是，武夷山究竟是否是世界同纬度带物种资源最丰富的？治学严谨的莫洛伊表示要再查资料确定。专家们于是又向他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他到北京立即与北京大学陈昌笃教授座谈。翻阅了陈教授的专著和提供的第一手证明材料后，莫洛伊先生才认定：“武夷山的物种资源超过了中国已批的遗产地”，“武夷山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

第二天的线路安排是九曲溪、天游、桃源洞、云窝和武夷宫，水上竹筏观赏和步行登山考察结合进行。这是武夷山东部地区，主要展示山与水完美结合，人文与自然有机相融，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辩证进行，这是整个评估考察的高潮所在。不出所料，莫洛伊博士一坐上竹筏便十分兴奋，他说游览九曲溪时就像皇帝和女皇出游一样，“武夷山九曲溪的游览没有使用机动船，而用古朴的竹筏，既无噪音，又无污染，这种永续利用旅游资源的方式，在中国是典范。”参观完朱熹纪念馆后，他用中国的毛笔在中国的宣纸上写道：“武夷山是中国人民永续利用自然资源的永久象征。”

莫洛伊博士虽然是自然遗产方面的专家，但他认为一个优秀的风景区一定要有良好的文化氛围。第三天，他考察了古汉城遗址，为武夷山丰

富的文化遗存所惊讶，认为武夷山独特、稀有、绝妙的自然景观与丰富的人文景观和谐统一。莫洛伊博士表示，他将尽最大努力，如期向国际自然保护联盟递交一份完整的关于武夷山的考察报告，同时他也很乐意应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要求，提供武夷山自然景观与文化遗存相联系价值方面的资料，并发表个人意见。

“OK，OK！中国伟大，‘双遗产’无一人反对。”

1999年12月1日，对于身处马拉喀什阿特拉斯酒店联合国世界遗产大会的徐思华来说，是最为紧张的时刻。从头天下午起，大会进入审议决定当年新遗产地的议程。作为武夷山市政府代表，他深感肩膀上所负的重任。原以为在此之前要努力的、要考虑的，上上下下都全力以赴，闯关夺隘过来了，大会不过走走过场而已，谁料到大会审议之严苛出乎人们的想象，他愈来愈觉得坐立不安。

武夷山申报世遗工作并未因莫洛伊博士考察验收的结束而结束，而是开始了更加紧锣密鼓的攻坚。莫洛伊博士是自然遗产方面的专家，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专家并没有同时前来。虽然联合国世界遗产协调员亨利·克利尔曾于1998年9月份考察过武夷山，但那时武夷山整治工作刚刚进行，武夷山丰富的文化遗存无法及时系统地、完整地展示，应当说给亨利·克利尔留下的

印象并不尽善尽美。为此，1999年4月1日，武夷山市市长致信亨利·克利尔博士，将武夷山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方面的整治情况作了书面介绍。5月底6月初，市政府领导一行专赴巴黎，向世界遗产委员会和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专题汇报武夷山申报工作。专家材料组工作人员就武夷山文化遗产进行再挖掘，整理系统补充材料呈送“遗产”专家审阅。世界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委员会秘书长、国家文物局文保处处长郭旃又一次莅临武夷山。他认真考察了整治情况，审阅了补充材料，深为武夷山同志们的工作精神所感动，提笔给亨利·克利尔博士写道：“武夷山是美的，它的美不只限于自然风光，它还有一种悠久、神奇的文化的美。进一步研究表明，城村的汉代城市文化与武夷山九曲溪悬崖上的丧葬文化同出于古老的、神秘的闽越部族。一生一死无疑体现着一种已逝去的文明。而这或许正符合世界文化遗产标准的第三点。武夷山又有几处朱子理学的学院遗址发现，并被妥善地进行考古清理，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展示给人们。如你所知，程朱理学是东方思想史、教育史、哲学史和文学史上继孔子之后的重要阶段，其影响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影响范围也不限于中国。这些学院遗存与丰富的文字题刻相辉映，与优美的自然景观相结合，与历史记载和中国社会的现状相对照，其意义显然不同于泰山、黄山和峨眉山。似乎可以认为，这方面的文化价值同样可以与世界文化遗产第三条标准相联系，并无疑



武夷山五夫镇兴贤书院

符合第六条标准。”正因为武夷山自然和文化本身的突出价值，从事申报“世遗”的同志们不懈努力，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同意将武夷山作为“双世遗”项目提交全会审议。

10时05分，终于轮到武夷山了。“IUCN”和“ICOMOS”组织的代表分别作了陈述，然后明确表态：“‘IUCN’在认真考察后认为武夷山符合自然遗产第三、四条标准。”“‘ICOMOS’在进一步研究了武夷山后认为，根据世界遗产要求，它符合文化遗产第三和第六条标准。”在他们发言的同时，会场屏幕上展现了“玉女群峰”“九曲风光”“黄岗林海”“云豹角怪”“兴贤书院”“汉城遗址”以及总观图、区域图的照片，场上时

不时有人惊叹“beautiful”。介绍完毕，全场亮灯，主席缓缓宣布：“开始审议。”时间一秒一秒过去，全场出乎意料地安静，与此前审议喧嚣成天壤之别。这时只见会议主席摸了一下光亮脑门，同时用目光扫视台上台下，当即挥手宣布：

“根据主席团提名，经大会审议，现在决定将中国武夷山作为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全场沸腾起来，远离中国席位的马耳他代表按捺不住激动，猫着腰跑过来，牵住中方代表团团长的手，不停地说：“OK，OK！中国伟大，‘双遗产’无人反对。”

武夷山在世纪之交跨入世界名山大川的行列，20世纪为中国武夷山鼓掌，Hello，武夷山。

过岭烟霞开画卷

黄河清

武夷山，这块由红色沙砾岩构成的丘陵，方圆 120 华里，一条碧绿似玉的九曲溪流贯其中，萦回于赭红若丹的悬崖峭壁之间。这种碧水丹山的地貌，使武夷山兼有黄山之奇、桂林之秀、华山之峻和泰山之雄。早在 1400 年前，南朝学者顾野王就由衷地赞美过它：“千峰竞秀，万壑争流，美哉河山，真人世之所罕见也！”打那以后，又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写下过多少篇纪游文章，只是在这成百上千篇文章之中，人们至今仍津津乐道的却是徐霞客的《游武夷山日记》。

当大明王朝被闹得乌烟瘴气之际，在江阴的一处秀美村庄里，一个名叫徐霞客的俊逸青年，却在为他那蓄势待发的游历而全神贯注，为他那天马流星的开阔思想而眉飞色舞。他誓将汗水洒满那充满着激情与壮美的山川，让足迹踏遍那散发幽香与魅力的大地。

终于，他在 22 岁那年，开始了终其一生的跋涉。明万历四十四

年（1616）他 30 岁时，在游览黄山后，顶着料峭的寒风，来到崇安，开始了武夷之游。

那是一个冬日的早晨，天亮得有点晚，阵阵寒意渗透着布衣。徐霞客来到九曲溪边，决定乘一叶扁舟，逆流而进，探胜历奇。流水很急，纤夫们赤脚行走于溪石之间挽船前行。行行复行行，山接水转，水流山行，两岸奇峰怪石林立，争奇斗巧。这里，大王峰巍然挺立，矗立云天，



武夷山大王峰徐霞客入山处

雄峙溪北；狮子峰怪石峥嵘，壮如雄狮，坐镇溪南；奇丽的玉女峰，插花临水，亭亭玉立；小藏峰、大藏峰危立水际，陡峭千仞；仰望崖际，3000多年前古越人的悬棺葬具“架壑舟”凌空悬挂，风雨不毁，远航九天；浴香潭、卧龙潭碧绿如蓝，水波不惊，苍松翠竹映入潭中，像拓印一般。

当舟抵六曲的曹家石时，徐霞客舍舟登岸，在云雾中摸索着前进。这里坠石叠压，垒积成洞，每当冬春两季的早晚，从洞穴里会冒出一缕缕淡淡的云雾，在峰石之间轻飘游荡，时而聚集成团，时而又飘散开去，舒卷自如，变幻莫测，故名云窝。这里是文人墨客、名宦隐者潜居养心之所。明万历十一年（1583），兵部侍郎陈省曾在此兴建了“幼溪草庐”，建有密云堂、栖云

阁、巢云楼、生云谷、迟云亭等10多处亭台楼阁，并有大量的摩崖石刻，极为富丽堂皇。此时的徐霞客应有所目睹，然无片言只语。他似乎对不远处的茶洞更感兴趣，这个位于接笋峰下的洞口，为武夷山七十二名洞之一，因洞内古时植有名茶丛，故名。幽洞四周有接笋峰、隐屏峰、玉华峰、仙游岩、清隐岩及天游峰、仙掌峰环抱护峙。四周山势高峻，谷井清静幽微，又称幽微洞天。茶洞里还有雪花泉、澹泉和玉华泉汇聚于此，更添幽居特色。徐霞客环顾四周，赞道：“诸峰上皆峭绝，而下复攒凑，外无磴道，独西通一罅，比天台之明岩更为奇矫也。”

当徐霞客攀登上天游峰时，已是黄昏，他站立峰巅，看那西沉的半圆形落日把金光洒向茫茫云海，远远近近的青色峰峦悬浮云端，宛如置身



武夷山玉女峰

蓬莱仙境。远处九曲蜿蜒，层林尽染，武夷山水尽收眼底，令人心胸开阔，陶然忘归。徐霞客赞曰：“其不临溪而能尽九溪之胜，此峰固应第一也。”

次日，徐霞客从仙掌峰西行，寻访小桃源。小桃源也称桃源洞，为武夷山七十二名洞之一。取名小桃源，意指可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的武陵源相媲美。徐霞客沿着松鼠涧的山径曲折萦回，山重水复，几疑无路，岩罅遍布，镌满题刻。山径穷处，忽有一处由石岩崩塌堆积而成的岩洞，进入洞口，迂回出洞后即见小桃源洞口。宋末，抗元名臣谢枋得在此遁世隐居，曾赋诗抒志云：“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是一年春。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后人即书“桃源洞”三字于洞口之额，把诗中“怕有渔郎来问津”作为洞门对联的下联，上联则以“王质观弈，斧柯烂腐”神话典故衍为联句“喜无樵子复观弈”，读来意味盎然。进入小桃源洞口，豁然开朗：近处，小池荡波，鱼虾游翔，田亩平旷，桃梅争秀；远处，薄雾飘荡，青山四合，草木葱茏，屋舍俨然。南是苍屏峰，北为三仰峰，东即玉版岩，西睹天壶峰。在诸峰遮蔽下，方圆20多亩的幽深谷地，山民于此栽桃植荷，养蜂采茗，蒸竹制笋，呈现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徐霞客感叹：“有地一区，四山环绕，中有平畦曲涧，围以苍松翠竹，鸡声人语，俱在翠微中。”

徐霞客依依不舍地走出桃源仙境，继续往西，又沿山越蹬，相继攀上鼓子峰、三教峰和白



武夷山水帘洞天车架

云岩。在白云岩上，他伏身蛇行，盘壁而过，进入“极乐园”。随后又顺九曲溪水而下，泊小舟于一曲的水光石，登岸寻访。他踩着悬架在陡峭崖壁上摇摇欲坠的木梯向大王峰顶攀登，然而到达大王峰半腰的石岩时，四面都是石壁，已无路可上，而且荆棘、草莽又深又密，无法辨识方向。这时已夕阳西下，徐霞客和雇来的挑夫“遂以手悬棘，乱坠而下”。没有登上大王峰顶，徐霞客感到十分遗憾。

第三日，徐霞客经三姑石，再登换骨岩、幔亭峰，又越岭三重，行抵水帘洞。这里又名唐曜洞天，是武夷山最大的洞穴，高度和宽度均超过

百米。水帘洞的水帘，最宽时足有一丈二左右。这里千仞山崖高耸，上部外突，下部凹嵌，泉水从山崖顶上倾泻而下，形成千条万缕的细小水柱。这里最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就是天车架，由于山崖高高地耸立而上部外突，所以山人在山崖半壁上构筑了几幢高矮、大小不一的木屋，有的深藏洞内，有的半露洞外，上下错落，栏杆围护，悬梯环接，飞流直下的泉水，只落在房屋的栏杆之外，徐霞客惊叹：“亦大观也！”

入夜，徐霞客在崇安的客栈里辗转难眠。三天来，他把武夷山的九曲及36峰中的主要山峰、高崖、飞岩及沿途景观几乎游遍了。此情此景，历历在目，不断撞击着他的思绪。他起身披衣，拨亮油灯，挥笔写下近3000字的《游武夷山日记》。

如果说山水游记是一幅画的话，那么《游武夷山日记》就是一幅浅绛山水。浅绛山水画，是山水画的一种，它是在水墨勾勒皴染的基础上，敷设以赭石为主色的淡彩山水画。它素雅清丽，明快透彻，不像青绿山水那样浓墨重彩，艳丽缤纷。徐霞客是在游过安徽的白岳山和黄山之后来到武夷山的，他在《游白岳山日记》和《游黄山日记》中就对白岳山和黄山多处景观作了浓墨重彩的描写。来到武夷山后，他发现这里奇峰群立，碧水九曲，清雅秀美，浑然自成，有一种祖国东南山水的独特个性。这里的山山水水是温润的、素雅的、透明的，但不乏意蕴与美丽。它虽然是丹霞地貌的名山，但是它的特点，不在于

丹霞浓郁的色彩，而在于其奇秀的地形。庄周在《庄子·天道》中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朴素、本真的事物，才是天下最美的。于是在徐霞客的笔下，武夷山成了与白岳山、黄山等诸多名山不同的一幅素雅清丽、明快透彻的浅绛山水画。

徐霞客在他的《游武夷山日记》中不仅详细记述了武夷山九曲溪两岸自然山水的特征、风貌，更重要的是再次系统地把武夷山主要的溪、涧、泉、峰、石、洞、岩等名称进行表述认证，对今人系统地传承武夷山“一溪、九涧、十八泉、三十六峰、五十四石、七十二洞、九十九岩”的名称，具有重要意义。清代初年，潘耒（字次耕）为《徐霞客游记》作序，称其“记文排目编次，直叙情景，未尝刻画为文，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山川条理，胪列目前；士俗人情，关梁阨塞，时时著见；向来山径，地志之误，厘正无遗；奇踪异闻，应接不暇。然未尝有怪迂侈大之语，欺人以所不知”。这段话，正道破了徐霞客《游武夷山日记》至今仍诱人的秘密。

该返程了，百里九曲游不尽，武夷山像一幅长长的画卷，铺展在他脑海中，镂刻在他记忆里。在他看来，武夷山委实是世间最好的地上文章，叫他魂牵梦萦，难以释怀。

每当我重游武夷山，仿佛都能看到徐霞客站立船头的身影，从九曲溪的深处倒影荡漾开来，穿越400多年的二维空间，依然震撼着我们的灵魂。

半世离殇塑乡愁

段 玲

2019年8月17日，按照之前的约定，我步行来到陈一帆雕塑艺术馆的所在地——福州鼓楼区柳河路46号。推开厚重的铁门，迎接我的是长乐籍已故台湾雕塑大师陈一帆的女儿陈子文和她的小儿子徐家华。简短的礼节性介绍后，宾主落座。陈子文深情讲述起了已去世3年的父亲曲折传奇的过往……

一段凄美的爱情

陈一帆（本名陈尊双），1924年出生在长乐鹤上仙街村，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祥来店的长房长孙，家族中经营的产业有酒庄、食杂店、当铺和钱庄（仁昌号），家境优渥。他自小聪明好学，初中毕业后即进入私立福建学院附属中学高中部普通科学习。抗战爆发后，陈一帆随学校迁至闽北，后投笔从戎，考入贵州航空机械学校，成为飞机机械师。

她，李如宝，1925年出生于长乐鹤上沙京李氏望族。曾指挥了闽江口抗日保卫战的著名海军中将、马尾要塞司令李世甲是其伯父，她的亲兄

弟、表兄弟和堂兄弟除了一位在家务农外，其余的全部参加了空军、陆军、海军，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

1945年投军前，陈一帆返乡娶了相貌出众、端庄贤淑的李如宝。他和她的结合，在长辈眼中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在同龄人看来，他们是令人艳羡的一对。1946年3月，女儿出生。他匆匆从部队赶回，初为人父，满心喜悦。抱着怀中酣睡的小粉团，他对妻子说：“冬雪（李如宝小名），女儿也很好，我们把她当男孩养。名字就叫子文，怎么样？”这体贴入微的话语驱散了



陈一帆与李如宝的合影

妻子没能给他诞下男婴的自责。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直到女儿满月他才归队。就是这样一段俗世夫妻相守的日常片段，竟成了陈一帆数十年光阴里时常咀嚼与回味的美好。这记忆也成为支撑李如宝“千帆过尽皆不是”“肠断白蘋洲”仍痴痴守候丈夫归来的力量。

那是1949年，陈一帆从贵州随部撤往台湾，驻守金门。本以为，驻守一段时间后便能返乡与妻女团聚，可谁知，这次随部撤离，一湾浅浅的厦金湾海峡会成为一道横亘在夫妻俩之间的天河，生生割裂了他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愿望。

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后，家族的产业收归国有。家中的几位长辈成为国有企业的职工，大家庭中的各个小家庭开始为各自的生计奔波。为了养活自己和女儿，李如宝带着年幼的陈子文租住在福州台江区，平时靠缝制旗袍上的盘扣养家糊口。有人劝她改嫁，而她心中坚信丈夫仍活着。她，要等他归来！

1972年，陈一帆大舅子到新加坡经商，他托大舅子给家乡寄信，了解妻女是否健在。1974年3月31日，他赴新加坡参加侄儿婚礼时，二嫂将妻子李如宝的信及随信附寄的照片郑重地交到了他手上。他迫不及待，打开时激动得双手颤抖。当得知妻子为他坚贞守候至今，并以一己之力抚养女儿长大，而母女俩也未因他受到牵连时，陈一帆顿时号啕大哭。这一天，离1946年的分离已经过去28载，当年在他怀中酣睡的小粉团也早

已嫁作人妇。

1974年4月6日，他满含热泪给妻子和女儿各写了一封信。在给妻子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这20多年来的长年岁月，由您双手奋斗维持生活，同时抚养子文长大，不知您受尽了多少辛酸苦痛，受尽了多少折磨。我实在太对不起你们母女俩。”“我当尽心尽力给您补偿，家中情况请再详告至明。”字里行间透着无尽的感激和深深的思念。“这20多年冗长的岁月使您母女俩受尽了百般辛苦，除父经常设法援助外，万望吾儿多为您母亲照顾。”“吾儿婚后生活如何，来信一并详告。”对于女儿，言语间自然表露作为慈父对孩子的愧疚与宠溺。

当相思的弦，历经劫波终于连上时，奏响的是和谐美妙的音符。一封封载着满腔爱意与普通夫妻交流日常生活琐碎的书信漂洋过海抵达彼此手中，见字如面的幸福感驱散了因时空距离带来的惆怅。接下来，见面团聚成了夫妻俩最重要的议题，陈一帆还为妻子在高雄购买了一处房产。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如愿团聚。

1983年，李如宝病重，得知消息的陈一帆心如刀割。为了让妻子有足够的钱治病，他以最快的速度为一座寺庙雕塑了佛祖像，拿到酬金后，抢在离银行关门还有半个小时，赶到银行，将钱兑换成港币，之后又火速赶往码头，托跑香港船的同乡带到香港的朋友处，再让朋友寄到福州。

陈子文将收到的这笔钱全部取出，放在母亲的病床前，流着泪说：“依妈，依爸很爱很爱你

的。”李如宝艰难地点点头，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病重的她知道时日无多，但是，亲戚们都在传，陈一帆为了早日回来与亲人团聚，参加了不少外省人返乡促进活动。有生之年能再见一面是他最大的执念。清醒的时候，她跟女儿说：“我有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爸说，要是我不在了，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带到。”终究是病魔快了一步，不久，李如宝带着深深的遗憾阖上双眼。闻知妻子死讯，陈一帆悲痛万分。此后，他更加积极为争取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四处奔走。

1986年12月，陈子文辗转到达香港，暂住在陈一帆香港的朋友处，隔了一段时间才终于见到日思夜想的父亲。父女俩一相见，便哽咽着说不出话来，相拥哭了半个多小时，身边的人也禁不住流泪。等到情绪平复，父女俩聊起了家乡的人和事，当讲到母亲临终所托时，陈一帆抑制不住，泣不成声。

生同衾，死同穴。作为一对夫妻从红颜到白发的相濡以沫，无疑美满幸福。不能做到生同衾，那就死同穴。陈一帆在长乐玫瑰山庄附近购了一块双人墓地，将妻子移葬于此，并嘱咐女儿，他百年之后要和妻子合葬一起。如今，他和妻子在此已长眠相守了3个年头。

一部传奇的人生

驻守金门不久，初来乍到的新奇感逐渐淡去。何日才能回到家乡，见到自己的父母还有心



陈一帆与女儿陈子文在香港的合影

爱的姑娘呢？这种愁绪在金门守军中四处蔓延，陈一帆也不例外，慈祥的双亲、温柔的妻子、可爱的孩子时常出现在他的梦里。

一日，陈一帆在营房外偶然看到墙边有一块白色土疙瘩，看过去很特别，好奇的他端在掌心仔细瞧了瞧，轻轻一捏，感觉土质细软还有一定的黏性。没舍得扔掉，他拿着土块一直走到了海边。水！他下意识地看了看手中的土块。这两者的碰撞，如同下了一道指令，他用海水将土稍稍浸湿，揉搓了起来。泥团在他手心里时而圆时而扁，揉着揉着，越来越黏。他这才知道，自己捡到的是块黏土。捏一个什么呢？小时候就喜欢画画的他，目光越过厦金湾海峡层层叠叠的浪花，极目远眺对岸。只要过了这个海峡，就是厦门，到了厦门就可以回家了。要是有一双翅膀，可以飞

过海峡，那该多好呀。想着想着，他脑海中灵光一闪，就捏只海燕吧。手随心走，不一会儿，一只活灵活现的海燕在他手中振翅欲飞。他将海燕朝着家乡的方向举起，双眼凝望着这只小精灵，眼中升腾起了如烟似的薄雾，那薄雾化作两行清泪，“滴答滴答”掉进了海水里。后来，正是这只被朋友称作“带着相思泪的海燕”，为他打开了通往雕塑艺术殿堂的大门，也成就了他传奇的人生。

传奇的开端，有个人至关重要。他，就是当时的金门防卫司令胡璉。当这只海燕在官兵们手中传递，最终传到胡璉手上时，他爱不释手，找到陈一帆，对他说：“帮我捏塑一个小像吧！”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台北中山纪念馆中的孙中山塑像、中正纪念堂中的蒋介石塑像、玉山之巅的于右任塑像及林森、蔡元培、吴稚晖、梅贻琦、陈诚、胡宗南等一大批国民党元老塑像，都出自他手。其中，最令他感慨万千的莫过于给于右任塑像。

这位被称为“和平老人”的于右任，1962年1月24日，写下了一首名为《望大陆》（又名《国殇》）的诗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之殇！”吟咏之人无不为之动容。1964年11月10日，于老先生带着对大陆亲人无尽的思念病逝于台北。他生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人们便将他写的这首诗作为他的遗言。台湾许多民众团体自发募捐为其塑像。陈一帆为

于右任创作的塑像最终入选。

“在创作的过程中，父亲很多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吟诵起这首诗，每吟一次都会泪流满面。父亲讲述当年创作感受时的神情，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我想，这些诗句肯定是戳中了他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陈子文轻声地讲述着。乡愁牵动乡愁往往能产生强烈的共鸣，正是基于于右任与他共同的情感，陈一帆很快完成了整个作品的创作。这尊半身铜像连同基座高3米，矗立在了高度为3997米的玉山主峰上。1967年8月7日，举行落成典礼，于右任终于了却了登高远眺故土的心愿。这尊铜像亦成为台湾人民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一种象征。



台湾玉山顶于右任雕像

从当年手捏的那只如同精灵的海燕开始，到让他声名鹊起的吴稚晖、于右任、孙中山、蒋介石铜像的创作，直至享誉世界的孔子标准塑像的落成，陈一帆可谓是创造了一个属于他的时代。各种大赛邀约和荣誉纷至沓来，从而奠定了他“台湾人物雕塑第一人”及在台湾雕塑界的地位。在台湾，他被人亲切地称为“别样的历史记录者”。

一个美好的愿景

诗云：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可他乡终究不是故乡。能在有生之年回到故乡，一直是陈一帆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是跟他有同样命运的人此生执着的追求。1987年11月，台湾当局终于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陈一帆立刻将这好消息电话告知女儿，并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回乡。

1988年初，陈一帆历经舟车劳顿后回到了福州。许是近乡情更怯，他没有马上回长乐鹤上，而是下榻在于山宾馆。那晚，陈子文与父亲见面了，第一次见面的悲伤沉重不复存在，充溢的是重逢的喜悦以及日后可以时常相见带来的欣慰。

“第二天，我们夫妻俩带着孩子陪父亲回鹤上。一路上，父亲很少说话，他不时扭头看车窗外。有时会自言自语，‘这个地方还跟我当年离开的时候一样。’‘这个地方变了，我都认不出了’。”陈子文说她看到了父亲眼中的泪光。当车到达村口，在此翘首以盼的族人点燃了鞭炮。

陈一帆一下车，大家纷纷围拢过来。“尊双、尊双……你终于回来了。”长辈们的声声呼唤，打开了他记忆的闸门，离乡前的点点滴滴倾泻而出。拥抱、唏嘘、感叹、欢笑交织在这纷飞的鞭炮碎屑里。陈一帆擦拭掉眼泪，看到熟悉的长辈已所剩无几，大多是同辈和晚辈。凭着当年的记忆，他努力地辨认着，试叫着儿时玩伴的名字，印象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当天，陈氏宗祠大门大开，迎接这位离乡42载后归来的游子。祭拜过列祖列宗后，他来到父母坟前，未能尽孝的内疚让他长跪不起。在妻子坟前，他哽咽着诉说着别后相思。在随后的几天中，他在亲人的带领下把整个村子走了一遍。那些曾经熟悉的小路，熟悉的风景，还有那些离别后新辟的道路和景观，在他眼里都很亲切。

我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呢，这是陈一帆回乡后想得最多的问题。之后，他陆续捐款近百万港币，用于当时鹤上乡修建自来水厂，为仙街村修路、建敬老院、仙街小学加层……

花甲之年能再次踏上故土，他无疑是幸运的。更幸运的是，他还将承担起更光荣的使命。这使命得益于他为台湾地区塑造的孔子标准像。

1985年，台湾当局行政部门、教育部门、孔孟学会联合公开选拔一尊为大众公认合于标准的孔子像。该塑像以唐代吴道子绘“孔子行教像”为标准，陈一帆创作的3.2米高孔子像最终入选。

“孔子的为人处世温良恭俭让，他的智能特质不惑、不忧、不惧，他为万世留下温而厉、



孔子像创作过程

威而猛、恭而安的总体形象，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上述的种种特质才是雕塑家塑造孔子所要追求表现的目标。个人经验告诉我，孔子塑像没有最好，谁能更多把握孔子气质和神韵，谁就能做得更好。”陈一帆曾在他的《我心目中的孔子》一书中透露着他对孔子的无限敬仰和当时的创作心得。正是这种对孔子精神内核的精准把握，让他在两轮投票中打动了 13 位评委，最终全票当选。

1988 年 7 月 14 日，中国国民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上，陈立夫联合 34 名评

议委员，提出《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提案。这份提案立即在海峡两岸和海外侨胞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两岸互信合作，促进中国统一——评国民党中评委陈立夫等人的提案》的评论员文章，认为陈立夫等人的提案“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1989 年初，陈一帆受陈立夫等 35 位立志祖国统一的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委托，启程赴京，共同致力于中华文化公园建设，并开始设计孔子巨像。后来，由于诸多原因，最终未成。

1990 年，陈一帆回福州定居，回乡后的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孔子像的塑造上。这些孔子塑像又被他分别无偿捐赠给了中国人民大学、福建医科大学等 10 多所大学、中学及一些孔子学院，他还特别向长乐一中和长乐吴航书院各捐赠一尊孔子雕塑。

2010 年 5 月 31 日，陈一帆出任闽江学院美术学院雕塑系客座教授。随后，闽江学院分别在



陈一帆先生为长乐吴航书院孔子像揭幕



陈一帆先生被聘为闽江学院美术学院雕塑系客座教授



2017年7月20日，陈一帆雕塑艺术馆在福州开馆

美术学院和陈一帆所居的柳河别墅设立闽江学院陈一帆工作室，他将自己的技艺倾囊相授。后因眼底黄斑病变，细部的雕塑未能亲力亲为。再后来，坐上了轮椅。但是，他仍然牵挂着那个未竟的心愿——在福州建一座比美国自由女神像还要高的孔子巨像。他在接受《福州晚报》记者的采访中谈道：“中国人的精神就是孔子精神，可以高度地概括为仁爱精神、孝道精神与礼义精神。这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直接上升为中国人的信仰：仁爱、和谐、真诚。我希望立一尊比自由女神像还要高的孔子巨像，立在我的家乡中国，让大家一看到他就知道，仁爱之乡到了。”赤子之情溢于言表。

在离世前的2个月，陈一帆精神已十分不济，但一谈起孔子巨像，他眼里总会放光。2016年7月20日，陈一帆病逝于福州。

家乡没有忘记这位为弘扬中华文化奔走一生的爱国雕塑家。2017年7月20日，海峡两岸雕

塑界合力共建的陈一帆雕塑艺术馆在福州开馆。两岸雕塑界开始在海峡两岸及世界各地寻找陈一帆作品。2019年7月20日，陈一帆雕塑艺术人生展在长乐区博物馆开展。台湾一批海军、空军校官儿孙组团参加开展仪式，近200位陈一帆亲朋好友兴致勃勃地从福州各地驱车前来观展。开展仪式上，陈一帆的女儿、陈一帆雕塑艺术馆馆长陈子文在讲话中多次深情致谢家乡长乐。

如今，在陈子文和她小儿子徐家华及海峡两岸雕塑界共同努力下，陈一帆雕塑馆已成为海峡两岸中华名人主题雕塑作品展示地、交流地和青少年公益课活动中心及传统文化的传承地。每年慕名前来参观交流的团队络绎不绝。

在陈一帆近百年的人生历程中，他经历过，伤心过，期盼过，努力过，也遗憾过，但这一切并没有随着生命的逝去烟消云散，而是集结在他富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里，树立成一道永恒的风景！

谢杰和册封舟

璵 珞

明清两朝，福州籍的册封使共有5位，其中明朝的两位是陈傅和谢杰。由于资料欠缺，陈傅出使琉球难以考证。而谢杰出使琉球对后世影响颇大。

谢杰（1535-1604），字汉甫，号锋梅，今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江田镇人。谢氏族谱中记载，长乐谢氏是当地望族。谢杰“幼警敏，博学能古文词”，明隆庆四年（1570）乡试中举人，万历二年（1574）中进士，授行人司行人。这个职位在京官中地位低而声望高，晋升极快。初中之进士，以任此职为荣。谢杰两年后就被派遣出使琉球，回国后，历任光禄寺丞、两京太常寺少卿、顺天府京兆尹、南京刑部右侍郎、京城刑部左侍郎、南京户部尚书。逝后，万历皇帝“赠太子少保，遣官护丧，赐祭”。谢杰自出使琉球时的正七品晋升至正二品，逝后又被升级为从一品。在琉球册封使中能如此平步青云，得到万历皇帝恩宠，又得上司赏识的官员很少见，比如一起出使琉球的正使萧崇业，最后仅官至正四品的太常寺



长乐东岚谢氏宗祠内的谢杰像

少卿。而谢杰并非靠巴结奉承取得这样的地位，反而是经常规劝皇帝要“孝亲、尊祖、勤政”，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尽心尽责。

谢杰著作颇丰，著有《顺天府志》《使琉球录》《琉球录撮要补遗》《日东交市记》《白云集》《遗诗》等多种。清朝时出使琉球的周煌非常欣赏谢杰写的琉球文章。他说谢杰的《使事补遗》，第一次认真地把琉球内容细分为8个部分：

原委、使礼、册封、用人、启行、敬神、国俗、御倭。此外又有《日东交市记》，琐言二条，曰事权，曰恤役。在《琉球录撮要补遗》和《日东交市记》中，谢杰详细说明了册封舟造船和行船的用人问题。周煌对此十分敬佩，这促使后来的使者不敢马虎敷衍，十分认真完善自己的出使笔记，把琉球的情况写得更具体，方便后来使者参考。

谢杰也是明朝出使琉球的册封使中第一个认真记录倭患问题的官员，并与自己麾下人员共同研究撰写了一本研究日本问题的书《虔台倭纂》。那么，谢杰出使琉球的经历如何呢？

建造册封舟

万历四年（1576），明朝任命户科左给事中萧崇业为琉球册封正使、行人司行人谢杰为琉球册封副使，前往琉球册封琉球国世子尚永为中山王。明朝期间，琉球国的君王在位时间都很短，和万历帝一起登基的尚永王在位16年，30岁就病死了，但这已是明代在位时间很长的琉球君王了。

明万历元年（1573），9岁的明神宗朱翊钧和13岁的琉球国中山王尚永同时登基。两人都是儿童皇帝。万历四年（1576）任命萧崇业和谢杰出使琉球时，明神宗才13岁。了解明史的读者都知道，万历帝登基后并不执政，而是首辅张居正全权主持工作。其实明万历三年（1575），明



三坊七巷福船文化馆内的册封舟船首模型

朝已同意册封尚永王，但册封的过程特别麻烦，各种事务一拖就到了万历七年（1579）的夏天，萧崇业和谢杰才前往琉球。为何拖这么久呢？萧崇业在他撰写的《使琉球录》中说，因为嘉靖年间倭寇一直侵扰福建，导致福建为了建造多艘战船，把境内的许多良木都砍伐光了，而册封舟远航需要最好的木料，结果“采木经年”。采木经年还不算，造船找合适的工匠也难。怎么个难法呢？谢杰撰写的《琉球录撮要补遗》里提及了。

谢杰在京城是个两袖清风的小吏，出使琉球前，由工部制造、礼部颁赐一套麒麟服，但佩戴的玉带需自备。因昂贵谢杰买不起，本想用保定石来替代，但和玉带对比品质差别甚大，担心到了琉球貽笑大方。刚好同僚张中贵别号“中山”，得知谢杰的烦恼后就对谢杰说：“谢使君去琉球封

中山王，我的号也是中山，这也算缘分！”就慷慨地把自己的玉带借给了谢杰。

谢杰到福州负责册封舟的建造，没想到这件事不仅费钱费力，既要找到合适的能工巧匠，还要协调各方力量。所以谢杰在《琉球录撮要补遗》中回忆册封舟建造之艰难：“天下事，假之以权则易集，权不在手则难成；况使夷航海，大事、危事乎！”这是说集权办事容易，手上无权就难了，而且航海出使琉球，更是要命的大事。

谢杰为何发此感慨呢？因为那时福州没有巡抚，一切政务均由巡按御史来管理，结果权力分散，政事处理零乱。而且福州地区的倭寇尚未清除，他们不断前来骚扰，军队自救不暇，也无力帮谢杰处理册封舟之事，只是简单地在民间贴个告示：“封船、战船，事同一体。违误作弊者，以军法处理。”

军方贴出这样的告示，乃因福建的一木、一料、一夫、一役皆由军队管理。管理军队的不是别人，就是督舶太监。这督舶太监贪污受贿不在话下，对福建地方事务都要插手干预，权势如日中天。按理，督舶太监要协助册封使的工作，但这些被皇帝宠信的太监目中无人、无法无天，哪里管册封使的生死？军方对福建各衙门官员说：“采木虽系册封的事，也会骚扰民间。所有科司不许伐人墓树、风水树，不许拆人篱舍，不许伤人田禾；一旦发现，以军法处理。”也就是说，军方不想帮他们造册封舟，想节省一点费用，拿来造战船。这样一来，造册封舟就更难了。那些

买木材和造船的人常常被一些囤货居奇的刁民捉弄、诬告。这些刁民每次告状都能赢，让那些造册封舟的人获罪。获罪还算小事，没有株连无辜的人才是大幸。谢杰因此感慨，明朝有册封琉球使者以来，这是头一次碰到军队如此蛮不讲理。当然，此前造册封舟也很难，甚至不顾册封使命用战船代替，但那是在嘉靖年间倭寇侵扰的非常时期。最后，在谢杰的努力协调下，军方才同意建造册封舟。

造册封舟需要大量的铁条和铁钉。军方派人到尤溪花了大价钱买了质量最差的铁料。负责造船的官员发现用这样的铁料造的册封舟在海上是禁不起风浪，就予以拒收。采购之人竟昧着良心反到军方那里诬告，结果造船官被军方捆绑关押。谢杰只好出面为造船官化解冤屈。

接下来买木材也同样遭遇了诸多波折。当时造册封舟的木材除了福州附近山区的，就是建宁的最适宜。其中船桅必用杉木，舵木必用铁力木，还要樟木和其他杂木。这些木头应是几百年的老树。从偏远县区的深山老林运到福州十分费力。每过一乡运输巨木，需要整个乡村的民夫400多人来拖拉。每走一程就要换一乡的人来拉。十个乡就要动用三四千人。沿途经过各府、县，大约要发动10万人。实际上，每次这么多人拖拉巨木，花费的时间只是片时数刻而已。军方听说如此耗费人力，就换了一个做法，让600多名士兵来做，每天工薪加倍还配上好的伙食。这些士兵刚开始很乐意，可才10天就没人肯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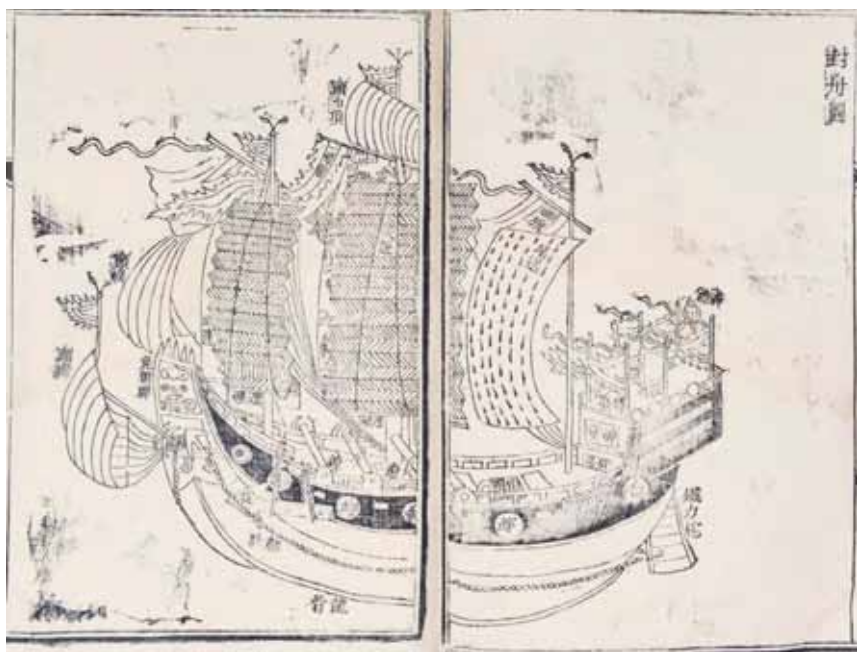
因为原本要 10 万人昼夜轮流接力去做的事，现在由 600 个士兵来担当，且必须一个多月做完。谢杰调查了解情况后，就又去找军方协调说通，依旧按照原计划来执行。

造一艘册封舟通常需 3 年时间，其间要解决的问题层出不穷。萧崇业完全不知所措，全赖谢杰去协调，所以在他撰写的《使琉球录》中诚恳地感谢谢杰。这是由于册封舟上需使用的物品，萧崇业和谢杰的官费根本不够支付，只能借用民间商人物品，用完了再退还。一些奸商设法用低劣器具来应付。谢杰是本地人，知道如何应对。他对这次福州监督造船成功的总结是：“我从容、温和婉转地耐心解释沟通，军方也能理解接受我的意见。所以，虽然工期推迟，但也不失为正直君子所为。”

谢杰的事务被军方多方刁难，和他当时官职低有关，但他善于沟通协调，为人宽宏大量。让军方和正使萧崇业都十分敬佩，后来的一件事同样显示出他的崇高人品。他年轻时，父亲谢廷袞曾是长乐县学教谕，晚年有同族人冒他之名逃避赋税。当时县令刘禹龙告诉御史，逮捕谢廷袞。谢杰代父辩解，几乎被县衙役打死。谢杰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

时，刘禹龙辞职家居南赣。刘禹龙深恐谢杰趁机报复，但谢杰没有这样做，世人知情后皆服其度量。

造册封舟，除了前面谈的购买巨木和铁料困难外，造船和行船的用人问题更难。谢杰说航海以船为命，造船的船匠很重要，这是基础，而船匠需要两种人：一需漳州的船匠负责把船造得坚固耐抵风浪；二需福州的船匠来合理设计船的规格样式。这两地的船匠缺一不可。行船期间，福州和漳州两地的匠人缺一不可，各有长处。漳州船工主要负责掌舵过海，而从福州出发则需要福州船工，因为福州的水路是否有暗礁，深浅如何，非福州船工不可。通常情况下，福州船工都选择长乐梅花、连江定海人，这些人深谙闽、浙



册封舟图

海道。还要选一个福清的万安船工。这样每一航程都需要不同洋面的当地船工引导，共同合作。船上也有来自琉球的船工30人专门负责琉球的海路。谢杰是第一个写造船与行船用人的册封使，对后来出使琉球的使者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用人参考依据，少走了弯路，大大节省了国家的造船经费。所以，后人都夸赞谢杰对册封舟的建造贡献很大。

在萧崇业与谢杰之前，陈侃、高澄、郭汝霖都写了《使琉球录》。谢杰在此基础上考虑得更周全细密，做事也圆融得当，协调有力。此后，出使琉球的使者基本依照他的记录来造船和用人，避免了损失。

谢杰眼中的倭人倭事

谢杰和正使萧崇业一起出使琉球。萧崇业写了《使琉球录》，而谢杰写了两篇补充，说明了琉球必请中国天使去册封琉球国中山王的原因在于中国来琉球举行的盛大封王典礼非常威武庄严，足以震慑到琉球国内的日本人，让他们对中国护佑下的琉球不敢轻举妄动。那时琉球国小民贫，



册封琉球中山王仪式大典场景还原

不时向日本贷款。每遇到册封使来琉球，倭商不管在哪里，都要跑来看中国册封琉球中山王的仪式大典。倭商名义上是来祝贺，其实是来向琉球追债的，因为中国册封使总会带来丰厚的礼物。

萧崇业和谢杰所带领的册封使团到达琉球时，倭人商船得到消息已先期到达琉球了。倭商中掺杂着倭寇。倭人所居舍馆，与中国册封使团居住的天使馆相距不过2里。琉球官方担心倭商在琉球惹是生非，不利于中国册封使团，就经常对两个册封使说一些危言，想把册封使团迁往久米村中居住。谢杰反对道：“只要管好自己，就不必担心。如果无故迁走，就是避倭，岂有堂堂中国惧怕他国的道理呢！我这次来，碰巧倭商也来贸易，原本没有纠纷恩怨，不是敌人，不用担忧！境外无私交，这是规定。只要管好自己的下属随从，不和倭人来往，就没事。”接着再次告

诫自己的随从人员，禁止与倭人交往贸易，违者一律问罪。命令下达后，随从人员都十分遵守纪律，无人违法。

过了一段时间，台风袭来，册封使团船队衙役与倭人在港口各自护船时发生冲突，倭人拔刀伤到衙役首领。首领顿时血流淋漓。谢杰为首领验伤，看伤口是被刀背所伤，不是刀口，庆幸地说：“这是倭人情急防卫自救，不是有意刺伤。通知所有衙役都回天使馆来，稍后我通知琉球科使方面去倭人馆里告诫他们。这些倭众必不为祸。”不久琉球中山王派了2000人来协助册封使团的船队妥善护卫好册封舟。倭众也不敢再犯。

正是这次出使琉球令谢杰眼界大开，深刻了解中国与琉球、日本之间的关系，以及日本的倭患问题，为以后撰写的重要著作《虔台倭纂》奠定了实地调研基础。他在《虔台倭纂》中介绍了日本的名称、地理位置、山川地形等，记录了明代中国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过程。谢杰认为中国应早日修筑海防，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好防备工作。《虔台倭纂》书中附有详细的《万里海图》和东莞县的大头船（乌艚）和闽船（白艚）的样式。闽船有六种，一二号曰福船，三号曰哨船，四号曰冬船，五号曰乌船，六号曰快船。这六种闽船都是用杉木制造。福船高大如楼，共4层，是当时海战的利器。在书中他还用心地让人把这些船的样式一一绘制。除了这些，连兵器样式也有介绍并配有绘图。

谢杰的却金志

日本对琉球虎视眈眈，琉球就愈加依赖中国，渴望中国派册封使来册封中山王也是想借中国力量壮胆，自然不敢怠慢中国的天使。嘉靖十三年（1534），尚清王为感谢册封使者陈侃辛劳奔波，赠40两黄金，陈侃谢绝。尚清王又命贡使把这40两黄金并一封信呈送嘉靖皇帝。嘉靖帝就命陈侃等收下。琉球为褒扬他们清正廉洁的操守，在王公贵族聚居的首里（今那霸）建“却金亭”。这赠40两黄金就成了惯例，以后中山王都要赐予册封正副使一笔40两的赏金。册封使们都会多次谢绝并写一首却金诗以表心志。谢杰也不例外。

谢杰在《却金诗》中写道：

夷中一宴一酬金，使君不改初来心。

还君酬金尽君爵，为君翻作却金吟。

……

不改初心，是谢杰的书生本色。谢杰有如此金子一般的却金志，为人自然清正，官运亨通，得到万历帝的赏识。据传，他任职期间还有各种奇遇。万历三十一年（1603）寒冬提前降临，眼看漕运就要误期，谢杰十分忧虑，向天焚香祷告。而此时，尽管漫天大雪，运河竟没有完全封冻，留下一条水运通道，使运粮船如期到达。真可谓苍天不负有心人，朝廷上下都十分惊奇，对谢杰也充满了敬佩之情。

琉球册封使齐鲲

明月雪

在琉球，来自中国的册封使被称作“天使”。明清两朝册封国王的正使很多，其中有5位是福州人。5人中的齐鲲，去册封琉球国王可谓梦想成真。齐鲲不仅实现了愿望，还在琉球国留下了许多遗迹，并记录下在琉球国的所见所闻，成为中琉交往的宝贵历史文献资料。

两世翰林之家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齐鲲出生于仓山区盖山镇的齐安村。唐德宗年间，齐姓入闽始祖奉命入闽平乱。他的后裔选择在仓山区高盖山北支脉的齐坑山居住，以“齐安”作为村名，祈求世代安居乐业。齐姓族人由此人丁兴旺。



齐安村齐氏宗祠

清康熙年间，齐鲲的高曾祖父齐耕师因擅长会计，在姑苏城（今江苏省苏州市）做贸易而发家致富，便举家由齐安村迁往光禄坊新居。住在光禄坊后，素喜诗文酬和的齐耕师常常在府邸内宴集文人雅士。其长子齐念祖还娶了隔壁的内

阁中书、藏书家林佶的孙女为妻。由此，齐家文风炽盛。齐念祖的长子齐璋善于讲学，成为福州知名教师，声名远扬。齐璋的长子齐弼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中殿试二甲，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是培育高级文官的摇篮和培养高层次学者的场所。明英宗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由此可见齐璋教学有方，长子齐弼和长孙齐鲲都是翰林。

齐弼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后，留在福州家乡的长子齐鲲已长大成人，因为同样得到齐璋的良好教育，17岁便在省级科举考试中中举人第二名。清嘉庆时期官场腐败，嘉庆帝换了一茬又一茬的腐败官员都无法阻止层出不穷的腐败问题。在此情形下，不擅于人际交往，更不会巴结逢迎的学者型官员齐弼最终难以留在人才济济又靠关系才能升官的翰林院里，只好“请咨赴任”，于癸丑年（1793）秋，被选任湖南醴陵县知县。

齐弼去醴陵县任职前，就奉父命先回到福州，带长子齐鲲进京会试。谁知，齐鲲也中殿试二甲，同样是馆选复试成为庶吉士，与齐弼一样，成为翰林中人。

正一品大员齐鲲

齐弼、齐鲲父子二人先后进入翰林院，成为福州齐氏族人的荣耀。而7年后齐鲲奉命任琉球国册封正使回到故乡福州，更是福州齐安村人的骄傲。

嘉庆六年（1801），26岁的齐鲲赐进士出身即殿试二甲，和齐弼一样复试后因德才兼优入翰林院学习成为庶吉士。庶吉士在翰林院的学习时间是3年，嘉庆九年（1804）散馆评卷（毕业考试）时，齐鲲和父亲齐弼同样因成绩优异而被授予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此后3年的工作期间，齐鲲的表现深得上司和嘉庆皇帝赞赏，他们认为此翰林品行端正，工作能力强，又是福州人，若把册封琉球国的重任交给他，必定能圆满完成任务。

同样是出使琉球，清朝的齐鲲比明朝的谢杰幸运得多。明朝出使琉球的福州籍副使谢杰穿的是麒麟服，而齐鲲穿的是麟蟒服。麒麟服和麟蟒服（蟒缎披领袍）只是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麒麟服是四、五品的将军、提督官服。蟒与龙相似，蟒服是皇帝赏赐官员的赐服，穿蟒服要配玉带。官员获得这类赐服是极大的荣宠。康熙为了显示中华对册封琉球的重视，特赐琉球册封正使正一品麟蟒服，由工部制造，礼部颁给，玉带自备。本来文臣一般不穿麟蟒服，但去琉球让文臣穿麟蟒服是示武，即该天使是文武兼备的钦差官员。正使披麟蟒服，那么整个册封使团的规格都得以相应提高。阵仗仪式也不同以往，出都门，肩舆八人，例持节。诏敕前有黄盖、龙旗等仪，皆由工部咨取，以壮天威。一品麟蟒服配置八抬大轿，京师从未有八座出都者，唯琉球、安南册封使有如此高规格的待遇。由此可见齐鲲出使比明朝谢杰出使更加威风凛凛。

康熙为何如此重视琉球呢？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十分满意琉球尚贞王的忠诚，说：“其恭顺之诚，深可嘉尚。”不仅减免琉球贡船的关税和方物，还增加了一只接贡船给琉球，同时，派往琉球的册封使的级别比起明朝有了提升，不再派兵科武官出使，而改为文臣，以翰林为正使，外表必须“仪度修伟”。还赐予正使正一品的麒麟服。当然，琉球王对朝廷的忠诚是有基础的。明朝花了近300年的时间对琉球进行宣教，并在经济上长期支持琉球。琉球早已被中华文化同化，相当于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已无二心。清以后，琉球人向中国学习技艺，包括成衣匠、刻字匠、剃头匠等，又对康熙如此恭顺，所以康熙认为天使出使时不必像明朝那样派三五百个士兵防护，只要凭文官兼武官身份带兵去壮国威即可。

齐鲲南台出航

两个琉球册封大使从北京出发时，惯例是武官捧着用黄盖罩着的诏敕前行，之后是皇家仪仗队、持旌节，赏恤物品等，最后是坐在八抬大轿



淮安村茅原驿古渡

里出使琉球的正使、副使。轿子前面有背着弩弓者和带刀者各一人，轿子后步行的人有持枪者2人、抬轿替换者4人。他们后面还跟着管理官私物品的人员，各有专职。

嘉庆十三年（1808）闰五月初二，琉球册封正使齐鲲、副使费锡章的船只抵达洪山桥。福州府管辖的闽县县令、侯官县县令一起来洪山桥的官渡码头——茅原驿迎接。

齐鲲为此赋诗《五月二日抵福州省城喜作五古二首》，其一：

六载宦京华，乡关萦梦寐。
昔歌游子吟，今喜征夫至。
熏风吹远陌，蒲艾交荷菱。
西郊捧绛节，十里喧铙吹。

从这首诗可知，齐鲲在京已经6年未回福州

了，乡愁正浓。当年进京赴考的游子，今日竟然披着麟蟒服、捧绶节，衣锦还乡。福州地方官恭敬地安排了十里鼓乐吹捧。此一时彼一时，身份天壤之别，他能不感慨万分吗？

正午时分，奉诏敕（圣旨）和赏恤物品的人先登岸，把诏敕放置在龙亭、彩亭里，抬着龙亭和彩亭及礼品送到正副使者住宿的馆驿安奉。所有福州高官接着来馆驿向两位琉球册封使恭请圣安。对齐鲲而言，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荣耀。

5月3日，齐鲲到南台，手持龙节奉命前往琉球册封中山王。南台河口一路上人山人海、旌旗招展，夹道的飘扬旗帜中，官方安排的乐队吹笛打鼓、海螺齐鸣，欢送琉球册封正副使启航。齐鲲赋诗道：“此行聊以壮国威。”当册封舟行至黑水沟时，他又赋诗表示：“冯夷原效顺，不必耀戈矛。”可见他不崇武，十分信任琉球对中国的忠诚。

册封舟从福州南台启航，驶至五虎门等候西南风前往琉球国。这一等就是8天，直到5月11日才有西南风，于是册封舟自五虎门经官塘放洋，于5月17日抵达琉球那霸港。

针路与钓鱼台

嘉靖十三年（1534），陈侃出使琉球前向礼部查询前任撰写的出使琉球记录，没想到礼部找不到了。陈侃出使琉球回国后就撰写了一篇《使琉球录》，详细记载他出使琉球的整个过程，包括

福州到琉球的针路情况。此后历任天使也都有相应记载。齐鲲出使时，则参考汪楫和周煌所写的针路，认为周煌写的更精密准确。针路对于航行非常重要，用错了相差十万八千里，甚至可能船覆人亡、丧命海中。

有意思的是，这些册封舟同样是夏至乘西南风，冬至乘西北风，都是从福州五虎门启航前往琉球。齐鲲参考前面几个使者的针路，可最后他们经过最重要的钓鱼岛时使用的针路却都不同，结果也差别很大。齐鲲在记录中描述出使琉球时的针路，表示从福州五虎门到琉球国的姑米山方可停泊。但是从明朝夏子阳到清朝的汪楫、周煌用的针路都不一样，即使清朝的针路比明朝愈加精密，但依然不能完全照搬前人使用的针路，而是根据各船的行驶情况而定。所以，齐鲲的册封舟抵达那霸港时无法进港，只能在外停靠两天等风来运力，就因为针路使用不准确，船被风吹到那霸港的北边了。

齐鲲在前往琉球的册封舟上还写了福州至那霸的一组五言律诗即《航海八咏》，分别歌咏了太平港、五虎门、鸡笼山、钓鱼台、赤尾屿、黑沟洋、姑米山、马齿山八地的景观。其中《钓鱼台》：

钓鼃人已往，但见钓鱼台。

绝岛重重峙，沧波滚滚来。

谁邀湖海侣，独占水云隈。

应笈披裘者，登临亦小哉。

在所有的册封使的记录中，必定会出现“钓



《顺风相送》中关于钓鱼台的记录

鱼”二字，但各位琉球册封使对钓鱼岛的称呼各有不同，因此出现“钓鱼屿”“钓鱼台”“钓鱼岛”“钓鱼山”4个名称。明永乐年间有一本书叫《顺风相送》，里边《福建往琉球》一章就详细记载了钓鱼屿在台湾基隆东北海中，为我台湾省附属岛屿，今名鱼钓岛，又名钓鱼岛。此外，由于钓鱼岛附属的赤尾屿和琉球群岛中的古米山（姑米山）之间有一道很深的海沟，水深2-3千米，所以陈侃《使琉球录》中明确写道：“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这个沟就是钓鱼岛和琉球的边界。由于沟非常深，史书上称黑水沟，册封使们说这海水叫沧海色，每次经过这个地方都觉得很害怕，因此每次经过都要祭海神，投生猪、羊。

其实黑水沟来自台湾暖流，海水颜色较深，流速较快，对于中琉航海或海峡两岸的海上交通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古代科技不发达，常视黑沟为畏途，皆以钓鱼岛作为进入黑沟前的航标。这

就是册封使们都会记录钓鱼台的缘故。而黑水沟也成为明清与其藩属国琉球国的分界线。由此佐证钓鱼岛属于中国。

齐鲲与梁章钜的情谊

齐鲲回国后撰写的《东瀛百咏》成册后，有不少朋友为他的书作序，他的同窗好友、中国楹联学开山鼻祖梁章钜则为书题跋。衣锦还乡的齐鲲以琉球册封正使身份回到福州时，梁章钜刚好也从京城回到福州，入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与林则徐共事。梁章钜比齐鲲年长一岁，却比齐鲲晚一年中进士，同样授翰林院庶吉士。由于比齐鲲晚一年中进士，梁章钜在题跋里谦称自己是“愚弟”。梁章钜在这篇题跋中说齐鲲请他题跋，而他自觉文采欠缺，但又不敢推辞，回忆他们同习举子业时，嘉庆庚申年（1800），琉球册封正使翰林编修赵文楷和副使翰林修撰李鼎元一起来到福州。赵文楷当时披一品麒麟服，坐八抬大轿，兵卒拥护而行。当他们二位使者持龙节出现在南台时，江畔观者塞途，摩肩接踵。梁章钜和齐鲲也挤在人群中翘首观望盛大的出使典礼。齐鲲对梁章钜说：“仕宦之荣，斯为极矣！若出于吾邦士夫，则其荣当有加者。”意思是琉球正使若是福州本土人，那才是当官最荣耀的事。齐鲲又说：“古圣人以不辱命与有耻二者概为士之大端，而学优则仕者，又以不能专对为虑。靡徒薪达于政已……”发表了士大夫的家国使命观。齐鲲当

时在策论方面已经很有见地，所以后来由进士入翰林就一点不意外。但他想不到自己一语中的，真可谓梦想成真。第二年不仅考中进士，8年后也如赵文楷一样披了一品麟蟒服，坐八抬大轿，兵卒拥护而行，持龙节出现在南台。因此，梁章钜回想这情景感慨万千，没想到自己不仅与同窗好友一起有机会见证乾隆时代的两个翰林赵文楷、李鼎元出使琉球，又亲自恭送好友齐鲲上册封舟出使琉球。这一切真是如梦啊！

虽然齐鲲出使琉球成就了他个人仕宦生涯的一段佳话，但此后他的仕途不如明朝的福州琉球册封副使谢杰那么顺利。出使琉球回国后，他调为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知府，任上也励精图治，革除摊派车马的弊政，并勒碑宣示。嘉庆十九年（1815）秋，齐鲲调赴睢州（今河南睢县）负责治水，历经3年工竣，议叙以道台调用，但刚巧齐鲲的父亲齐弼过世，因此丁忧扶丧回到福州，殷勤侍奉母亲。谁知，家里灾难不断，他的掌上明珠、才女齐祥棣因未婚夫病卒，便投入自家玉尺山房的莲花池中殉节，被称作“未婚贞烈齐女”。

回家两三年，齐鲲受父亲和女婿去世、女儿自杀多重打击后一病不起，不久于福州玉尺山房家宅中逝世。玉尺山房位置即今天的光禄坊刘家大院。

据齐鲲后人说，福州市仓山区齐安村内的齐家老宅里原有一张古画。画的内容是齐鲲穿着一品麟蟒袍，脸上神采奕奕，正搭乘册封舟前往琉



冲绳首里城的齐鲲书法“活泼泼地”石碑

球国。这张古画是齐家人全体的荣耀，最后一任保管这幅古画的是齐鲲的嫡孙齐成章。齐成章去世前曾经告诉后人，当年老厝里有4幅齐鲲的古画，一幅是他在翰林院内的朝服像，一幅是他去河南府上任的画像，一幅是他穿着儒服在书院内的读书图，最后一幅就是最珍贵的齐鲲在册封舟上的画像。

齐鲲曾被日本友人喻为“中日友好的使者”。20世纪80年代日本友人来参观，得知这些古画在“文革”中被销毁，感到非常遗憾。今天冲绳县尚留有齐鲲出使琉球时的遗迹——《诏馆碑记》和石雕书法“活泼泼地”。

那一片宫古蓝

柏 荣

我们乘坐的“丽星号”邮轮，经过一夜航行，穿过台湾海峡。天色渐渐放明。游客们纷纷走上甲板，在猎猎海风中，裹紧衣裳，等待观赏海上日出。东方的天边，聚着一大团乌云，它们好像得到指令，紧紧锁着天穹，时刻不肯懈怠。我们感觉得到初阳升起时的艰难。一会儿工夫，厚厚云层似乎正被一点一点撕扯开，接着，乌云边缘泛起道道红光，仿佛燃烧起来。再定睛一看，一轮朝阳已挣破乌云，跃上天空。此时的海水仿佛也换了颜色，是一片近乎透明的浅蓝。前方，出现了几个小点，邮轮鸣响汽笛，宫古岛就要到了。

在中国台湾和日本之间，有一条环太平洋岛链，依次是先岛群岛、冲绳群岛以及奄美群岛和大隅诸岛等，前两组岛屿称琉球群岛。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固不待说，著名的宫古水道，便是东海进出西太平洋的主要国际通道。宫古列岛是先岛群岛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主岛即为宫古岛。

宫古岛像漂在太平洋上的几片树叶，说是几片，是因为宫古岛周边还有几座小岛，较大的有伊良部岛、下地岛、池间岛和来间岛等，统称宫古列岛。除大神岛外，它们之间都有跨海大桥相连。宫古岛是其中面积最大的岛屿，有158.65平方公里，比我国的东山岛略小。



船刚靠港，就听到码头上传出悦耳的鼓乐声。走上甲板俯身看，是一支民间乐队，正列队在码头演奏。

这是宫古岛特有的迎送仪式。每当从中国来的邮轮靠岸或离港，宫古岛的民众便会盛装到码头迎送。他们打出鲜艳的中文标语横幅，敲锣打鼓，吹奏音乐，热情如火。这是因为，近年来的旅游观光业给宫古岛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每当一艘中国邮轮靠岸，就意味着有 2000 多个游客上岸，岛上的出租车全部出动仍供不应求，大大小小的酒家、商铺有了生意，就连街边上临时搭建的大排档，也都一片火爆。

这里曾是琉球王国的领地，不过，由于岛上缺淡水，过去一直是一座荒岛。最初只是一些到外海捕捞的渔民，因为避风而来到这里，并在这里建立临时住处。明洪武年间，应琉球中山国王的要求，朱元璋下诏，征调福清三十六姓船工迁往琉球。他们在琉球的居住地称久米村。随着人口增长，这些闽人后裔，有小部分到了宫古岛。岛上渐渐有了人家，有了码头，也有了渔港。岛上的沙土地还适合种甘蔗。1609 年日本萨摩番以武力征服琉球，1872 年日本明治政府废琉球国王，改为琉球番。宫古岛也就成为日本的属地。但岛上的不少居民，还保留着他们的远祖来自中国福建的模糊记忆。确实，当我下了船，

第一眼看到站在面前的出租车司机，两位宫古的中年男子，宽宽的四方脸庞，与福清人的相貌十分相似。

我们一行 6 人乘坐的两部出租车，是邮轮服务台帮我们预订的，在岛上的游览路线和时间，都打印在一张 A4 纸上。两位司机虽然貌似福清人，其实不会说汉语，但中文却是看得懂的。他们拿着这张行程表，小声地商量了几句，便招呼我们上了车。

本来下岛游览的游客，是统一坐大巴的。只是我们报名晚了，大巴已满员。服务员说可以为我们叫出租车，但包车费用要高些。这样一来我们的出租车，选择的行驶路线与大巴车错开，避开拥挤的人流，悠闲自在，就像在自家的海边散步。

宫古岛的形状像一只章鱼，在宫古岛的北端和东南端，各有一处伸出的海岬，北端叫西平安



东平安名崎

名崎，东南端叫东平安名崎。这两处各有一座小山，都是观海的最佳地。山头上建有亭子，凭栏眺望，海天一色，让人心情舒畅。

宫古岛周边海域是自太平洋中生成的热带气旋活动最频繁的地带，也是台风最喜欢通过的路径。只要登上宫古岛，就可以看到岛上的树木，大多低矮偃伏，一副惊惶的模样。它们根本受不了每年一个接一个强台风粗野的爱抚。宫古岛的气候确实让人不敢恭维，冬季风寒彻骨，夏季炎热湿闷，一年中晴朗且凉爽的日子只有区区几十天。但宫古岛有洁净得近乎透明的海水，礁石、珊瑚、水草以及各种浮游生物，将它们的生命原色赋予了这片海域。

宫古岛上没有河流，缺少淡水，居民用水大多靠集雨的水库。水在这里，自是珍物贵品。但宫古岛四面都是浩瀚无垠的大海，目之所及就是海水。水色之绮丽，令人叹为观止。说实话，我从未见过这样美丽的海水，它有个显目的名字叫“宫古蓝”。不过，仅仅一个“蓝”字，难以涵盖它丰富的色彩。而且，随着阳光强弱变化，还会变幻出深蓝、浅蓝、深绿、淡绿、鹅黄……各种颜色。海水极清，几乎不含任何杂质。这或许是因为宫古岛上没有河流，不会带来泥沙，岛上也没有产生废料的工厂的缘故。

到宫古岛旅游，最养眼、最惬意的景致就是各种颜色的海水。



宫古岛海中公园

我们来到宫古岛的海中公园。这里其实就是岛屿伸入海中的一只巨足，以木栈道相连。栈道通往沙滩，通往礁石，通往密密的相思林。这里也是看水的最佳处，每一个拐弯，都会看到一幅海水的自画像。有的静影沉璧，黛绿色的水中，岩礁、海草、鱼虾历历可数，俨然天造地设的海底盆景；有的水波泛着网格状的光影，如同绿玻璃的丝丝裂纹；有的动感十足，吞蓝倒翠，像是海水里正煮着一锅玉石。在宫古岛海边行走，你甚至会怀疑，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在那儿尽情地泼洒丹青。哪里是普通的海水？简直就是一泓泓诱人的美酒。看一眼，让人醉到心头。

尽管在这天涯海角，宫古人依然有很强的环保意识，他们精心守护着家门口的这一片海，这一片他们引以为傲的宫古蓝，这是大海的原色，也是造物主对他们的淳朴、勤劳以及珍爱自然的回报。

南台往事

许超

2018年年底，“南台往事——近代福州历史记忆收藏展”在福州市博物馆开展。展览精选80后青年收藏家林凤麟先生私人珍藏的200多件近代福州涉外藏品，重现了烟台山昔日盛景。历史无言，藏品却有声。我有幸参观了展览，切身感受到藏品背后承载着的那段充满繁荣与沧桑的南台往事……

一、茶港觅踪

福建盛产茶叶，茶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说，茶叶贸易是福州成为通商口岸的重要原因之一。明万历年间，中国茶叶已经澳门转销欧洲各地。到清康熙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已将中国茶叶直接输入欧洲。17世纪开始，欧洲人喝午后茶被视为贵族的专属特权，当时在正山小种茶汤中放入白毫银针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最爱。清康熙年间，朝廷在中洲岛设立中国第一个海关——闽海关福州分关，也有力推动福州成为商业性的海关口岸城市。荷兰国特使范和伦（Pieter Van Hoorn）曾称：“福建素称为一个广大的产茶中心，

福州开辟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具有伟大的前途。”据《榕腔初学撮要》记载，当时在榕的外国人将“茶”念作“Ta”，我们熟知的英文单词“Tea”有可能就是由此衍变而来。然而，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因素，福州是五个通商口岸中最迟开埠的（1844年7月才正式开埠），通商的第一个十年间对外贸易额几乎可以用“惨淡”来形容。彼时的英国政府甚至“建议用福州和宁波来交换杭州、苏州、镇江三个‘内地’港口”。极富戏剧性的是，1853年掀起的太平天国起义和小刀会起义切断了闽茶运往广州和上海的通道，茶货壅滞使得茶商和茶农惶惶不安。时任福州巡抚王懿德为首的福建当局瞅准时机，上奏朝廷要求开放福州港茶叶贸易，并积极招揽外商来闽。“海禁既开，茶业日盛，洋商采买，聚集福州”，“各国船只驶闽运茶者呈争先恐后之状，福州由是遂成驰名世界之茶叶集中地也”。

出于洋人对“头春”的渴望以及新茶首市带来的高额利润，外商不断加快新茶投入伦敦市场的力度，这也带动了福州航海造船业的快速发展，由英国人设计的“海上茶叶信使”——飞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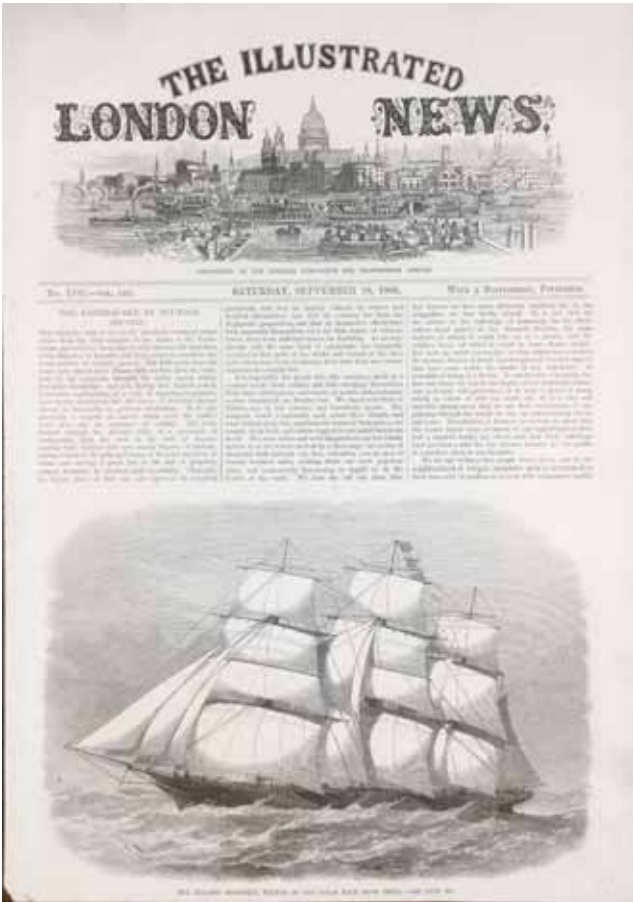
船应运而生。这种飞剪船船型瘦长，前端尖锐突出，航速快而吨位不大，它的出现使得从中国到英国的航行时间缩短了一半。每年武夷“头春”新茶上市之时，无数满挂白帆、满载新茶的飞剪船往返于福州与伦敦之间。当时欧洲各国经营茶叶的商店若不能在满载中国茶叶的飞剪船停靠码头次日即在橱窗上展示新茶，这家商店便将无人问津。第一批运抵的茶叶往往能够取得高额利润，因而当时福州港每年都要举行声势浩大的茶叶竞速赛。在本次展出的一份出版于1866年9月22日的《伦敦新闻画刊》中，就以《中国到伦敦的伟大茶叶竞速赛》为题报道了当年福州这场轰动中外的海上运茶赛。

1866年5月30日，共有9艘商船从福州港出发，满载着头批上市的茶叶，争先恐后地向着终点——伦敦航行而去。航行初始正值顺风，各商船互相攀望竞航。好景不长，随后遭遇的强风使得各商船偏离既定航线。“火之十



中国到伦敦的伟大茶叶竞速赛：“太平”号与“羚羊”号航行经过利泽德半岛（《伦敦新闻画刊》，1866年9月22日）

架”号（FIERYCROSS）最先经过好望角，“羚羊”号（ARIEL）和“塞里斯”号（SERICA）紧跟其后。然而，一直领先的“火之十架”号（FIERYCROSS）却因强风被迫暂时停航，其余商船也在风暴中苦寻方向。“羚羊”号和“太平”号（TAEPING）齐头并进，在破晓时分几乎同一时刻靠泊伦敦码头。最终，“太平”号凭借蒸汽机拖船优先完成了港口牵引作业，以30分钟的时间优势赢得先机，获得每吨茶叶10先令的额外奖金。据记载，当时船上装有767吨茶叶。



“茶船之旅”，来自中国的海洋竞赛冠军（《伦敦新闻画刊》，1868年9月19日）

运茶飞剪船的黄金时代，也是福州茶港誉满全球的鼎盛时期。一位参加过运茶赛的船长说：

“当时闽江上如此美丽壮观的船队集合，在全世界其他任何港口，实在不能看到。”福州民间亦有谚语云：“走马仓前观走马，泛船浦内看番船。”

据统计，19世纪70-90年代的福州口岸茶叶的出口量年年攀升，屡居全国茶叶出口首位。

二、领馆逸事

鸦片战争后，福州繁荣的茶叶贸易引起外国政府对福州口岸的高度重视。19世纪下半叶，包括英、美、法在内的17个国家在烟台山一带设立领事馆或代办处。当时的烟台山几乎成为福州最集中的外侨聚集区，形态万千、风格迥异的西式建筑星罗棋布、鳞次栉比。因此，烟台山也素有“万国建筑博物馆”之美称。至于清末仓山为什么成为外国人聚集的“宝地”，其背后的故事也很有意思。

“五口通商”后，根据协议，洋人只能在福州“城邑”即城区外围居住或经商。当时最先踏上这片土地的是英国首任领事李太郭（G. T. Lay）。由于不满领事馆被安排在远离城区的南台鸭姆洲，英方要求搬到市中心的于山白塔寺。福州当局考虑到当时民众普遍存在的排外心态，拒绝了这一要求。不料李太郭私下与乌石山积翠寺的僧人签下租约，悄悄搬入积翠寺。当局迫于无奈只能承认既成事实，但下令地方商贾不

得与洋人接洽贸易。经中英双方政府长达10年的博弈，清政府最终允许洋人落脚在烟台山，“此后续到夷商，如租房屋”，地方官员应“一律妥为经理”。随着外国领事馆设在仓山地区，大量外国商人和传教士涌入福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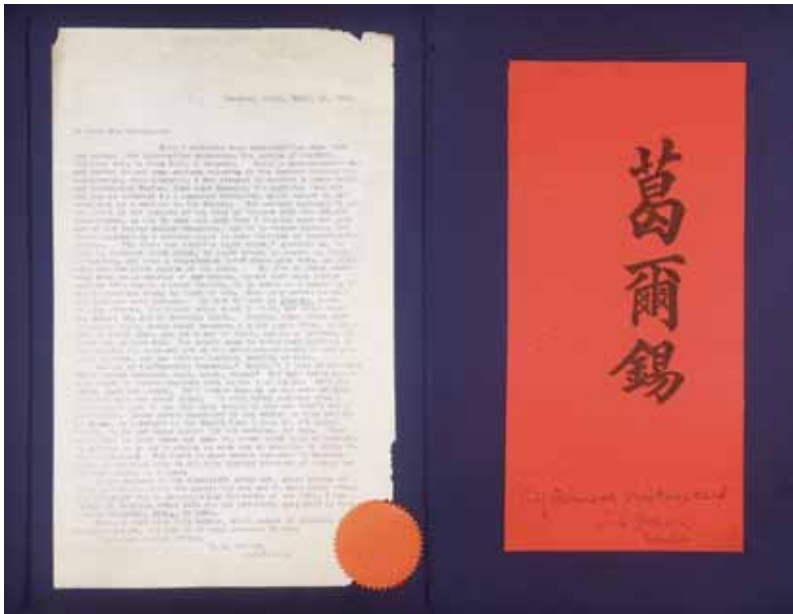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出国必须携带本人护照。那么，百年前的洋人来到中国，是否需要护照呢？一张1898年的护照藏品也许能给出肯定的答案。根据《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规定，外国人可以持护照到中国内地旅游通商，护照由外国驻华公使或驻地方领事馆签发，经总理衙门或地方官府审批并加盖官印方才生效，相当于今日的落地签证。这张颁发给汤姑娘（Miss. Thomas）的



英国驻福州领事馆颁发给汤姑娘的护照（1898年）

护照上透露出以下信息：汤姑娘作为英国传教士，向英国领事馆“秉称欲由福州前赴福建全省内地一带游历”，领事馆经查批准并请地方官员“验证放行”，“随时保卫、以礼相待”，限期一年，过期缴销。有关这位汤姑娘的其他信息无从查考，而从当时外国人在中国所持护照的政策条款中，不难看出这虽是清政府在外国列强枪炮逼迫下的无奈之举，但也是近代中外交流互通的见证。

在中英“十年领馆选址拉锯战”期间，美国政府也开始设立驻福州领事馆，此前美国侨务一直由英国领事馆代理。1855年，美国政府正式派出驻福州美国领事颀士格立(Galeb Jones)。在驻福州的历任美国领事中，不得不提及的便是1890年到任的领事葛尔锡(Samuel L. Gracey)。葛尔锡始终为缺少一套产权归属的领事馆办公地而发愁。他在任期间曾数次写信给美国助理国务卿，强烈建议买下怡和洋行作为办公地，信中提到：“这座房子是港口最好的，装饰华美，居住舒适……并坐落于洋人区中部，与各大领事馆往来便利……是彰显我美国国威的好代表。”但始终未获得美国政府同意，只得在此租住下去。葛尔锡还在一封1892年3月10日写给美国挚友达夫波特的信中，分享了自己在福州的所见所闻：“在这座拥有80万人口的福州



葛尔锡于1892年3月10日写给美国朋友达夫波特的信及葛尔锡名帖

城里，没有任何照明设备……走出领事馆，除了路人手里的纸灯笼之外，目之所及一片漆黑”，“这里没有街道，最宽的路只有15英尺（约4.5米）”，“这里的人们还在使用打火石和钢板生火，一瞬间我仿佛回到了1620年的普利茅斯城……”

有关葛尔锡的藏品还有他在福州任期内使用过的名帖，约1/2张A4纸大。清末中国人的名帖基本都是用五六寸的红纸书写姓名、职衔，如果是与外国人交涉往来的名片，纸张尺寸和字体则会更大一些，除了中文姓名还要加上英文翻译的官职和姓名。外国人的名片就如我们现在使用的名片一样大，葛尔锡这也算是入乡随俗。

若是翻看19世纪末拍摄的仓前山洋房老照片，便会发现有栋白色长条建筑格外吸引眼球，这座砖木结构方形两层洋楼便是日本驻福州领事



清国福州帝国领事馆的天长节（《日露战争写真画报》第11卷，1905年12月8日）

馆。在日本于1905年12月发行的《日露战争写真画报》第11卷中，有一张标题为《清国福州帝国领事馆的天长节》的照片。照片左侧还标注有：“大日本帝国威震天下，在东亚声名鹊起、日益稳固。图为今年天长节莅临驻福州日本国领事馆的来宾……”天长节是日本人为庆祝天皇生日而设，当时的日本领事馆居然邀请到了福州将军崇善、福建布政使周莲、内阁大学士陈宝琛等近20位地方官员，令人不由得咂舌。

在照片下方还标注有一行小字：“在福州帝国写真馆庐山轩寄赠。”庐山轩是日本人在福州开设的第一家使用西式设备的照相馆，主要服务对象为日本和其他外国侨民，是当时福州各军政衙门、文武高官的“唯一指定服务商”。这家照相馆将中国官员出席日本领事馆庆典的照片寄赠给

当时作为日俄战争纪实刊物的《日露战争写真画报》登载，其背后透露出的将照片作为政治宣传媒介和战略情报载体的动机不言而喻。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各国在华的经济日渐为日本所控制，驻榕领事馆纷纷撤离，南台岛也结束了华洋杂处的时代，留下了一座座交织着不同建筑风格的领事馆和一段段令人五味杂陈的往事。

三、火患背后

由于中外交通往来的日益密切，在当时的外国刊物上已经开始刊登有关福州的新闻报道。其中有一份1901年10月12日发行的英国《画报》周刊的单页，配图是一张黑白照片，文章标题为《福州大火后的欧洲区》，记录的是1901年7月26日发生的一场持续6个小时的大火对福州欧洲区的破坏。据报道，火灾是由于几名孩童在本地鞋铺的屋顶用火炉取暖引发的。火势迅速蔓延到外国公司的办公楼和停泊在码头的大船，有接近半数的洋商经营场所受损。这场火灾的破坏力之大在当时实属罕见，但在当时国内难以报道，时隔3个月之后则被外媒披露。通过翻查史料，将这次火灾与同年6月11日发生的另一场火灾对

比。这场火灾载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6月29日发行的《申报》，“一刹那间，义利、协和、义记、裕昌、永昌、天保各洋行，各渣打银行、日本邮便局、日东洋行，同付楚人一炬。”两场火灾时隔一个月，何以差别如此之大？这让人不由得质疑这场扑朔迷离的火灾背后或许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诚然，福州“环山派江”的盆地地形、高温干燥的气候环境、木质材料为主的城市建筑的确是导致本地火灾频发的诱因。然而，根据《清实录》《福州府志》《福州通志》等资料综合对比，开埠之前福州的火灾频次基本稳定在0.15次/年，光绪年间却骤然增加（34年间共发生108次），达到3.17次/年，远远超过前期。在这108起火灾中，发生在南台的就占了半数。或许，这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南台地区如火如荼的排外运动和贸

易活动带来的经济问题有关。

随着清末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在中国不断扩大，洋商和传教士的到来深深触动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舶来品的大量输入也造成福州本地物价飞涨。外来势力不断冲击下，近代福州人的国民意识也越趋强烈。

火灾地点主要集中在南台，也从侧面凸显了当时南台在福州重要的经济地位。当时的南台岛有外国商行30多家，它们在2000多米的江岸线上建有连片的货仓及10多个码头，几乎可以称作“晚清福州的华尔街”。实际上，火灾还会引发一个更加恶劣的社会问题——“火劫”。一旦发生火灾，就有很多地痞流氓赶来火场抢夺，受灾区几乎是“一条草都没有了”。惨痛的火灾损失在一定程度上浇灭了洋商的投资热情，也为后来福州港的贸易衰落埋下了伏笔……

百年时光如过眼云烟，南台岛上的旧洋房、老物件成为见证近代南台往事的“活化石”。这些藏品就像人的记忆一样，城市也不能失去这些物件。只有让更多的福州人了解这座城市曾经发生过什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经过着怎样的生活，珍藏所有的繁华与荣辱，才能更好地出发，去规划它未来的样子。



福州大火后的欧洲区（《画报》，1901年10月12日）

四角亭，勾动老街往事

文 净

—

在福州，喜欢赏荷的人无不知道茶亭公园。园内 20 多亩水域里，种植着 60 多个品种的名贵荷花。加上盆栽荷花，品种更是达到 200 多种。奔月、蓉娇、佛座莲、红舞妃、白千叶、红万万、白天鹅、单洒锦、广昌莲、大红袍……各种各样的荷花争奇斗艳。最早的 5 月就开放，最迟的 10 月还未凋。那时节，一拨又一拨游人来此赏荷，摄影爱好者的“长枪短炮”频频亮相，之后，一张又一张荷花的影像在博客、微信上纷纷晒出。即使是灯影朦胧的暗夜，从这里飘出的缕缕荷香，也给来此约会的情侣们营造出如诗如梦的幻境。

沉醉在荷香之中，或许有人会忘了这里还有一种香：茶香。

园里没有种茶，也不开茶馆，茶香何来？如果你留意那里的楹联，就会发现，茶香是从亭台楼阁的柱子里飘出来的。

古道记当年 匆匆歇脚茶迎客，
新荷开盛世 朵朵怡情景醉人。

亭翼然 碗茶待客谈七事，
荷莞尔 胜地留人捧一杯。



茶亭公园荷花池

这座公园的前后两个大门，都挂着关于茶的楹联。其他的亭台楼阁的对联，也频频见“茶”。就连“观荷游廊”、“渔舟晚唱”景点，也能遇上带“茶”的联句。这些茶香弥漫的楹联，也是对过往时光的一种追溯。原来，这里当年就是供路人喝茶的地方，也确实有一座茶亭。

“茶亭在南门外，昔有僧以暑月釀金煮茗饮行者，因名。”王应山的《闽都记》，只用寥寥十来字记之。

王应山是明代文人，说明早在明代或更早，这里就有茶亭了。那时候，这里还是一片野田水浦，一条田间小路把福州城与临江的台江码头连接起来。进城出城的人都得靠脚板走路，提行李挑货物的人更是步履艰辛，若是夏天，难免大汗淋漓，口干舌燥。附近寺庙的僧人悯路人之苦，用化缘来的银两建了座凉亭，整日烹茶施舍路人。因着这座茶亭，进城出城的人便喜欢在此停留片刻，田野上的凉风，池塘里的静水，还有绿树的浓荫，让这里成为歇脚消乏的好去处。

山好好，水好好，开口一笑无烦恼；

来匆匆，去匆匆，饮茶几杯各西东。

这就是茶亭最早的亭联。虽明白如话，却别有通透洒脱之意。那时候的茶亭，或许较为简陋，木柱陋瓦而已。路亭所供的茶水，大约也是大壶烹之粗碗盛之类，然而在劳苦大众的舌尖，它口齿生津，清凉五脏，它清气十足，香韵悠长。

时光逝矣，当年的那座茶亭，早已湮没无影。其形制如何，亦无画可寻。文人留下的笔墨也过于简略了，连建亭施茶的僧人是谁也未点出，更别说茶亭造型等细节了。如今的人们大多只是凭借公园里面的一对对关于茶的楹联，想象茶亭的往昔。

然而，这里毕竟不是一般的茶亭。当年，它地处福州市区南北走向主干道之侧，扼台江入城的田间要口，无数文人士子、贩夫走卒、村夫野老从这里经过。从福德桥到洋头口这一段，绿树成荫，清风习习，是乘凉、歇脚的好地方，沿途茶馆也随之越盖越多，“一团轩”“第一亭”“茗



茶亭公园内外随处可见关于茶的楹联

一春”，皆是当时有名的茶馆，其中“一团轩”建于河上，三面开窗，空气流通，茶座过百，盛极一时。

慢慢地，这里从一座茶亭变成一条街，一条连接福州市区两处最繁华地段的街道。

当年的茶亭已湮没无影，关于这片街区的记忆还承载些什么？

二

2007年，一条消息在福州人的心头激起波澜：茶亭街要拆迁了。

那时，茶亭街已是福州人人皆知的商业古街。福州人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只神奇的扁担，一头挑着省城的行政中心鼓楼，一头挑着繁华的商贸中心台江。茶亭街的两旁，集中了数百家各式作坊与店面。各种精巧的手工艺品，不仅是城区居民之所爱，还吸引着周边县区乃至其他地市城乡居民的青睐。

铲车与推土机轰隆隆而来，已经腾空的店铺与附近的民房应声倒地。然而，拆迁机械没有伸向那个古色古香的四角亭，那是始建于明代、重修于清代的一座木构建筑。

四角亭，茶亭庵的一个亭子。那时候，茶亭已不只是歇脚喝茶的地方，它已成为福州人熟知的一个地名。建在这里的茶亭庵，殿内供奉神祇，庵内设有戏坪、酒楼。楼上有公益社，是旧时乡绅聚会的场所。清嘉庆年间，茶亭各手工业



茶亭庵旧貌

会募捐重修茶亭庵，临街的那座四角亭，由剃刀行业捐资改建。在茶亭街众多手工行业中，仅一个剃刀行业就捐资建了一座亭，可以想见茶亭庵当时的规模。

四角亭四根石柱，斗拱屋顶。其中的两根石柱上刻有楹联：“养浩然之气配义与道，入圣者之域绝伦超群。”与茶亭最早的那副对联相比，显然透出几分商业街的气息。

福州评话《进京路引》中有句唱词“茶亭粉店多热闹”，指的是当时手工制作的胭脂、白粉、雪花膏等化妆品的店铺。其时，这条街上手工

制作的厨刀、剃刀、剪刀也颇有盛名，人称“茶亭街三把刀”。创建于清道光年间的增金利打铁店，专制“掌桃牌”厨刀，行销省内外及南洋各地。永字号剃刀铺所制剃刀以钢硬耐用、轻快锐利闻名，畅销本省各县。谢泰剪刀店选用精良工具钢为原料，所制剪刀缝紧而均匀，刀口锋利，耐用易磨，剪厚布不歪斜，为使用者所称道。永真、人乐园、真妙轩、真天然、雅成兴等5家雕塑店，在山水风景、人物画像、花鸟鱼虫等方面各擅其长，技艺精湛，造型生动。在这里制作的老“天华号”胡琴、祥泰“铁观音牌”镰刀、“李和记”理发剪、“利一”斩锯、“和兴”钢挫也行销各地，好评不绝。一条茶亭街，开设牙刷店的店号就有万春、王旗、六梯、丰记4家，开设弓带店的店号就有福泰成、义福祥、瑞兴、义福、永昌5家，开设皮店的店号就有恒元、雅记、德和、怡利、天顺、协会、恒昌、福康、胜康9家。

与脱胎漆器、雨伞并称为福州“三宝”的角梳，其发源地也在茶亭街。当时，这条街光角梳的店号就有百年老店李厚记、润光厚、许德康、元记发、福顺、瑞记德、华记、新元记、德记。茶亭街出产的福州角梳，美观耐用、不曲不折、绘像生动、工艺精巧，曾于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百年进步博览会上获金牌奖。

商贾聚集之地，往往伴随着民间娱乐的兴盛。那时候，茶亭庵设有戏台与戏坪，各路班社竞相打擂，参与人数达上千人。每逢乐社节目上演，台上，各路班社鼓乐齐鸣；台下，市井百姓

如痴如醉。“南北两途往来此解渴，古今一样善恶看收场。”“甲歌丁舞且下十石酒，南来北往亭中一杯茶。”从戏台上的楹联，可以想见当年人群熙攘之喧腾，楼台歌舞之欢悦。乐器的制作与出售，随之也成为茶亭街的特色行业。光锣鼓行业就有大罗天、许顺兴、老天华、天华斋4家百年名牌的店号，二胡、京胡、南胡、皮鼓等民族乐器的制作也驰誉榕城内外。“天华斋”是茶亭街从事乐器制作的商铺，店主王老板也是一位乐人，吸引音乐爱好者来此聚会，以乐会友，切磋技艺，福州“十番”音乐由此萌芽。此后，演奏“十番”音乐的“大罗天”乐社成立，之后分枝出“鹤鸣皋”乐社及“盛世元音”乐社两个流派。增金利锣鼓店成立“听月楼”十番班社，以笛、管、笙、椰胡、大小锣、大小钹、云锣、狼丈、木鱼、檀板、清鼓等13种乐器演奏乐谱，以浓郁的地方特色与轻快和谐的音韵迷醉无数听众。茶亭街“听月楼”珍藏的清咸丰七年（1857）十番乐谱，至今还不时在福州的街头巷尾、树下桥边演奏。

茶亭街的泥塑土人仔，在清末民初也十分风行，堪称福建的“泥人张”。街南端的洋头口河口嘴，正月里制售供孩童游春用的花花面壳、状元骑马，三四月份制售端午节佩挂的香袋，六七月推出中秋摆塔的八仙过海、福禄寿喜，十月销售冬至搓圆子用的回进宝。一年四季，都有适应时令与民俗节日的手工艺品，给一代代福州人留下美好的回忆。

按照拆迁重建的规划，原来14米宽的街道，要改成40米宽的大马路，当年的店铺格局显然无法保留。茶亭庵的大部分建筑，此前已随着岁月的流变逐步消失，只剩下这座四角亭，还作为茶亭小学的门楼被保留下来，那里的每一个木石构件，都是那个繁荣时代的历史见证。看着那高耸的屋脊、飞扬的翘角和藻井顶棚上镂刻的种种吉祥图案，对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信息的古亭，福州人的心头充满珍惜之情。

于是，四角亭的落架被小心翼翼地包装起来，存放在离此三四里的白马南路汀州会馆花圃内。

三

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博物馆，藏有一张300年前的手绘福州古地图。这张反映明末清初福州风貌的地图上，就有茶亭的图案。经福州文博专家研究推断，地图绘制的年代约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从地图上看，当时的茶亭虽已成街，但除了街道，两边大多仍是田园、水渠与池塘。乾隆年间，当时的福州郡守李拔登临乌山，俯瞰南郊，看到农民在田间辛勤劳作，心生悯农之情，题《望耕台》一诗。“平畴万亩青如许”，便是他笔下的南郊景象。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茶亭街经过多次拓道与修整。1990年，沿街の木头房全部改成骑楼，茶亭街成为福州的第一条骑楼式商业街。这

种一层内置、二三层如马首前探、门前为通道的建筑格局，利于遮阳挡雨，顾客不用戴笠撑伞，可以风雨无阻地逛街购物。那时的茶亭街，除了销售乐器、锡业、打铁、泥塑、毛笔、漆器、角梳、雨伞等传统手工业品，还有时髦新潮的服饰饰品店，时尚前卫的人体彩绘、文身店。小到螺丝，大到家具，这里几乎应有尽有。

2006年，茶亭街启动历时三年的旧街改造工程。重新与市民见面的茶亭街，由原来的双向两车道变成双向六车道。地铁1号线开通之后，茶亭街地下商贸空间与地铁茶亭站实现无缝接驳。原来的茶亭湖，扩建成具有江南园林风格的茶亭公园，四周建起了集商务、办公、酒店、大型商业等为一体的商贸中心。这里既有现代感十足的商贸大楼，也有洋溢着传统气息的仿古街区。但他们又隐隐觉得，可以寄寓老街区记忆的“原件”似乎少了点。

于是，他们想起存放在白马南路汀州会馆花圃内的茶亭庵四角亭落架。



曾经的茶亭街



修复后的茶亭庵四角亭

茶亭街经过大手笔改造之后，原有的建筑格局发生明显变化。茶亭庵的原址之上，已经不宜重新安放古色古香的四角亭。四角亭究竟该不该重回茶亭街，该放置在哪个位置，成了相关部门反复斟酌却迟迟难定的问题。

直到2018年，茶亭庵四角亭回迁的地址终于敲定。将原计划放置在茶亭河边的古亭，回迁到街对面的茶亭公园西大门入口处一侧。

在白马南路汀州会馆寄居12年的四角亭落架，由于木构件的自然腐朽、白蚁蛀蚀等原因，屋面残破严重，额枋亦遭虫蚁侵蚀，彩绘油漆大面积脱落。施工人员细心地把烂掉蛀掉的小构件拆下，并进行编号、登记，由古建专家鉴

定确认，对于能利用的石构件、彩绘木雕构件，都充分利用，尽可能保留历史信息。对缺失的石柱及其石柱础，按原来的形制、样貌复制。考虑到四角亭是建在广场上的露天建筑，修复回迁过程中，必须保证建筑的结构安全，对承重、受力部分的梁架，用坚固的木石材料重新制作，再进行做旧处理。屋脊、翘角或彩绘，或白描卷草、凤凰对牡丹图案；藻井内部顶棚刻有八卦图、暗八仙、蝙蝠、鸳鸯等吉祥图案，木构件雀替、垂花柱也饰以雕花图案。地面铺设红色斗底砖，凸现福州传统民居的特色。亭子外侧斜撑了4根上了仿古漆的木柱，使其更加稳固。

2019年8月中旬，经过修缮的茶亭庵四角亭终于揭开面纱。一些上了年纪的“老福州”，乍看也辨不出这是经过修缮的四角亭，还以为是原来的落架又原封不动地迁回。

这座古亭的落地之处，前有一片广场，广场中央有一棵老榕漫出的大片绿荫。背后是荷池毗连的茶亭公园，阵阵荷香在古亭的四周萦绕。不时有一些人在古亭下驻足徘徊，指点着那里的柱子、屋脊、翘角、藻井、雀替，说着老茶亭的往事。偶尔也有一两个面目沧桑的老人，静坐在亭子里，用昏花老眼缓缓扫视那些熟悉的木石构件，沉浸在美好童年的回忆之中。这座茶亭街的地标性建筑，将撩起无数福州人的缕缕乡愁。

寻忆南华剧场

林丽钦

“明中悬为幔，华灯绕作屏。闾阎有歌曲，醉里亦堪听。”自明末侯官曹学佺在福州西郊洪塘乡石仓园别墅中组建“儒林班”算起，以福州方言传唱的“福州戏”——闽剧，在榕城大地上已经传唱了400多年。《荔枝换绛桃》《贻顺哥烛蒂》《甘国宝》等传唱不息的经典闽剧早已不仅仅是戏台上的唱念做打，它已经和老百姓街头巷尾的闲谈品评融合成一体，内化成福州人的集体记忆和审美意趣。而位于黄巷中段南侧33号的南华剧场（即现在的中瑞南华影城），作为三坊七巷里唯一对大众开放营业的戏剧舞台，则是许多老福州娱乐消遣、欣赏戏剧的场所，至少存在过半个世纪的时间，留在福州人的观剧记忆中。

这座始建于民国五年（1916）的建筑原先是林顰卿所带的“南华”京班在福州的演出场所，随着民国十一年（1922）李厚基被逐出福建，盛极一时的京班在福州趋于没落。南华戏园便由刘贤枢等集资购置设备放映无声电影，民国二十四年（1935）又改为南华戏园，上演闽剧。

这座曾为木结构的戏园占地面积近1000平方米，分为两层，有楼下700个、楼上300个座

位。每当大戏开演，狭窄的黄巷总会吸引四方不同阶层的市民携家带口赶来。福州著名的闽剧戏班“新国风”“旧赛乐”“赛天然”“三赛乐”以及善传奇声色艺俱佳的名旦郑奕奏在这里演出时，戏园不时挂出“全园满座”的牌子。

不少声名显赫的达官贵人和名媛闺秀都曾是南华戏园的常客。买不起票的戏迷则早早在剧场周边占好位子，等着“看白戏”“看戏尾”。所谓“看白戏”就是挤在门边，通过门缝和门上



闽剧泰斗郑奕奏

装饰性的洞眼往场内偷看。演出结束前几分钟，剧场大门会提前打开，门外的许多观众会涌进戏场瞧上一眼，过下击掌叫好的戏瘾，这叫“看戏尾”。

1938年，日军占领厦门之后，矛头直指福州，福建省政府随即内迁永安。各闽剧戏班也随之纷纷向内地疏散。“善传奇”“赛天然”“新国风”等辗转闽北，“旧赛乐”“三赛乐”“四赛乐”浪迹福州十县及闽东五县流动演出，偶回城台各戏院排演。这时的南华剧场基本停业。倒是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组织的“战地妇女宣传队”曾在这里举办过数场义演，为在洪水中受灾的福州市民赈灾筹款。

1945年抗战胜利后，省政府迁回福州，疏散各地的闽班陆续回来，满目苍凉的城台各戏园才又重新开张。但是，包括南华在内的众多戏园迎

来的却是另一波艰难。

当时福州的国民党驻军多不是本地人，跋扈自恣的军人既要看霸王戏，又无理要求各戏园改演京剧。为维持生计，能忍则安的剧场老板在剧商公会的周旋协调下，定于每星期日上午特别配演京剧，只求军人不要在其他时间随意出入戏园。然而他们照旧纷至沓来，各戏园刚安抚好国民党驻军，又迎来白吃白喝白看戏的省防司令部、保安处和警察局侦探员以及他们的亲眷好友。几乎每场演出，都有两三百携亲带友的警民有恃无恐无票进场。“三赛乐”在南华剧场演出《吕四娘》的时候，在戏场内看霸王戏的有200多人。焦头烂额的剧商和老板无奈请省会特务机关以戏剧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出面摆平。特务机关查处了10多次之后，各戏院白看戏的人依然比比皆是，查票特务的亲朋好友从容淡定地赢得了看



如今的南华剧场

霸王戏的福利。剧商和老板们真是欲说还休。

政府腐败不堪，市面物价飞涨，人心惶惶。这时候各戏园都门庭冷落，许多剧社纷纷倒闭。在纷飞的战火和扰攘的时局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南华戏园举步维艰，濒于停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福建省立福州中学地下党支部成立的民舞社和民歌社，于1949年8月13日在南华剧场、8月16日在大罗天剧场举行两场“为留校同学活命义卖”的民歌民舞演出。第二场演出一直持续到17日凌晨，民歌民舞社用欢腾的秧歌、热闹的腰鼓欢迎人民解放军，表达对福州解放的欢欣雀跃。也就在这一天，福州宣布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华剧场和复苏的闽剧一起迎来了新生。20世纪50年代南华剧场又响起闽剧的锣鼓声，剧场职工扛起着红漆的“迎戏牌”，用白粉书写上戏名和主演，在八一七北路的各店铺前来回走动招徕观众。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在改制中，许多剧团提出了今后演员的戏路应朝男扮男、女扮女的方向发展。不少著名的老艺人一边演戏一边带起了女学生。1952年，“三赛乐”闽剧班在南华剧场招收学员，并举办了新学员拜师仪式。一批优秀的女演员从此走上闽剧表演之路。

1953年，市区的南华、天华、光荣、文艺（旧文艺）4家私营影院（场）归属福州市文化处管理。1956年，南华剧场改为地方国营，由

市文化处投资重修，整体为砖木结构，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观众座位1100多个。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闽剧艺术工作者创作了许多叫好又卖座的现代戏，与重放异彩的优秀传统戏一起在剧场里争妍斗丽。

“文革”期间，南华剧场停业。幸运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和福州市电影公司在整理南华剧场的仓库时，惊喜地找到了原先福州闽剧院资料室的残存资料，以往收集的闽剧传统本大部分得以幸存。

1977年南华剧场恢复营业之后，戏剧和电影交替上演，现代戏和传统戏交相辉映。当时定点演出闽剧的剧场除了三坊七巷的南华剧场，还有东街口的光荣剧场和台江的天华剧场等。福州拥有很多戏迷，不少剧目连演一个月也场场爆满。闽剧现代戏《江姐》风靡一时，林芬菁、胡奇明、王梅芬、林瑛4位江姐轮番在南华剧场为戏迷连演了几个月。话剧《泪血樱花》在南华剧场连续上演54场。20世纪80年代的《曲判记》在南华剧场、光荣剧场、天华剧场等6家影剧院连演上百场，满座皆倾。许多名噪一时的闽剧演员都曾在南华剧院的戏台上演绎过荡气回肠的故事。

1982年，南华剧场归属福州市演出公司管辖。1984年，南华剧场撤销，改作福州市文工团团部。1986年，南华剧场改建为砖混框架结构，辟为福州市歌舞团团部和福州市演出公司办公楼。从此，作为闽剧固定演出场所的南华剧场，波澜不惊地退出了福州人的视野。

时 光 里

王春燕

1

三坊七巷安民巷60号是座名为“极岩茶苑”的茶室。木门推进去，里面豁然开朗，整洁的庭院，摆放着白色简画屏风的大厅，两旁几个四四方方的小茶室，以及空气中弥漫着的茶香，无不透露出淡雅和禅意。

这一派幽静之地，谁会想到多年前竟是嘈杂、群居的“四合院”？四进格局，上千平方米面积，群聚着几个家族。我的同事小林，1995年出生的女孩，便出生于此。那时这里门牌编号还是安民巷61号，林家几代人居住在最里面的第四进。

据小林的父亲林国忠回忆，这四进的宽广宅第，原先是国民党政府省参议员田稔之及弟弟国民党省政府秘书田贞彬的私产，其中第一、二、三进属于田稔之，第四进属于田贞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田稔之乘班机逃到台湾，他的私产直接被充公。田贞彬在“文革”期间，被押送至顺昌劳改，积劳成疾得了肺癌。他的私产此

前已被政府收走，出于人道主义，政府出了一笔房款供他看病。

林家为何会搬到此宅居住？这还要从林国忠的外公外婆说起。

他的外公林春霖和外婆桂淑华是新加坡归国



极岩茶苑

华侨，祖籍为闽侯上街，生意做得很大，金铺、中药店、粮铺均有涉猎。当时，他们重金购置了福州道山路隆普巷 175 号宅院。除了房产，还置办了土地，把闽侯那边的亲戚拢到身边，耕种养家。“土地改革”时期，外公外婆被定性为地主阶级，房产、财产和土地被收走，一家人被政府安置在了安民巷 61 号第四进院落，从此便在三坊七巷扎了根。

说是安置，也有公房和私产的区别。他的外公外婆、舅舅等住的是公房，需每月交几块钱房租。而他的父母则分到 47 平方米的私产。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别呢？他的父亲原属第十兵团，参加过解放战争等战役，在枪林弹雨中一路拼杀、立功，分给他们私产是政府的奖励和关照。

父亲后来被安排在食品公司上班，每月工资 60 多块。母亲在环卫所工作，月工资 30 多块。政府还会定量发放煤票、粮票、油票、布票。煤票用完了，闽侯那边的亲戚还会挑一些木柴过来救急。林国忠有 4 个姐姐，一家几口虽算不上特别富裕，但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母亲闲暇时，很爱搓麻将。赢了钱或林国忠考了好成绩时，会高兴地问他：“想吃什么？”他说想吃火腿，母亲立刻沮丧起来，当时一大根火腿要上百元，怎么消

费得起？只能牵着他的手去光禄坊附近老卤酱鸭的摊位，扯个小翅膀、小爪子给他解解馋。老卤酱鸭老店店面只有几平方米，却是孩童们最魂牵梦萦的地方。一整个酱鸭要十来块，吃得起的没几个，所以店家经常把脖子、头、爪子等切开来卖。白花花的嫩肉，焦黄带黝黑的外皮，看一看，闻一闻，口水便要流下来。舔个鸭爪子，配碗白米饭，酱浓骨酥，滑到喉咙，暖到胃里，满是老福州的香甜。

除了美食的香，坊巷间还有一股中药的微弱味会不时飘荡。三坊七巷的回春药店，店面宽敞，包括员工宿舍有四五百平方米，从主干道延伸到安民巷、黄巷。店里有个坐堂老中医，慈眉善目，开完方子便亲自抓药。一抓一个准，从不过秤，分量精准得让人咂舌。药店还设计过自动配药的装置，简单易操作。患者来到药店，总被这些新奇事物吸引，忘记了药包里的苦涩。





年逾50的林国忠，在三坊七巷度过了大半生，褪去稚嫩长大成人，红红火火迎娶新娘，推杯换盏喝女儿的满月酒，饭后搬个板凳坐在葡萄藤下与邻里聊天，这些记忆片段仿如隔世，久远、平凡、琐碎又温暖。

三坊七巷拆迁是一项浩大工程，拆迁告示贴满大街小巷，拆迁办、拆迁组成了这里的常客，一家一家讲解政策、安抚情绪。拆迁有货币补偿和以房换房两种形式。除了房产较多的选择现金补偿，大多数都选以房换房。田家后代闻讯也从美国和加拿大等地赶来，他们手里还有民国时期的产权凭证，希望政府能合理补偿。等政府安顿好他们后，林国忠家才接了上去，分到丞相坊小区一套6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

建造安置房需要时间，他们就在附近租了一

年的房过渡。正式搬进新居的那天，一家人忙忙碌碌地打扫卫生，布置床铺，买菜开火。几碟家常菜摆上桌，喝几口小酒，辣辣的。新生活从饭菜香、觥筹交错间蔓延、展开。

现在，三坊七巷已是福州的地标式地段。古色古香的建筑，沿街的商铺，川流不息的人群，已与以往大不相同。林国忠时常来这里逛逛，看看曾经生活过的街巷。“很多地方都变了……”怀念如鲠在喉，念念不忘。

2

清晨，雾气未散，两三个壮汉把一块大砧板搬到店铺外，拿起木槌捶打砧板上的肉泥。“嗒、嗒、嗒……”有节奏的打肉燕声，回荡在三坊七

巷，叫醒了晨曦，也唤醒了睡眠惺忪的人们。买菜的买菜，上学的上学，开店的开店，街头巷尾顿时热闹起来。这是停留在三坊七巷原住民记忆里的画面和声音。

同利肉燕第四代传承人陈君凡，端起茶杯，忆起往事，面带笑容地说道：“说起我家祖传的那块荔枝木大砧板，还挺有故事，它曾经逃过了两次劫难……”

同利肉燕老店原址在光禄坊口，两层楼的木板房，楼上是卧房，楼下是店面。店面只有二三十平方米，后面的作坊却有大几十平方米，作坊后面是厨房，旁边还有一大片空地。空地上，一口大缸埋在地下，上面架个木条，便是简易厕所。

门店大门是用一片片活动木板拼接的，每块木板上标着数字，以免错乱。早晨把木板卸下来，开门营业，夜晚把木板拼上，闭门休息。兵荒马乱年代，陈君凡的祖父和父亲怕门板不牢

固，便把大砧板顶在门后，上楼歇息。某天夜晚，光禄坊及澳门路突然失火，火势凶猛，越演越烈，居民们乱作一团，纷纷逃命。祖父和父亲半夜惊醒，把店门卸开后，几脚把大砧板踢到街上，来不及收拾任何细软，带着家眷逃离火海。大火扑灭后，店里所有的工具、家当都毁之一炬，唯有这块木砧板保留下来。

灾后，同利肉燕搬迁到澳门路重建开业，格局跟原先大致无二。

祖父离世早，父亲二三十岁便接手家业。陈君凡兄妹五个，他排行老二，却是最调皮捣蛋的。父亲怕他惹是生非，就让12岁的他跟在身边学打燕皮。木砧板较高，他站在地上手握木槌，一打下去整个虎口都痛。父亲见状，做了个木箱让他踩在脚下，才没那般费力。打肉燕不能停歇，要连续捶打40多分钟，在肉最新鲜的状态下打成肉泥才有劲道。每次打完，他都两臂发麻，手掌起泡，吃饭时筷子都握不住。“打完燕皮，一只手手指不能伸直，我就让这只手休息，换另一只手拿东西、做事情。我现在60多岁了，写字、打球、吃饭左右手可以互换着来，锻炼出来了！”

当时，他们只卖燕皮，量不多，一天就做个十来斤，主要供货给官厨和私厨。官厨，比如聚春园等，用作官场上的迎来送往。私厨，比如有钱人家办寿宴、喜宴，讨个彩头。同利肉燕选用的都是猪后腿的精肉，纯手工打制，价位自然不低，鲜燕皮大概一斤一元一角六，干燕皮是一元五角八，普通百姓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尝个鲜。



陈君凡（右）穿着当时很时髦的喇叭裤，和他的父亲陈存谈（左）一起打肉燕



20 世纪 80 年代的同利肉燕老铺

“同利肉燕”四个字亮出来便是口碑，老招牌是萨镇冰题写的，贴在店门口的柱子上，被视为传家宝。萨镇冰被称为“布衣省长”，很亲民，穿着长大褂，摇着扇子，经常与陈君凡的祖父等一群人在省府路喝茶聊天，了解民情。祖父请萨镇冰为店铺题字，萨老很痛快就答应了，挥毫写下“同利肉燕”。

“文革”期间，陈君凡的父亲被关在北峰林阳寺学习班学习，母亲来自农村，没有主心骨，慌慌张张地把招牌取下来，拿到街上劈掉了。那块木砧板被红卫兵推出来，一两百斤的实木，异常结实，怎么劈都劈不动，这才又逃过一劫。

行业凋敝时期，为了生活，他们还是会私下偷偷打肉燕、卖燕皮，贴补家用。街坊邻里私下统计一下需要多少量，他和父亲就把木砧板搬到家门前的防空壕里，外面架上木板，盖上棉被隔音，在里面偷偷做“老鼠工”。手艺在这种高压、紧张环境下，熬过凛冬，传承下来，终是迎



如今红火的同利肉燕老铺

来了春暖花开。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鼓励复兴小作坊、手工业，同利肉燕才重新回到大众视野。

三坊七巷拆迁、修复，政府鼓励百年老店重回三坊七巷。陈君凡作为同利肉燕的传承人和三坊七巷的住户，参加了多次筹备大会。他在会上动情地说：“我从小是光着脚，踩着三坊七巷的青石板跑大的，我目睹了它的兴盛衰落……”

同利肉燕澳门路老店依然生意红火，三坊七巷主干道上的新店及其他分店也应势开张，如火如荼。时代变迁，厂房环境、肉质选择、产品开拓、平台销售等方面都有了新突破、新面貌，但百年的味道没变。

陈君凡作为闽菜演示团成员去过菲律宾、马来西亚、美国等很多国家。年近古稀的海外游子团团围住他，看他打燕皮、包肉燕、煮肉燕。热气腾腾、晶莹剔透的肉燕滑进白瓷碗里，汤匙兜住咬上一口，很多老人不禁流下热泪：“就是这个

味道，故乡的味道，母亲的味道……”

3

三坊七巷被誉为“明清建筑博物馆”，深宅大院、官府贵地不乏其中，宅第的用材、布局、规格都是极讲究的。柱梁、木地板用的是闽江“流溪”过的、不上油漆的杉原木，台阶台基、廊沿石等多为长乐、马尾亭江的青石板。青石板和木料大块铺陈，给人以高敞、秀丽、大气之感。墙体以夯土墙为主，也有空斗砖墙，屋面多为小青瓦屋面，天井地面一般是可渗水的三合土地面。门窗、隔断等用金丝楠木、黄杨木、檀香等珍贵木材雕饰点缀，提升品位和贵气。

遗憾的是，这些古建筑在杂居状态下没得到

很好的保护。大宅院实际变为群居“小区”，私搭乱建、杂物堆堵，房屋破损严重。旧房失修，外下大雨，内滴小雨，锅碗瓢盆接水的声音不绝于耳。基础设施也不健全，除了自来水、电线接通外，居民上厕所主要靠马桶和公厕。

三坊七巷搬迁、改造是项浩大的工程。2006年7月起，3000多户居民开始陆续搬离三坊七巷。搬迁中，他们带走了对家园的美好记忆和深深眷恋，却没有带走一砖一瓦。精美雕刻的门窗、灯杠等，甚至留有古人书法的楠木格栅都完好保留下来，为三坊七巷的保护修复奠定了良好基础。

壁画是三坊七巷建筑装饰的点睛之笔，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修复的难点和重点。据不完全统计，刘家大院、王麒故居、刘冠雄故居、林聪彝故居、水榭戏台、二梅书屋、小黄楼等建



筑的壁画面积就近 1000 平方米。

刘家大院有一幅壁画，位于二进过厅门楣和左右隔墙的墙檐位置，残损严重，几乎辨别不出图案。修复团队通过清除、灌浆、揭取、回帖、清洗，发现壁画上有许多裸露的铁钉、铁钉脱落留下的孔以及凹凸不平的残留图案。由此推测，该壁画可能是采用塑、画结合绘制的半浮雕样式。团队又对残留图案显微观察，辨别出牡丹花叶、梧桐树、荷叶、山石以及鸟禽的形状。对鸟禽进行处理和比对，又确定左上角是一对黑色鸟，右上角是一对黄色鸟，左下角是一对戏水鸳鸯，右下角是一对白仙鹤，而画的中心则是一只凤凰。

对照古代文献，这幅壁画与“五伦图”非常相似。“五伦图”又名伦叙图，整体画面布局为五种鸟，其中凤凰在中间、左上鹞鸽、右上黄莺、左下鸳鸯、右下仙鹤。凤凰表示君臣之道，仙鹤表示父子之道，鸳鸯表示夫妇之道，鹞鸽表示兄弟之道，黄莺表示朋友之道。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关系。

刘家大院的“五伦图”从濒临消失到再现、复原，意义重大。古建筑被一只只“画笔”重新描摹、上色，褪去灰暗，焕发出新的生命。还原文化本真意义深远，但在整个浩大的修复项目中，缺憾还是在所难免的。



修复后的刘家大院门楣壁画“五伦图”

三坊七巷建筑实际上是“乌墙黛瓦”，外墙、风火墙头、屋脊都是黑灰色的。福州多雨，外墙防水一般是加长出檐、墙基用石料、外墙用乌烟灰抹灰等方式解决。乌烟灰就是柴火燃烧后附在锅底的锅底灰。它与米醋发酵两三天后掺入麻刀灰抹在墙上，有防水防潮效果。这次修复本来也想使用乌烟灰，但是福州的柴火灶基本已经消失，就地取材困难，便没能坚持下来。在三坊七巷穿梭，迎面看到的墙不是白就是黑，白墙提亮扎眼，但不如保留下来的乌墙与黛瓦色调相近、相合。

百分之百的完全复原不太可能，但力争接近原貌，是修复团队的行动信念。工人们光着膀子，搭着汗巾，站在高低架上热火朝天地雕刻，让身心融入古巷的血脉和记忆。焕发一新的三坊七巷，阳光在屋檐与枝叶间流动，三角梅、蔷薇爬在墙头、扎根墙间，与高宅宽院、幽幽小巷相映成趣、自成韵味。

掌上乾坤，钹底风云

——福州评话和评话先生

江宝章

一张桌子，一只铜钹（福州话写作“𦍋”，读 qiā），一块醒木，一支竹箸。这便是福州评话的全部道具。

一把纸扇，一袭长衫素服。这便是福州评话先生的形象。

可以登高门，进大户，为文人士大夫所欣赏；也可出入街头巷尾，让贩夫走卒痴狂。这就是福州评话的魅力。

福州评话曾经就像是福州人生活中常见的一位朋友。那时，每逢民间节日，或红白之事，事主往往出资请戏班唱一出戏或请评话先生说一段话本，以答谢神祇和街坊乡亲。那是属于民间的

欢乐。

“文革”时期，福州传统评话如同其他许多艺术形式，一度从社会上销声匿迹了。但这位“老朋友”顽强地寻找生存空间。大城市管得严，说书艺人便转到福州郊县如长乐、连江、福清等地；公开场合无法登台，民间一些对评话极其痴迷的说书人和市民，便私下里偷偷组织小规模的表演。

老家的旧街坊，是一片毗连的木构屋。白天只要家里有人，就大门敞开，小孩子经常从东家进，西家出，邻里关系非常密切。大约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我才上初中，发现邻居家有几个晚上神秘秘。开始还以为是赌博，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在请评话先生说评话呢。带着些许好奇和冒险的心理我也挤了进去，邻居也不阻拦。屋里人不多，一般也就六七八人最多八九人，都是平日里知根知底的。

这是我第一次与评话先生近距离地亲密接触。因为公开演出被禁止，评话先生着装打扮不敢与众不同，就是一身普通的中山装，年纪以 40



多岁者居多。主人通常在桌上为评话先生放一包烟和一茶缸的茶水。

关好门，确保无虞之后，评话先生喝一口水，清清嗓子，整肃面容，只见他左手拿铜镲，右手执竹箸，猛然间，那根竹箸在铜镲的边沿或击或抹或按或划，顿时，铜镲发出连绵不断或急促或和缓、或遥远或切近、或激越或低昂的声音，如风入峡谷，疾雨满川。突然，评话先生将铜镲往桌上一拍，一声霹雳，云散天青。

一首古诗词在评话先生抑扬顿挫、似唱似吟的音调中缓缓流淌而出。后来我知道这叫作“序头”，大致与宋元以后话本说唱或话本小说相同，都是在卷首以一首诗或词开宗明义。听完这首诗词，你就大致了解话本的内容和所要表达的观点。著名的如《三国演义》开头那一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唱完“序头”便进入正文。

“话说明正德年间，江南苏州府……”

“话说北宋靖康年间，金兵南下……”

那几年，我听过的评话不下十几场。时间久了，话本的名称已完全不记得，内容多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者行侠仗义的武士剑客一类。文字有的明快，有的典雅，有的精巧，有的直白，但都极富感染力，应该都是经过时间磨洗的经典本子。说书人年龄不同，风格各异，但名字无一记得。你看他们，每当说到神州陆沉，国难当头，则悲愤难抑，满脸忠义之气；及至王师北定，失地重光，又神情激昂，满目生辉；说到公

子落难，佳人情伤，则愁容惨淡，一唱三叹；至如劫后重生，否极泰来，那就真的是白日放歌，青春还乡了。而那一片铜镲，配合着说唱，或如金戈铁马，阵气横空，或如鼓瑟吹笙，峨峨洋洋，如怨如慕……听众的情绪像波涛中的小舟，随着故事情节和评话先生说唱的腔调跌宕起伏。

福州评话究竟形成于何时，没有太清晰的历史线索。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记载，宋末元初临安（杭州）说书艺人丘机山曾到福州说书，以吟诵“诗赞”开篇，然后转入夹说夹吟的“正话”，最后再以“诗赞”作“结台吟”，并以“扇响钹”作间奏，这种表演形式倒是与今日福州评话表演形式颇为相近，也显示出福州评话与宋元以来的说唱话本之间鲜明的传承关系。当然，苏州评弹界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福州评话是大名鼎鼎的说书艺人柳敬亭的晚年大弟子居辅臣在明末清初时传入福州的。

时间过去了40多年。自从1975年去插队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过福州评话了。虽然福州评话现在可以光明正大地演出了，但我却不愿冒昧地去听。时过境迁，说者与听者的心境都有了很大变化，感受也就不同。内心深处我其实更担心，如果没有发自心底的那一份痴情，福州评话还会有那么大的感人力量吗？其实任何艺术都一样，无论有多美丽的躯壳，如果没有灵魂，都没有生命。我当然是胡思乱想了。今天的福州评话正是大放异彩之时，题材丰富，人才辈出，但我仍愿浅陋地固守着几十年前那个美好记忆。

一片铙钹话古今

徐鹤苹

福州评话界奉柳敬亭为祖师

历代福州评话艺人虔诚膜拜柳敬亭，敬奉其为祖师。老一辈福州评话艺人传说，柳敬亭来过福州传艺，福州评话是在师承柳敬亭的话艺后发挥创造而形成的一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表演风格的说书艺术品种。直至民国年间，管理福州评话艺人的“福州评话公会”（艺人俗称其为“评话行”）都挂着柳敬亭的画像。有些艺人也私奉柳敬亭画像或设置敬奉柳敬亭的香火，每逢朔望日或其他特殊日子，总要焚香点烛以敬祖师。艺人们还把柳敬亭到福州传艺的故事代代传颂，每当拜师之时，都要先拜祖师柳敬亭，师父总要叮嘱徒弟不要数典忘祖。柳敬亭先后在苏州、扬州、杭州、南京、泰州等地说书。清康熙元年（1662）曾随漕运总督蔡士英北上至北京，演出于各王府之间。康熙四年（1665）离开北京南返，经扬州至泰州，次年又到安徽庐江。康熙九年（1670），顾景星《阅梅村王郎曲杂书十六绝句志感》之六的诗中述道：“柳生冻饿王郎死，话到勾栏已藏情。”柳生指柳敬亭，时年84岁，王



柳敬亭

郎指与柳敬亭同时唱清曲的王紫稼。从此诗句可知，那时柳敬亭尚在世，然而“冻饿”即生活穷困潦倒。此后便再也没有关于他的记载。柳敬亭到过绍兴亦是有据可稽的，但是到福州查不到实据。即使他未到福州传艺，仅从历代福州评话艺人对他的崇仰，也能感受到他对福州评话艺术的深远影响。

赖德森精心锤炼书艺

赖德森初学刺绣，乳名和尚，又是光头大脑袋，因而以“绣和尚”为艺名，是清末民初福

州评话“三总管”之一。他勤学好问，虚心向同行请教，努力学文化，留心揣摩社会生活、人情世态。福州有了电影后，又通过看电影学新的生活知识、新的艺术技巧、模拟新的人物，广搜博采。他富有创新精神，在娴熟掌握评话艺术后，一贯自编自演。创作态度严谨，既演活了传统书目，还根据小说、电影编演了一批时装评话。编演节目都是反复推敲，精心锤炼书艺。有一次，他设计一句衬托人物苦闷心情的唱词：“月光从瓦缝 X 落来”，第六字的动词，先后拟了“映”“射”“照”，都觉得不贴切，最后选定了“月光从瓦缝钻落来”。他家备有全身镜，每排练一个节目，总要在镜子前设计表情动作，直到满意为止。对于好书目，也从不照本宣科，而是按照自己的书风进行整理改编，进行再加工。多方位的探索，使他书路宽广。讲《水浒传》被称为活的神行太保；讲武侠，《杨香武三盗九龙杯》累代流传；讲家庭书，擅长《天雨花》《二度梅》；《红楼梦》在福州评话界无人问津，畏其文静，而他讲活了《黛玉葬花》；讲长解书，他的《大明英烈传》，尤其其中《常遇春夺状元印》，脍炙人口；根据电影、小说编演的时装书《红玫瑰》《陆格兰》《啼笑因缘》《黑猿党》《卖肉三做司令》《月月渡》等照样很流行。

福州评话的盲艺人

据黄天天说：传说太平天国时，有 7 位福州

评话艺人因暗中宣扬太平军，犯了“长毛案”，被朝廷惨无人道地剜掉双眼，但他们仍坚持讲评话，并把讲评话的技艺传授给盲人艺徒，形成重说唱的福州评话盲艺人流派，其代表性人物有艺名“细作九”的郑为豪，曾被誉为清末民初福州评话“八部堂”之一。郑为豪声腔柔润，会的书也多，有短解的《七侠五义》、长解的《大红袍》，还有拿手的很有特色的单本书《笔筒猴》等，师德也好，对艺徒悉心相授。

陈长枝 14 岁时拜郑为豪为师。师父肯教，徒弟勤学，头一年就学得了从《七侠五义》里摘取出来的两本单本书《紫金鱼》和《神鬼大闹太岁坊》。会了两本书，加上有人撺掇，陈长枝便背着师父到城隍庙尚方顶书场偷讲《神鬼大闹太岁坊》练台。郑为豪闻讯，就叫儿子搀扶到台下，躲在角落里听。陈长枝在台上说着说着，忽然发现师父来了，吓得一下子忘了词，愣在台上，惹得听众大笑。陈长枝赶忙跳下台，挨到师父身边准备挨训。可是郑为豪不但不怪罪，反而鼓励道：“你讲得很不错，可就是不该看见我就惊到忘词了。以后你还得上高台，我还会来听，你尽管大胆讲，讲完了，我好指点你。”由此，陈长枝学艺的第二年，便登台卖艺了。

清末民初，福州评话夜间高台上，就点一盏“三把莲”油灯，半明不灭，台下人看不清楚演员的表演，有的听众干脆闭目静听。这也是福州评话盲艺人一展才华的时期。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电灯在福州城区已较为普及，夜间高台多



改用电灯照明，农村高台夜间一般也用汽灯照得透亮，台下能看清演员的表情，也就不满足盲艺人缺乏眼神、表情受到局限的讲书，讲福州评话的盲艺人逐渐销声匿迹。陈长枝想向其他艺人学表演，但又怕师父不高兴。郑为豪知道后，主动给他推荐了赖德森、徐天定、下渡潮三位师父。在郑为豪师父的鼓励下，陈长枝常去观摩这三位师父讲书，不但全神贯注地听，还目不转睛地观察他们的表演，从三位师父的绝活里悟出了道理，艺术大有长进。

叶三嫂以貌取人悔失高徒

叶三嫂是福州评话艺人中，现知最早出现的女艺人。她的成功演出，吸引了一批女子学讲评话。也有人慕名向她学艺。20世纪30年代驰名

福州评话书坛的“女三杰”中的周云卿，就出自她的门下。而叶三嫂也曾因以貌取人悔失高徒。

“女三杰”中的陈艳玉，起先是找叶三嫂请求拜师。叶三嫂见她相貌不佳，哈哈大笑回绝道：“劝我妹快去学别的工艺，万不可学评话。你这扮相，不适宜做文艺，吃力不讨好。菜油姜母面，何苦抹个名？对不住，我不收。”一再推辞。陈艳玉碰了个硬钉子，却不死心。她获得在杂货店当伙计的丈夫林依木的支持，另求名师。一夜，“西门清”林清在津门楼粮店后书场讲书，离她在大墙根的家很近。林清讲完书后，夫妻两人诚邀林清到家中吃夜宵。攀谈中，林依木与林清认作本家，请求林清收陈艳玉为徒。林清盛情难却应允后，当即行拜师礼。林清悉心传授陈艳玉《杨国显失金印》《沉香秘书楼》后，又亲自带着她到水流湾酒库同，拜他的好友徐炳铨为师，徐炳铨口述，林清笔录，学了《丹桂图》。以后，还向师弟郑小秋学了《陆格兰》《孟姜女》，向黄天天学了《扇坠玉莺哥》，向仓前坤学了《施剑翘三刺孙传芳》《梅英恨史》等。她求教心切，既勤学又苦练，拜师学书诚心诚意，对师长优礼相待，让人愿倾心相授。在编演《施三翘三刺孙传芳》时，她特地另聘了文才渊博的曹先生，配合仓前坤，根据她的讲书风格，边编、边整、边改。每日见面，先由她讲一段，发现句、白或表演有不顺之处，立即商讨，加以修改，直到全书满意、熟练后，方才开台对外讲书。所以她的《施剑翘三刺孙传芳》特别受欢迎。当时，城台

32家书场，只要是挂陈艳玉讲《施剑翘三刺孙传芳》的牌，听众都争先恐后地入场，场场满座。还经常有人聘请她高台讲书《三刺孙传芳》。那时，城台律师帮、绸缎帮、金店帮、珠宝帮、医药帮等帮会，夏令夜晚常轮流设宴，名曰凉风会，酒后，或听闽剧或听评话。要听评话，往往定陈艳玉讲《三刺孙传芳》。无论唱戏说书，都设在露台，星期六和星期日晚上听众最多。有一次，陈艳玉已讲了两回《三刺孙传芳》，第三回她想换个书目。凉风会听众大喊：“先生啊，不可换书，大家同意再讲《三刺孙传芳》。”陈艳玉笑答：“重讲不好听。”有一听众大声应道：“没这事，你这《三刺孙传芳》百听不厌，实在好，无须顾虑，再讲一回。”

福州评话“女三杰”：云、紫、艳，在艺术上各有千秋。“女三杰”的“云”指周云卿，她是连江人，到福州后，先拜叶三嫂为师，后再拜师黄天天。她面容秀丽，樱桃小口，一双明亮的眼睛，配上左右腮两个酒窝，真是一笑百媚生，广有台缘。“紫”指郑紫英，出身福州评话世家，启蒙师父是阿清师，即陈清，后再拜师兄陈春生为师。她的音色甜美，吟唱音韵悦耳动听，善于长段诉牌，不但吟唱得缠绵悱恻，配合的牌钹、珠簪也打得既精纯又活泼，钹帕飞扬，身段优美。

“艳”便是指陈艳玉，她出名后，对同行姐妹女评话员影响很大。她们见到陈艳玉那样的相貌尚能一步登天、名震榕城，很受鼓舞，跃跃欲试。叶三嫂也后悔地说：“我不该收徒弟以貌取人，

收云卿，不收艳玉。当初若不拒绝她，今日云、紫、艳女中三杰，我教两杰，何等荣誉。”

“双门大”临终偿话债

“双门大”徐炳铨讲书既有趣味性又有知识性，富书卷气，书中多穿插诗词歌赋、圣旨、公文、尺牋、契据，朗读得煞有介事；对历代帝制、朝仪、服饰、居室、起居礼节、习俗，都能如数家珍；喜引历史典故，铺排讲解得娓娓动听；吟诵腔稳健大方，与所擅长的“君臣书”如《大明志》《大红袍》《朱子执笔悬梁》《梅伯炮烙》等相适应。因而深得听众青睐，尤受知识界人士赏识。福州《华报》曾刊文称赞他“腹笥满贮史料，发语必取典实，首尾关合，听者动容”，“执评话界牛耳”。在行内也得到尊崇，被尊为“城台三总管”之一。他热心提携后辈，鼓励徒弟们“打破疆界，闯出新路”，陈春生等都得他的教益而成名。民国二十五年（1936）他去世后10日，9月7日《华报》刊文记其临终情形：“双门大在弥留时，精神转旺。于晨六时起，开始演讲其平生杰作《大红袍》全部。第一句书赞‘春去夏来秋又冬’，以下滔滔不绝，条序井然。一直到晚间十二时许，无少休止。但长日水浆不入口，神息亦不少衰。至最后结台尾声‘八仙过海聚会团圆’句，咳嗽一声，痰迷气逆，于是与世长辞”，“双门大说书垂三十年，债殆未了，至此话债偿清，方撒手归去，斯亦奇矣”。

温润不觉韶光换

——罗源非遗角梳今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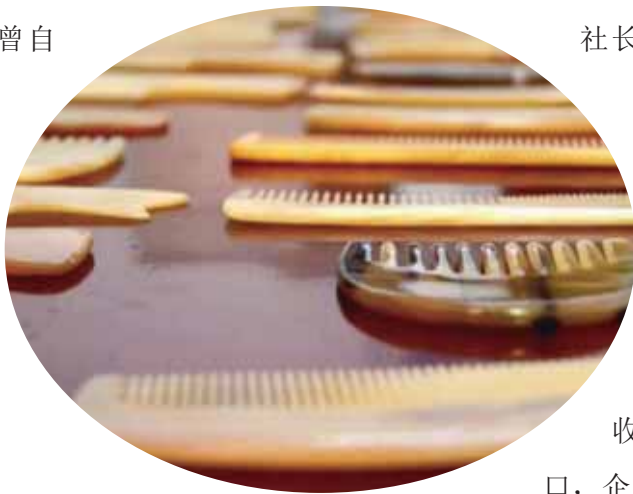
林梦阑

福州角梳由牛角或羊角制作而成，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与脱胎漆器、油纸伞并称为“福州三宝”。罗源角梳厂作为福州现存历史最久的角梳工厂之一，曾自创“牛头牌”和“少林牌”等品牌，凭借独特工艺和上乘质量，远销海内外。2007年8月，罗源角梳手工技艺被福建省政府批准为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命运·初遇角梳

1935年出生的程寿芳，已经85岁了。作为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角梳手工传统技艺传承人，40多年来，程寿芳对角梳制作工艺倾注了巨大热情，角梳的温润气质也浸润着老先生的生

命。5月的一天，我在南溪公园的林荫小道上见到了这位罗源角梳技艺传承人。



1956年，时任罗源县弹棉合作社社长的程寿芳遇到了难题：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抱怨收入太低。弹棉是一个季节性的营生，棉被需求量在冬季大幅增加，订单源源不断。夏季，生意就格外惨淡。淡季时工人们收入微薄，甚至难以养家糊口，企业的发展危机渐渐浮现。罗

源地小，人口少，对棉被的需求有限，眼看着一年的淡季又要临近，为了增加收入，21岁的程寿芳带领着工人们闯荡到了福州。

日子在日复一日的走街串巷中流逝。有时候生意找上门，工人便停留个三五天，然而大多数时候无所事事，他们往往在福州的街头巷尾晃荡

一整天也毫无收获。有一天，他们在三坊七巷附近转悠，路过一间作坊时，半掩的大门后隐约可见的成堆牛角引起程寿芳注意。他站在门口，隐隐听见里面传来工人忙碌的声音。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作坊就是福州市角梳厂的前身。如今的程寿芳回忆起来，与福州角梳的遇见，是偶然，也是命运。

程寿芳走进了这个有着几百个工人的作坊，完善的工序和流畅的生产线让他赞叹不已。程寿芳当机立断找到负责人，向他了解角梳的生产状况，并交流了弹棉厂当下的困境，以及创建新生产线的设想。角梳行业与弹棉行业正好相反，淡季在春夏季，旺季在秋冬季，正好能配合弹棉的时间节点，你方唱罢我登场，为工人创收。回到罗源后，程寿芳向工人兄弟们表达了自己的初步设想，毫无悬念地得到了热烈响应。于是他对外招收 10 位年轻好学的学徒。在福州角梳作坊里，

他们被安排每人学习 1-2 道角梳制作工序以及机器设备的打样制作。年轻人精力旺盛、悟性高，经过 1 个多月的磨炼，均学成回到厂里，程寿芳带领工人们自制并购买切割机、打胚机等机器，并针对学艺过程中暴露出的开齿等技术难题，特邀福州的师傅进行实地指导，循序渐进地将角梳制作的技艺学精弄透。自此，罗源角梳制作第一条生产线初具雏形。工人们满腔热情投入到角梳的生产中，第一批角梳很快就销售一空，角梳带来的收益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回报。

第一份国外订单让程寿芳记忆犹新。“那时角梳生产渐渐步入正轨，我到全省各地跑业务、拉生意。到了厦门鼓浪屿，那个时候旅游纪念品还比较少，纪念品商店内几乎看不到角梳。经与商铺老板沟通，角梳被放在店里展示出售。没想到仅过了两三天，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便找上了门。他用生疏的普通话简单表达了订购角梳的意愿，说希望带一批福建特色的商品在美国销售。我带着他观摩了角梳制作的工序流程。”程寿芳边说边笑咪咪地比画，“他很满意，还不停地竖起大拇指称赞我们的角梳呢！”有了这第一笔远销国外的订单，程寿芳对于发展角梳产业的热情愈加高涨。此后，程寿芳合理安排角梳生产线，工人收入水平明显提高，角梳的高销量助推生产规模的扩大，工厂的工作重心也渐渐转移过来。

1977 年，程寿芳借助合作社厂房，正式建立罗源县角梳厂。1983 年，程寿芳创设企业品



制梳师傅给梳坯开齿



程寿芳和他的罗源县牛头角梳厂

牌——“牛头牌”角梳。1988年，罗源二轻系统进行企业改制，程寿芳正式将罗源角梳厂转为民营企业。20世纪90年代末，罗源“牛头牌”角梳凭借独特工艺和优越质量，全面打开上海、浙江乃至对外出口贸易的市场。2007年8月，罗源角梳手工技艺被评为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6月，程寿芳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罗源角梳制作工艺第一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匠心·培根铸魂

《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传统文化对于孝的重视之甚，在清军入关之际，许多人不惜冒着被砍头的风险也坚决拒绝剃发，头发对于古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梳头的梳子也在历史上拥有了一席之地。古代女子出嫁时有家人为其梳头的习俗，梳子自古就寄托了“白头偕老”“相思”等美好祝愿。

关于福州角梳的制作和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700多年前。1976年，福州北郊新店出土了一座南宋古墓，随葬物中就有6支黑水牛角制作的半圆形角梳。那时，角梳还是象征着身份地位的礼器，尚未进入寻常百姓家。直至清代，以牛羊角、竹子、一般木材等制作而成的梳子由于成本低廉，渐渐地在普通百姓中普及开来。其中福州角梳精巧实用，且具有去屑止痒、护发健脑等保健功能，于是迅速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民国初期，福州角梳行业进入鼎盛时期，据统计，当时茶亭附近共有一二百家家庭作坊手工制作角梳，工人约有2000名，年产角梳278万支，福州成为全国三大制梳产地之一。

1935年前后，福州邹振记角梳庄创办者邹元华研制成功第一台“电动锯角机”，并凭借由知名漆画工艺师朱庄绘制虎豹、山水等图案的角梳作品在国际工艺品“小吕宋赛会”上荣获金奖。有一说法是巨商胡文虎曾出价半斤黄金购买获奖的“牛角虎梳”（不到3两重），可见角梳之价

比黄金。1957年前后，茶亭角梳制作的家庭作坊大部分合并，成立了福州角梳厂。程寿芳将福州角梳制作工艺带入罗源，几经兴衰，不断改进工艺，发扬光大。

说起角梳制作，程寿芳的眼里便闪着一种孩童般的光芒。他介绍说，福州罗源角梳的原料选择讲究，一定要用上等牛角或绵羊角，分为非洲黄牛角、内蒙古绵羊角和福州本地水牛角三种。黄牛角和绵羊角制成的角梳呈黄色，半透明。黑水牛角制成的角梳则黑亮清透。牛羊角不同位置做出的产品不尽相同。实心的角尖部分用以制作按摩棒或者梳子，中间角筒部分则视厚度大小制成梳子或刮痧板，还剩下一些边边角角则用来制作印章和梳类保健品等小物件。



程寿芳示范如何辨别真假角梳

早前，角梳制作只有8道工序，依次是锯角、砂皮、剔胚、打坯、画坯、开齿、剔齿、抛光，每道工序都由手工完成。首先取一只牛（羊）角，锯开后选择适合的部位用砂轮、砂纸打磨。待剔除角胚内部的骨头后，用木楔子等工具敲打，将胚压实抚平。紧接着在角胚上画线，确定梳子大小、梳齿宽度、间距等，用刻刀开齿。开齿后则要将多余的梳齿剔去。最后用砂轮机和砂纸修齿，打磨抛光，一把基础的角梳就制作完成了。有些角梳还加上雕刻的工序，工人们各自施展才华，或雕山水园林，或雕虫鱼鸟兽，装饰过的角梳在实用性之外又多了一份新巧雅致。

传承·不忘初心

随着机器应用和生产线的成熟，角梳生产工序从原先的8道增加到如今的23道，增加了吞坯、平面、打蜡等工序，每位工人负责1至2道，角梳的精细化程度及生产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在打胚工序上，工人们用液压油高温加热牛（羊）角胚，沥干后迅速放入机器压实抚平，每分钟可以打胚1块；在开齿环节，开齿机的普及大大提高了效率，弱化了开齿的技术性，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机器使用普及后，罗源角梳厂工人数量精简，日均生产量提高，角梳成品也愈加细腻温润。

40多年来，机器的普及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固然可喜，可角梳制作手工技艺的传承却几乎接

近断层。程寿芳对此忧心不已。从20多岁懵懂入门到如今，这门手艺是他坚持了半辈子的事业，倾注的情感不容置疑。但是愈渐疲软的市场、愈加稀缺的原材料、愈见迟缓的老师傅和招不到的年轻学徒，让制作技艺的传承岌岌可危。

这个时候，程寿芳从儿子那里找到了平衡点。45岁的程庆安是程寿芳的小儿子，1991年在父亲的影响下踏入角梳制作行业，在父亲日渐年迈后接替其成为罗源角梳厂的主要负责人，于2011年被评为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市级传承人。

程庆安和父亲商量，计划一边依靠机器生产的优势，发展角梳厂生产规模，提高销量；一边将原有的近300平方米旧厂房改建成非遗角梳文化展示馆，全方位介绍罗源角梳工艺的手工技艺历史、工艺流程，并进行角梳、刮痧板、烟斗等各类牛（羊）角制品展示，开设手工课程供游客体验，争取形成文化产业，做到既能产生效益支持展馆运作，又能扩大宣传效果，留住传统手工

技艺。除此之外，程庆安还计划积极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系列展示活动，让年轻人有机会了解到角梳生产行业，对角梳制作技艺发生兴趣，从而招收学徒传承技艺。对此，程寿芳十分欣慰，耄耋之年的他对角梳技艺的传承也有了新的期待。

罗源角梳厂的会客室窗明几净，茶桌后方的墙上挂着各类荣誉证书，整面墙的展示柜上则摆满了角梳及刮痧板、烟斗等衍生品。程庆安拿出一把角梳，它造型简单，整体呈淡黄色，梳身冰洁适手，梳齿细腻光滑，几乎没有一丝杂质，像时光里的温婉女子，目光澄澈，不施粉黛也动人。程庆安介绍说这是纯手工制作的，以后也将用于展示。“为了创新角梳式样，我们还准备引入现代技术。往后，还将发展激光雕刻、激光画胚。针对的不只是图案，连梳子的外形都能用机器完成，实现精准雕刻。”程庆安的介绍，热切而充满期待；而程寿芳望着儿子手中的角梳，若有所思，“是越来越好，可冰冷的机器终究取代不了人文的温度……”

交谈的最后，程老不免有些感叹，四五十年与角梳相伴的时光，仿佛就在昨日。他说梦回时，还经常看见那个年轻的、努力带领工人们走出困境的自己。或许仅有对角梳的热爱是不够的，还有一份对同事后辈的关爱，一份对技艺传承的执着，才使得程老在角梳技艺的改进和发扬道路上越走越远，使得罗源非遗角梳在时光的长河里，愈发细腻温润、闪耀动人。



程庆安教侄子程煌如何对角梳开齿

振臂有声香店拳

田荔琴

在小柳村，与王华南先生通上话后，我按照他的引领步入省委党校的一侧，就看到人行道上有一人身着运动衣裤，上衣的前胸上印有两个红色大字：福建。识别度很高，我毫不犹豫地走到他跟前，直接打上招呼。

70岁的王华南面色红润，身材匀称。见面

后，他摘下墨镜给我看他的双眼：“对不起，刚刚做了眼睛白内障手术，所以没礼貌。”我说没关系，并请他继续戴上。

作为香店拳第六代掌门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香店拳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裁判、中国武术七段位，他12岁开始习武，多次参赛，为福建领回多枚金牌银杯；20岁开始教拳，50年来义务授徒近千人，小拳种已然开枝散叶，并成功申报为福建省“非遗”拳种。

到了香店拳会所，坐下茶叙，王华南点上一炷香，随口问：“香吗？”我说：“香。为什么这个拳称为香店拳？”

“那是因为它源自香店。”

香店拳其实是南少林罗汉拳的一个分支，只不过是在福州南街庆香林



香店拳第六代掌门人王华南



香店拳发源地锦巷旧影

香店内进行了演变。乾隆年间，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南少林寺僧众因为反清复明被清朝廷追杀，其中一位名叫智远的武僧从混乱中逃出，潜伏福州，藏身于南街庆香林香店，得到店内老板和工人的精心保护，安然无恙。感念之下，智远和尚主动提出将自己多年练就的武功和掌握的伤科中草药知识及其医治方法传与老板后代及工人。之后，智远和尚又将实为南少林的“罗汉拳”改造为“香店拳”。后来，传授面逐渐扩大到香店全体师徒。白天做香烛，晚上到后院习武，香店内形成一股习武风气，一直延续了几百年，直到“文革”时期式微。

王华南孩童时期在南街生活，与庆香林香店同住一个院子，有幸入得店内师傅房利贵的慧眼。房利贵（1903-1981）是福州东郊登云山人，于1915年进入香店做工，便拜当时的第四代掌门人林庆桐为师，全面系统地学习掌握了香店拳的

各种套路和散手技法，深得师父的器重和弟兄们的敬重。为了进一步提高功夫境界，汲取各路流派之精华，他还走出香店，四处游访，回来后担起了武教头一职，在社会上威名远扬，并在林庆桐的栽培下担当起了第五代掌门人的重任。

当时，王华南也是房利贵入店时的年纪，课后经常在院里和比他年长的伙计们玩耍，

不仅从不惹是生非，还经常主动搭手帮忙。房利贵喜爱有加，视如己出，打破了智远和尚定下的功夫不外传的门规，不仅让他观摩，还手把手教练。

在香店里练拳，虽以拳法为主，但对基本功要求很高。开始习武时，每天都得按照规定用木棍反复击打手前臂桡尺骨部位（俗称天地骨）和小腿前区胫骨下端，击打后，再用香店内秘制的中草药擦洗。这样，日复一日，能练就一副硬骨头。抛接石锁也是日常功课之一。石锁轻则五六公斤，重则一二十公斤，先要抛向空中，再伸手接住，每日反复几十次。在这样的过程中，跌倒打伤是家常便饭，于是，店内也因此研制出颇有疗效的治伤药剂。房利贵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掌握了香店拳的伤科治疗方法，对各种跌打损伤和关节疼痛均有秘方。久而久之，香店形成了一个传统，那就是师傅在传授弟子武艺的同时还会悉



三坊七巷庆香林香老铺

散手套路有三战、硬三战、八步、八步中下框、十字、少林、罗汉、三步三、四门脚等。主要器械套路有马步刀、单肩流水棍、少林四门棍、锄头法、扁担法、洋伞法等。

心传授疗伤秘籍，既有内服，也有外敷，十分见效。

至于香店，“文革”后成为一个普通小日杂店，旧址在城市改造中已不复存在。但是，制香人的武艺与武德仍然芬芳四溢。

香店拳是以实战为目的、技击性强的地方拳种，尤以劲道十足、变化迅速而被武术界称为“香店手”。

香店拳数百年来都是以口传身教的形式在香店内代代相传，并没有形成一个理论体系。2005年5月18日，100位香店拳弟子在福州登云小学召开纪念宗师房利贵诞辰105周年暨首届香店拳功夫研讨会，成立了香店拳功夫研究小组。近年来，王华南组织研究小组挖掘整理出香店拳10个徒手套路、1个对打套路、6个机械套路、3个器械对打套路以及散手技法、硬气功等。其中主要

引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见缝插针，随机应变。在战术上要求不轻敌不畏敌，胆壮神定，傲气凌然面敌，气势凶猛攻心。在手法上要求集中精力，胆大心细，出手时握紧拳头，如狂风暴雨连击不止，快如闪电，无坚不摧，招招出手又不见手。在身型步法上要求稳固柔顺，身随步移，进、退、闪、躲、避，随意而动。

我请教王华南老师：“听说‘功夫要好，在三战里面找’，何以言之？”王华南解释道：“那是因为三战是香店拳中最为重要的基础套路。”话音一落，只见他挺胸收腹，目视前方，沉肩坠肘，两臂平衡用力，手以拳、掌、指为主，步稳势烈，出手生风，舒展大气，全程质朴无华。动作手法多变，虽招式简练，但周身是手，处处是拳，指戮掌劈，十分威武。我领略到香店拳的气韵，也领略到王华南对香店拳的专注和深情。

香店拳在战略上要求讲计谋、巧

尤树的传奇

黄文山

记得早些年从福州乘汽车到闽南，将出闽侯县境时，眼前会兀现一座大山岭，汽车左盘右旋方上得山岭。后来，有了高速公路，在两道山岭之间，出现了一座尤树特大桥。汽车驶上大桥时，从车窗下视，峡谷深不可测，令人炫目。这座桥梁的跨度之大，墩身之高，成为我国当年桥梁施工中技术含量最高、难度最大的一座高架桥。而尤树的地名，也引起我的好奇。为什么叫作尤树，这里面难道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正思索间，只见公路已如一条灵蛇般钻进了大山胸腹，洞口上方镌有五个大字：相思岭隧道。于是，这座桥、这条隧道连同这座大山的名字，便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近日到青口采风，人们

告诉我，东台村有条尤模街，曾经繁闹一时，有“小尚干”的称誉。我知道，闽侯尚干镇曾是乌龙江南岸最重要也是最繁华的农产品集散地，是远近驰名的商贸中心。而且，当地民谚还有“先有尤模街，后有东西台”之说。东台和西台都是大村落。可见尤模街名气之大。



穿过东台村的尤树特大桥

我们乘坐的小汽车顺着上升的坡道驶入村子。只见眼前一座灰白色的高架桥如同长龙般盘旋于村庄上空，仔细端详，分明就是那座尤树特大桥。尤树的名字又一次撞进我的脑海，尤树和尤模，它们间有什么关系？

甫进村口，呼啦啦一下涌来六七位老人，他们是应邀来向我讲述尤模街历史的。这些 80 多岁的老人，回忆起当年尤模街的繁华景象，一个个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半个世纪前的记忆，在他们的心中依然那样鲜活。

尤模街正当古驿道要冲。这条长 300 多米、



相思岭古道

宽十一二米的街道上鳞次栉比排列着 200 多家商铺，有客栈、钱庄、米店、铁铺、酒楼、理发店、成衣店、青草摊，乃至棺材店，应有尽有。每天过往的行人不下千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最多的是南来北往的挑夫，从北边大义渡口过来的，挑的多是丝绸棉布米面和日用品，自相思岭南来的多是盐担和海产品。一上尤模街，挑夫们全都来了劲，肩上的扁担上下晃悠，脚步声踩在石板道上，富有韵律而动听。街两边的店铺也各有各的招数，他们要千方百计留住行人。一时，街道上色彩纷呈，香飘四溢。

由于尤模街来往的各色人多，便于掩护，中共地下组织遂将支部建在尤模村，并利用街上的理发店设立了秘密联络站。

尤模街的繁华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因为福厦路的开通，而且有了更先进的交通工具，这条古街就此沉寂了，只留下一段繁华的记忆，在这些老人们的心湖里不时泛起涟漪。

而今，古街虽在，但已难寻昔日旧貌，让人不禁为之惋叹。不过，我注意到，街两旁的房子上都钉有两副门牌，旧门牌上标尤模，而新门牌上则标尤树。可知现在的尤树就是过去的尤模。

可是当我问及他们村名的来历，老人们全都摇头，说他们一出生下来，这里就叫作尤模。

“1944 年秋天福州第二次沦陷时，日本兵来过尤模村，他们是从大义方向过来的。”一位老人回忆说，那时他已经 10 岁，印象深刻。顿时，好几位老人也都打开了记忆的匣子。据他们

说，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来了大约有一个小队，在尤模街驻扎了小半年。“日本兵的大皮鞋踩在石板路上，声音特别响。老远听到皮鞋声，商贩们就赶紧关了店门。南北的挑夫更是避之不及。日本兵到这里，主要任务就是强征附近村庄的民夫，上山砍伐松树，而后一批批运走。”“当年这里满山可都是好几百年的笔直大松树。”老人们感叹地说。

我了解到，其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日军正在作垂死前的挣扎，大量抢掠物资。松木是作坑道的最好材料，于是，相思岭一带的松树林，遭到了日军的无情洗劫。

我似乎明白了村名的来历。“模”是闽浙一带方言用字，同树，在福州方言里，两个字不仅意思相同而且读音也相同。“尤”在古汉语里是突出之意。尤树，顾名思义就是特别高大的树。古代尤树村正当福州南向的官道上。查史志，宋代福建转运使蔡襄曾在这条道路上发动民众广种松树。松树高数十米，树龄可达千年以上，蔡襄的这次大规模植树，成就了相思岭的大片松林。

蔡襄本是朝廷谏官，因刚直不阿，引起仁宗皇帝的不快，外放回福建出任地方官，先任福州知州，不久改任福建转运使。在任上他奏请修复



相思岭

莆田水塘，减征地方丁口税，重视发展北苑茶，后来在知泉州期间还主持修建了洛阳桥，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由福州南下直到漳州的这条道路，是当时福建交通的主动脉，蔡襄经过实地考察，将道路全面整修，同时大力植树，既护路，同时庇荫暑天民众出行。百姓感念蔡襄的德行，赋诗歌颂：“道边松，大义渡至漳东，问谁植之我蔡公。岁久广荫如云浓……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长清风。”相思岭一带，更是林密树茂，尤树由此得名。

这个小村庄，也在不经意间，留下了一位古代官员的不凡政声。

在老人们动情的讲述中，一个村庄曾经的故事，传奇般迷人，童话般美丽，让人咀嚼不尽、感怀不已。

“舢”字的由来

张德团

20 世纪 80 年代，闽清县与全国一样开始编写首轮地方志。在编写《闽清县交通志》时，却遇到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就是打字时打不出一个县内广泛使用的常用字——“舢船”的“舢”字。当时使用的是手动铅字打字机，任由怎么找，字模字库里就是没有“舢”字。编写组感到十分惊异：明明县内所有关于船运的档案资料包括文件、报表，从钢笔手写刻到版油印，都一致地使用“舢”字；甚至从方形公章到圆形公章，以及闽侯专区和福建省税务机关发放的船证中，也均使用“舢船”一词呀！为慎重起见，编写组还进一步查阅了《新华字典》《辞海》《辞源》《汉字大字典》《中华大字典》，均未查到“舢”字；又查阅收字量更多的《康熙字典》以及用福州话标音的《戚林八音》字典，也未发现“舢”字。困惑中，经请教民间耄宿，方知“舢”字乃闽清人祖上所造用于命名“舢船”的专用字。

字典里找不到“舢”字，打印机也打不出“舢”字，所以，《闽清县交通志》编写组为了方便打印，遂用“鼠船”一词来替代“舢船”专用词。其思路是：“舢船”俗称“溪鼠”船，那就名“鼠船”吧。此后，相继编成的其他一些史志书籍也引用“鼠船”一词。如今，作为实物的“舢



1950 年的闽清龙潭口渡船码头

船”已经走进历史近半个世纪。时间久了，年轻人从史志书籍上只知道“鼠船”之名，而对“舢船”这个颇具历史文化内涵的船名反而陌生甚至忘却了。

闽清建县于五代后梁乾化元年（911）。县境内溪流纵横，山川阻隔。古时交通十分不便。据志书记载，宋代时，闽清人民根据境内溪流多、河水浅、河床窄、滩濑密布的特点，创造了一款船底平滑、船身细长（基本船型长约8米、宽约0.86米、高约0.82米）、头尾尖翘、船型独特的小船。配以桨、篙、舵、篷，既可航行于江河湖潭，也适航在小溪窄港浅滩，甚至该船的制造与撑行也是闽清人的技术专长。闽清人俗称其为“溪鼠”船。其载重吨余，客货兼载。自宋代开始，时间流行千余年，直至20世纪70年代

铁路、公路兴起后，才逐渐式微。其足迹遍及大半省，推广应用到闽江流域二三十个县市，拥有量以千万计。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曾出现闽西北各县争相向闽清商调“溪鼠”船的火热年代。其时，闽清“溪鼠”船在闽西北深山峡谷中勇闯一条条荒溪野流，过激流险滩，避暗礁旋涡，到了从未见过舟楫的偏僻山村，促进了山区物资流通和经济发展。因业绩不凡，被载入国史省志市志，乃至各县交通志。

关于“溪鼠”船名称的由来。一说因其船型两头尖，船体窄而长，形状似鼠，故名之；又一说，该船在浅水险滩中航行，轻便机动，灵活如鼠，因而得名。不管哪种说法，应该说，闽清人民在发明创造出这款独特船型之初，以鼠为名，是怀着一种喜悦与褒扬之意的，也是诞生之初随口呼出的俗名，就如同为新生婴儿起的昵称或小名一样。

随着“溪鼠”船使用范围的扩大及历史积累，其影响力也逐渐扩展到各种领域。比如，以文字来记录书写“溪鼠”船一词的机会增多；在日常生活、商事活动的语言交流中，“溪鼠”船称呼更是日益频繁。此时，智慧的闽清人民便科学合理地应用造字法，左边以“舟”字为偏旁，右边以“午”字做基本字，造了一个左右结构的“舢”字，用来为



曾经的鼠船码头——建宁万安桥畔

“溪鼠”船命名。

从此，“舢”字在群众尤其是广大船工中可认可读可写。如今，健在的老船工几乎人人皆能说出“舢”字的结构与写法，许多船工还会拿出他们保存的证件，解释其中的“舢船”一词。2017年，定居于建宁县、时年91岁的闽清老船工林兰妹，虽然其文化程度不高，在给闽清县政协采编组的来信中，甚至出现许多错别字，但却能准确无误地写出“舢船”一词。闽江边的闽清县东桥镇安仁溪村，是一个使用“舢船”延续历史最长的村子之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该村担任集体化时期生产队财务人员的刘景星先生说，其时，生产队劳动天天离不开“舢船”，他每天记工都要写许多的“舢”字。同时，在漫长的闽清船运史中，形成了闽江干流“米船”与支流溪河“舢船”相结合的运输模式，故在船运商事中应运而生了人人皆知的“米船账簿”和“舢船账簿”。

从政府机关文件、公章、证照到民间史籍曾广泛使用“舢船”一词。现在已知：闽清五都《柏岩黄氏支谱》就有手写体“舢船”的文字记载。从闽清县档案馆查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机关单位相关文件中手写或刻版油印的所有文件、报表及证件中，均用“舢船”一词。所用公章也是用“舢船”一词。

在众多正规出版物中“舢船”一词已被应用于排版印刷成字。闽清县、福州市、福建省的多部史志资料以及国家交通部档案中均有“舢船”

一词的记载。在交通系统正规出版的史志中，已知的有《福建航运史》《福建水运志》《建宁交通志》《泰宁县交通志》《将乐县交通志》《宁化县交通志》《光泽县交通志》《大田县交通志》、邵武市文史资料《邵武航运今昔》一文等都用了“舢船”一词来记载“溪鼠”船。

此外，“舢”字还由名词转义为量词。老船工陈仕莲说，20世纪60年代，“舢船专业队”前往梅埔火车站为闽清县造纸厂运煤是“按趟计资”，但记数单位不用“趟”，也不计多少“船”，而是记多少“舢”。县内闽江边的东桥镇安仁溪村也有这种习惯。“舢”字由名词转为量词，这是“舢”字因长期应用于实际，出现的一种耳熟能详、得心应手的现象。

闽清人造“舢”字，将“溪鼠”船命名为“舢船”的动因，今人虽然未能找到确切的佐证，但依据闽清的历史习俗与传统文化，应该与以下几种因素有关：一是“鼠”字土气偏重、俗味过浓。用“溪鼠”船与声名鹊起的身份显得不太协调，难登大雅之堂。二是字含贬义。“鼠”字有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贬”义与“贱”相，如在各类词典中可随手拈来的“鼠头鼠脑”“鼠目寸光”等；在民间俗语里亦有众所周知的“老鼠偷油”“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类的贬义词语。三是谐音忌讳。当地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鼠”与“死”发音相近，因而引起人们的忌讳。特别是在江河激流险滩中行船的船工，风险高，性命攸关，最是不愿听到与“死”发音相近的字词。

关于“舢”字出现于何时，由谁所创造，从目前已知的官方史志书籍中，尚未找到相关记载。闽清流传下来的第一部志书是乾隆年间的手写本。《闽清县志》载：“因明季兵燹，前朝之记载茫然。”所以，有关“舢”字造字的记载资料最有可能散佚于明朝至清乾隆之前。再者，古代闽清乡间多灾多难，兵灾匪患不断，瘟疫疾病频发，甚至时有山洪暴发，常因此出现民不聊生乃至一些乡村没落消失的情况。因此，漫漫岁月、坎坷历程逐渐淹没了创造“舢”字创作者历史信息的可能性存在。

据分析，宋代造“舢”字的可能性最大。在闽清船工中乃至整个船运业，不仅一致使用“舢船”一词，而且是代代相传、口口相传“舢”字，甚至明确强调应写“舢船”，不能写成“鼠船”。从中反映出民间尤其是船工对“舢”字认知的根深蒂固、观点的明朗清晰。但就是没有传说“舢”字出现于何时，是由谁所创造。“舢”字若是由近代甚至于现代的人们所创造，如此重要的造字命名的敏感之事，船工们应该不会忘记，更不会没有传说。反之，也可以证明，“舢”字出现的年代应该比较久远（或是宋代），因此导致造字历史信息的失传。

而创造“舢”字之人，应该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文学修养，还要深谙闽清话发音和内涵的人或群体。而宋时，闽清文人辈出，早在北宋嘉祐八年（1063），邑人许将科举状元及第，成为福州地区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南宋淳熙四

年（1177），邑人黄唐“两优释褐”状元；南宋嘉定元年（1208），邑人郑性之又状元及第。宋代，“小小闽清县”就有进士88人。其中，还有成为礼乐大家的陈祥道、陈旸，其陈氏家族有“五子四登科，一门七进士”“十八学士”之盛况，许将、许份“父子双进士，同时做朝官”之荣耀等。邑内呈现文风昌炽、隆极一时的繁荣景象。这些文人雅士为家乡父老发明创造的独特小船造一个“舢”字来命名，不仅驾轻就熟，更是情理中事。而在明清两个朝代，闽清则没有了宋代那样辉煌的科举成就，社会发展也较之宋时逊色。故此，相比较而言，宋代造“舢”字的可能性最大。

2017-2018年，闽清县政协决定，用两年时间对盛行千余年、涉及整个闽江流域的闽清船运史做一次全面调查采访，并编辑文史资料。当暂用名《闽清鼠船和米船》文史资料征集启事发出以及在采编过程中，许多老船工再三嘱咐、反复强调：历来都是写作“舢船”，怎么会写成“鼠船”呢？其间，不断有老船工给采编组打来电话说：务必要用“舢船”，不能写成“鼠船”！甚至从闽西北方面传回微信：“是‘舢船’，不是‘鼠船’，老船工对‘鼠船’非常反感！”而且，多部省市史志包括闽西北大多数县的交通志也都用“闽清舢船”一词来记述那一段辉煌的历史。鉴于上述史实和船工的强烈反响，暂用名《闽清鼠船和米船》文史资料遂郑重更名为《闽清舢船和米船》，并如期印行。

联话扈屿

林 山

有个村子，名字很特别，叫村里村。

村里村原来是闽侯县祥谦公社扈屿大队村里联队。更早，它是指一个村落的里边，一个毫无特征的地名。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祥谦公社更名为祥谦镇，而从祥谦公社中分出一部分，设置为青口镇。扈屿大队归青口镇，扈屿大队的村里联队，分出来作为一个村，指地为名，就叫村里村。跟村里村同属扈屿大队的邻村则定名沪屿村，那里原是扈屿大队队部所在地。

村里和村外，统称扈屿，多为叶姓人家。走进这里的扈屿玉山叶氏宗祠，让人目不暇接的是那些黑漆描金的楹联。联中蕴含着村里村外历史，承载着叶氏家族人文底蕴：

肇南阳徙固始移甘洲源远流长发祥万代；

宗富沙住还珠衍玉屿觅仁择处更益三迁。

读懂这副楹联，就能了解村里村叶姓家族的迁徙历史和线路图。

从五六千年前开始，福建先民在东海海滨

和闽江河口地区，聚族而居，农耕渔樵，自给自足，称为闽族。战国中期，越族南下，与闽族融合为闽越族。秦在这里设置闽中郡，汉代设立闽



闽侯扈屿玉山叶氏宗祠

越国。

西晋时，爆发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中原民众饱尝战争之苦，加上天灾，痛苦不堪，流离失所。而皇室、世族则纷纷迁往江南。当时中原一些大姓入闽后先在闽北及福州定居，而后渐向闽东和闽南沿海扩散。

据《扈屿叶氏族谱志》记载：“叶氏之先由晋永嘉入闽。”按照这楹联表述的脉络，入闽前，叶族从河南南阳迁到固始，再移居金陵，然后入闽，迁到建宁富沙。“自唐处士赠太中大夫”由富沙迁到闽江下游，“家于侯官之甘洲”。甘洲，过去是闽江中的一个冲积洲，现在是闽侯县政府所在的甘蔗街道。叶氏定居石门乡九功上里，到唐太中大夫的第五代孙叶克承，娶了林家姑娘。

后汉高祖元年（947）叶克承去世，那时其妻已怀孕3个月。就在这一年，经常发洪水的闽江，又暴发大洪水，房屋倒塌，家具水上漂。叶家媳妇侥幸搭在一个大木柜上，被洪水裹挟，一路上激流汹涌，命悬一线，唯有求老天保佑。好在漂到下游一个叫扈屿的地方，木柜搁浅泊岸，方才得救。

这个扈屿，历史上属闽县内七里的还珠里。在宋代，闽县在此设14里，分为内外七里。以还珠、永庆、灵岫、清廉、西集、方岳、积善为内七里。

当怀有身孕的林氏被洪水漂流到这里，就在当地居民的关心帮助下，留在扈屿居住。几个月后，林氏生下儿子，取名叶延，希望能够延续叶

家香火。从此，叶延就成为扈屿叶族的始祖，其子孙后裔枝繁叶茂。《扈屿叶氏世谱族系》记载了这个“水流婆”甘洲林氏的传奇故事。《三字经》里说“昔孟母，择邻处”，就是说孟轲的母亲为选择良好的环境教育孩子，多次迁居。这副楹联用“孟母三迁”的典故来歌颂林氏这位伟大的母亲。

无独有偶，约400年后，扈屿又出现一个“水流”的传奇：又是一场大洪水过后，泊靠扈屿道的渔民发现有个木偶搁岸，就推它顺着退潮流入大海。第二天，木偶却随着涨潮又漂了回来。大家感到很奇怪，就把木偶放在坂尾洲岸边。当天晚上，有的渔民做了个梦，梦见木偶为“水流王”伍子胥。于是人们供起木偶，烧香磕头，祈求保佑。接着就建起取名“水鉴殿”、祀“水流王”伍子胥的庙宇。

苦读勤耕精文尚武见吾族千般事业；
履仁行义入孝出悌具人间一等家风。

有宋以来，村里村外曾经出现好多家不同形式的书院，如供奉魁星的奎星阁、纪念朱熹的朱子楼，还有旧隐堂、福雅斋、培桂轩、文峰楼、青云斋、石林精舍等。据有关家谱记载，元朝的时候，叶全不乐仕进，居旧隐堂，聚徒授业讲学，从游者达200多人；石林精舍则是明翰林院编修陈仲完“于所居偏僻一室为修读所”（《石林精舍记》）。

村里村属扈屿。《尔雅》解释“山卑而大曰扈”。后来有人因为“扈”难写，就用“沪”字代替，而此人又是经常要填写上报表格和报告

的文书，于是自上而下认可了“沪屿”。而“扈屿”只保留在族谱和村民的记忆中了。地名是一个地方的“出生证”，系人文历史基因所承载，随意改变，会让人“找不着北”。

“南去郡城八十里，有扈屿山中，其地平壤善稼，有丘焉隆起，俗名后山。濂江西来，迤其背，东为淘江，出西峡以达于海”（明林志《后山亭记》）。如此山水佳地，有史以来，扈屿当仁不让成为闽侯七里的中心，人文鼎盛，文化底蕴深厚。

明永乐年间，扈屿的叶光在后山建后山亭，经常呼朋唤友来此雅集。他与同乡陈叔刚御史、尚干著名文人林枝、闽中十子高士漫等名士硕彦交友唱和，饮酒作诗，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明朝中期，扈屿举人叶宗周和大义陈达进士、尚干林世调进士等姻亲好友组织诗社，每月一会，相约泛舟濂江，曲曲水路蜿蜒，一路按韵作诗，当场吟对，足显名士风流。当年的诗文还结集出版，

陈、林、叶三家各有保存。但明朝叶氏老族谱曾遭火，厚厚的诗文卷烧毁殆尽，仅存《秋江夜泛集》序言一篇和部分遗存诗句。据说，在宁波天一阁还能查阅到《秋江夜泛集》。

村里村外到处古厝新居。颇有意思的是，叶氏一房原先三大厝分别叫草堂厅、柴阶座和旗杆里，亦雅亦俗，或显或隐。其名所来，应该有故事。据说，明中期，叶茂实在玉山建宅，取名“山中草堂”，后遭回禄，遗留廊石台阶。

濂水含珠代出俊贤光海宇；

虎峰蕴玉恪守俭德振明时。

濂水，又称濂江、淘江，是扈屿的母亲河，过去也承载着交通运输的主要功能。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里的亭，在村里人来说，自然就是附近的穆岭亭。这古道，也就是穆岭亭所在的穆岭古道。它是古代一条由闽南到省城福州的重要驿道。

福州讲评话的先生，都会说评话序头。比较



穆岭亭



穆岭古道

经典的评话序头有《进京路引》，唱的是古代莆田经福州进京的驿道：“……琯口大义隔蜀暝，青圃兰圃慢慢走。乌龙过江三角埕，城门黄山乡下路，后坂直拔白湖亭。下屿红墙十锦祠，梅坞过岭仓前桥……”这一段说的就是从福清琯口，经闽侯青口，过乌龙江，进福州城的古驿道。

唐代起，村里村附近就有省际驿道穿越。宋时，形成了以今福州为中心的“南出莆田，北抵永嘉（浙江温州），西达南平”的3条主干道。明万历四十年（1612），为避免从峡兜渡乌龙江的风险，改由侯官县白鹭铺西行。就是由阳岐渡江到闽县的蒙山（南通文山），过扈屿达大田驿与原路相接。

濞水与古驿道盘活了扈屿商贾与外界的联系。南下莆仙、闽南，北往永嘉（温州），西行建州（南平、建阳），扈屿确立了与省城、周边地区物资集散和商贸交易要地中心的地位。

扈屿道岸边货栈旅社很多，连接著名的扈屿街，是个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闽县乡土志》载：“扈屿居七里之要冲，贸易之利甲诸村。”

据扈屿人回忆，扈屿街上有店铺、货摊几十家，比如布店有永昌隆、丽新、中文，京果店有品中有、厚昌，京果店有永源茂，米厂有便农、协余，酱琦厂有万元库、公大和，药店有寿山、益龄、大森，还有5家打铁店，以及饼店、当铺、竹器店、木器店等。

受海潮影响，淘江每天涨落两次，为鱼类带来丰富食物，河中盛产虾、蚬子、白刀鱼、半边

鱼、鳗鱼等，尤其是单脚蛭名闻遐迩。清林履端说：“江之中多鱼虾，次则刘蜆，产于洲渚草间。又次则独脚蛭者颇多。余若鳗蟹、田蛙、螺蛳之属率皆肥脆甘美，可为下酒之资。”

省都三山吾境并称三山独厚神工人杰地灵世裔俊；

国柱将相本宗历显将相巍然耸立物华天宝民族林。

上联开头说的是一个奇特的地理现象——城乡两“三山”。

历史上，福州民间流传着“三山现、三山藏，三山看不见”的民谣。其中“三山现”指呈三足鼎峙之势的屏山、于山与乌山。“藏”与“看不见”的，都是三山的支脉。随着历代道路的拓宽与民宅建筑的稠密，这些小山或被削平，或被遮挡。按照三山地脉之走向，就是：屏山现，芝山藏，龙山看不见；乌山现，玉尺山藏，钟山看不见；于山现，罗山藏，丁戌山看不见。

谁能想到，远离省会的扈屿，也有“三山现、三山藏、三山看不见”的民谚历代流传？“现”的是玉山、壶山、庄山；“藏”的是阜山、榄下山、庭头山；“看不见”的是花猫山、根兜山、龟山。也许，在扈屿人的心里，自然风水和人文生态与省城一脉相承。

这副楹联没有说到的，还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城乡两“扈屿道”。

淘江的支流有个荷莲浦，那里的坂尾洲是个天然的港湾。坂尾洲早年有一个大码头，俗称



扈屿线面

现在村里村外随处可见正在拉面、晒面的人们。比较出名的有：过去鼓楼“布司埕”是福州线面重要产地，留下“鼓楼前布司埕线面”的说法；晋安“后屿线面”远近闻名；而扈屿的特产线面也是鼎鼎有名，组建了线面合作社，产品可以供应半个福州城。

勤劳智慧的扈屿人，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搞发展，还喜欢盘活各种资源创新创业创出品

牌。除了闻名遐迩的“扈屿线面”外，“扈屿席”也是鼎鼎有名。

《闽县乡土志》是这么说的：“其男子多习线面，妇女多习织席，即此二宗，岁入数千千。”扈屿的草席，冬暖、夏凉、透气、散热的特点，深受人们欢迎。扈屿席的编织技艺历史有600多年。扈屿席制作以家庭手工作坊为主，是农忙之外的家庭副业。扈屿不产席草，原材料都来自闽江口盆地咸淡水滋养的咸草、淡草、灯芯草和岩草，还有黄麻。收割后经劈割、洗涤，晾晒后通过工具打席架、梭针竹竿、紧箍木托等编织而成，之后还要经过拉推缩紧、剪边、晒干、整形等工序。扈屿席年出口量最多曾达到50万张。

读了这些楹联，感叹扈屿这村里村外的文化深厚。走出祠堂，那匾额上的“俭德堂”就印在脑海中了。

“扈屿道”。从省城福州往返扈屿一带、福清方向的大货船大多在此停靠，货物上岸，转走陆路。

扈屿的大米，以“扈屿尖”享誉三山。因为水土的关系，米质好，很受周边地区百姓喜欢，特别是福州城区居民也爱吃，当年村里村外单单加工扈屿大米的碾米厂就有6家。因为扈屿大米“扈屿尖”大量供应省城，以至于福州台江码头苍霞那边有个专门停泊运送扈屿大米船只的码头，叫“扈屿道”，有“省垣第一道”之称。现在那里还有一个“美打道”（谐音“米达”道）的地名。

当然，有趣的事情接二连三——城乡两“线面”。那就是著名的“扈屿线面”和“后屿线面”。

扈屿的手工线面，既柔嫩又富有弹性，堪称一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创意，反正

诗人笔下的于山

危砖黄

“于山的好处，是在它接近城市，遥揖闽江，而鼓山岚翠，又近逼在目前。你若于饭后省下三十分钟工夫，从东面九曲亭边慢慢地走上山去，在大榕树下立它片时半刻，看看城市的繁华，看看山川的苍翠，一定会感到积食俱消，双眸清醒；而正因为俯拾即是市场之故，所以又不至于有厌离人世，想一个人去羽化而登仙。我故而常对人说，快活的时候，可以去上上于山，拜拜戚将军的遗像，因为在于山上所感到的气氛，是积极的，入世的，并没有那一种遗世独立的佛徒们的悲观色彩。”

这是郁达夫先生《闽游滴沥（之五）》的一段话，以他独具慧眼的观察和理解，概括出了于山的入市和入世的特点。

现在人们谈论于山，其要者大抵有三。一是由“九仙山”（于山别名九仙山）的传说而衍化的仙风道骨；二是由多处重要教育机构的设立而流播的文教风气——不仅于山西北曾经毗邻古代学政署和府学所在地，于山北麓曾经有个赫赫有名的鳌峰书院，即如白塔寺法雨堂也曾经做过船政初期的学堂；三是由平远台多起军事事件——

特别是戚家军的庆功和“福建事变”的策划而汇聚的铁血丹心。

倘若你愿意如郁达夫先生所说“于饭后省下三十分钟工夫”，去上上于山，那么，登山之前或者下山之后，不妨读几首诗词，或可有所助益。



于山白塔寺

眼看沧海近，身与白云高

于山最高点叫作鳌顶峰，即鳌峰，位于平远台东南，宋代有嘉福院地，因状元陈诚之曾在这里读书，俗称状元峰。北宋诗人王逵《鳌顶峰》诗写道：

眼看沧海近，身与白云高。
回影连三岛，盘根压六鳌。

王逵（992-1072），字仲达，河南省濮阳县人。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进士，曾出任处州、福州、扬州、洪州、兖州、全州等地知州（太守），最终官至兵部尚书。他出任福州知州的时间是宋仁宗庆历二年至四年（1042-1044）。王逵大部分著作今已散佚，存留在世的诗作也不多，但至少有三首写到福州，《鳌顶峰》是其中的一首。

诗中的“三岛”，指道家神仙居住的地方，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地。“六鳌”，缘于鳌顶峰的传说，传说此山是六只巨鳌从东海之滨驮来。

站在鳌顶峰，眼看东边，大海好像离得很近，而自身又仿佛高入白云。回头看山影，它似乎与蓬莱三岛相连，同时，整个山体盘住脚跟，紧紧地压住传说中的六鳌。

诗人登临于山鳌顶峰，所见所感，“沧海近”与“白云高”并举，写出了鳌顶峰的高耸和气派。地理形胜，使人不由得联想到道家仙境，再



于山状元峰（鳌峰顶）

加上此处有六鳌的传说，更增添了它的神奇魅力。

昨游九日山，散发岩上石

在于山吸翠亭旁，有一巨石，题刻“廓然台”，乃是北宋福州音乐理论家陈旸命名，高僧鸿份手书；宋时，站在此处远望，可见绿野广阔，风景绝佳，廓然就是广阔、寥廓的意思。朱熹有《寄题廓然台》一首，诗云：

昨游九日山，散发岩上石。
仰看天宇近，俯叹尘境窄。
归来今几时？梦想挂苍壁。
闻君结茅地，恍复记畴昔。
年随流水远，事与浮云失。
了知廓然处，初不从外得。
遥怜石上翁，鹤骨双眼碧。
永啸月明中，秋风桂花白。



廓然台石刻

九日山：于山别称九日山，以闽越王无诸曾于九月九日宴会于此而名。散发：指诗人自己弃了官簪的普通装扮。梦想挂苍壁：梦想还挂在旧墙上，既未实现也未破灭。石上翁：指陈旸。

朱熹十几岁时就随父亲到过福州，但那时印象不深。此后多次到福州，多有题咏。晚年到福州，既为了避祸，又借讲学和游览来排遣心中郁闷，因为当时朱熹的学说被指为“伪学”。宋宁宗庆元年间，朝廷派系斗争激烈，掀起“庆元党禁”，排挤“伪学”“伪党”，朱熹等50多人受到打击和牵连。《寄题廓然台》这首诗大概是朱熹晚年所作，诗中回忆了前人往事，联想到自身际

遇，颇多感慨。他感慨人世间是如此狭小，何处有用武之地？他感慨日子过得糊里糊涂，竟不知什么时候归来；他感慨自己的梦想尚未实现，还闲挂在墙上；他感慨年事如流水，过去的不再来。

“散发岩上石”，朱熹以这样的形象示人，十分罕见。古代的士绅，通常是要束发的，散发，是一种非常态。李白有诗云：“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散发，显示着一种散漫自由、解放自我的姿态。朱熹的“散发”，却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伟大儒者、理学大师的性情的另一面。“遥怜石上翁”，字面上是可怜音乐家陈旸，实际上怜惜自己，身边缺少知音，只能对月长吟。

万象亭中殢酒，九仙阁上扶头

南宋杰出的爱国者辛弃疾，与福州有过一段缘分。于山，亦留有他的足迹。

辛弃疾出生于山东济南，父亲早逝，他是在祖父的抚养下长大。辛弃疾的祖父曾在金国出任县令、知府等职，因而辛弃疾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那时候，北方大片土地早已为金兵所占，百姓不堪金兵的掳掠和压迫，纷纷聚众起义抗金，辛弃疾加入了耿京领导的抗金义军。不久，耿京被叛徒张安国出卖，惨遭杀害，青年英雄辛弃疾仅率领50名骑兵冲入数万人的敌营，俘获了叛徒张安国，并于1162年，率领一万多名起义军投奔南宋，但未得重用。此后辛弃疾虽然做过一些地方官，终究未能实现抗金复国的壮志。

绍兴三年（1192）年春，辛弃疾赴福建提点刑狱任。第二年年秋，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为了充实抗金的财力和武备，他厉行节约，并且准备打造一万副铠甲，招募士兵，试图训练一支精锐部队。谁知这些措施遭到当局的不满，被加上“残酷贪饕”的罪名，一年后（1194年秋）就罢了官，辛弃疾只好回到江西铅山的旧居去。留下一批吟咏闽都风光的词作，收录在《稼轩长短句》“七闽之什”当中。

在辛弃疾吟咏闽都风物的词作当中，光是以“三山”为题的，就有14首之多，包括《满江红·送徐抚幹衡仲之官三山，时马叔会侍郎帅闽》《归朝欢·寄题三山郑元英巢经楼，楼之侧有尚友斋，欲借书者就斋中取读，书不借出》《贺新郎·三山雨中游西湖，有怀赵丞相经始》《小重山·三山与客泛西湖》等。另外，还有一些词作，在词句中提到“三山”。比如，他的另一首吟咏福州西湖的《贺新郎》（碧海成桑野）就有“自是三山颜色好，更着雨婚姻嫁”之句；又比如，《临江仙·和叶仲洽赋羊桃》有句云“忆醉三山芳树下，几曾风韵忘怀”，《贺新郎·和徐斯远下第谢诸公载酒相访韵》有句云“风引船回沧溟阔，目断三山伊阻”，《好事近》（春意满西湖）又有“已约醉骑双凤，玩三山风月”之句。以上这些，足以说明辛弃疾对福州的钟爱。

辛弃疾写于山的词作，如《西江月·三山作》：

贪数明朝重九，不知过了中秋。人生那得许多愁，只有黄花如旧。

万象亭中殢酒，九仙阁上扶头。城鸦唤我醉归休，细雨斜风时候。

万象亭：从于山法雨堂向东往戚公祠方向，拾级而上，即可看见万象亭，后人为了纪念辛弃疾而移建于此，据考证，宋代万象亭在鼓楼一带。

九仙阁：于山别称九仙山，传说汉代有何氏九兄弟在山上修道炼丹，因名“九仙山”，山上有九仙观，建于北宋，其后殿即称为“九仙阁”。细雨斜风：化用唐代张志和《渔父词》“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之句。

这是1193年重阳节辛弃疾在万象亭饮酒后作的词，表达了壮志难伸、借酒浇愁的郁闷心



于山万象亭

情。词与酒，是他寻求心灵安慰的依赖，他一生的600多首词作中，有一半与酒有关，甚至还有写“戒酒”与“开戒”的。人生就在醒醉间，辛弃疾一生总体上是胸怀豁达，个性狂傲，性情不善遮掩，对于荣辱拿得起放得下，但写这首《西江月》时他已经50多岁了，眼看着北伐无望，故土难回，免不了流露出低落的情绪。

贪恋时光不要过得太快，心里数着日期，以为明天才是重阳节，不知不觉之间，却已经过了中秋。人生匆匆，又有多少愁苦可以排解？眼前所见，只有秋天的黄花开放依旧。

今天，在万象亭中饮酒，走到于山九仙阁，酒劲上来，只好以手扶头。城头鸦雀发出几声啼鸣，好像叫我回去休息。这时候才发现，天空中已经下起了细雨，斜风把雨打到了人的脸上……

万国梯航归禹贡，九仙楼阁倚崆峒

于山有一座石台叫平远台，位于戚公祠厅南边，始建于宋代，元代毁于战火，所遗巨石状如将军头盔，明代又有人将“平远台”三字刻到鳌顶峰的北面石壁上。

明代诗人林恕有《秋登平远台》诗云：

元是蓬瀛海上峰，六鳌移向粤城东。
天连螺渚风涛壮，月照龙江岛屿空。
万国梯航归禹贡，九仙楼阁倚崆峒。
凭栏纵目孤鸿外，遥见扶桑海日红。

粤城：越城，即福州城。螺渚：螺洲。龙

江：指台江段的闽江（白龙江）。梯航：水陆交通。禹贡：《尚书》中的篇名，篇中把中国分为九州，这里指代中国。九仙楼：即于山九仙观，俗称天君殿。崆峒：古人认为北极星居于天之中，北斗和北极星之下是崆峒，这里表示九仙阁高可倚天。

唐宋以后，福州凭借着河海之便，渐渐成为我国重要的贸易集散地之一。唐末诗人翁承瓚的《新丰市堤钱别》一诗，已经写到了福州河港集市的形成。宋代福州已有通往海外的航线，贸易发达。福州港进出船舶很多，据蔡襄《荔枝谱·第三》说：“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



平远台石刻

之属。”可见海外通商范围之广。到了明代，海上贸易进入鼎盛时期，郑和七次下西洋，福州是他最重要的航海基地，促进了福州和海外的交往以及经济的繁荣。明成化年间，市舶司曾经从泉州移至福州，福州港被朝廷指定为对外贸易港，一度取代泉州港的地位。林恕的《秋登平远台》诗，就反映了当年福州港万国通航的繁荣景象。

诗人站在于山平远台，凭栏远眺，气象壮观。开头两句介绍于山的地理位置和传说，后面六句写登台所见，包括螺洲一带江涛的壮阔，台江一带岛屿的空旷，九仙阁的高耸，以及孤鸿帆影、万国船舶，乃至东海日出的红艳。尤其一句“万国梯航归禹贡”，展现了福州古代水陆交通的发达和商贸的繁荣。至于“月照”与“日红”并存，那是中国古代诗歌常用的虚实相辅、时空错位的写法，给人以想象的空间。



年5月凭吊戚公祠后，应于社同人征约而作，抒发了抗日爱国的激情。

福州于山威武毅公祠新修落成，于社同人广征纪念文字，为填一阙，用岳武穆公原韵。

三百年来，我华夏、
威风久歇。有几个，如公成就，丰功伟烈。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至于今，遗饼纪征东，民怀切。

会稽耻，终当雪。楚三户，教秦灭。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台畔班师酣醉石，亭边思子悲啼血。向长空，洒泪酹千杯，蓬莱阙。

威风久歇：指戚继光之后的数百年来，直到抗日战争前，在抵抗外敌侵略方面，当局一直软弱，缺乏威风。遗饼纪征东：郁达夫原注说“民间流行之光饼，即戚继光平倭寇时制以代糗粮者”，民众为纪念戚继光，称之为光饼。会稽耻：春秋时代，越王勾践曾被吴王夫差打败，困于会稽山（在浙江绍兴），后来勾践卧薪尝胆，重振国力，终于打败吴国，这里用“会稽耻”泛指民族耻辱。楚三户，教秦灭：战国末年，秦国灭楚国，有人断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后来起兵推翻秦朝的项羽，就是打着“楚”的旗号，郁达夫这里说“楚三户，教秦灭”，是表示抵抗压迫、打败侵略的决心。台畔：平远台旁边，戚继光抗



于山醉石

倭大捷时，福州父老在于山平远台设宴庆功，犒劳将士，酒后戚继光曾卧在平远台附近一块巨石上，后人称此石为“醉石”，所以郁达夫在这里说“台畔班师酣醉石”。亭边：指思儿亭边，此亭根据戚继光为严肃军令而斩子的传说修建。蓬莱阙：即蓬莱阁，在于山戚公祠附近，是民国期间用修复戚公祠的余款建的，因戚继光是山东蓬莱人，故名“蓬莱阁”。

此词用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原韵，即“歇”“烈”“月”“切”“雪”“灭”“缺”“血”“阙”诸字的韵，与岳飞《满江红》原韵完全相同。岳飞本来就是抗敌报国的英雄，郁达夫写这首词的时候，正是抗战形势紧迫之际，所以这首词的用韵具有特别的意义。

福州的于山，经过大规模改造，已经大变样了。然而，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比如它的诗情和风骨。